

目 录

一、地理位置	1
二、地形地貌	2
(一)岗地	2
(二)坡地	3
(三)洼地	3
三、主要河流	5
(一)徒骇河	6
(二)黄河——主流四次经过聊城市境	9
(三)马颊河	10
(四)运河	12
(五)郭水	16
(六)赵王河	17
(七)羊角河	17
(八)湄河	18
(九)小湄河	18
四、气候	20
五、自然灾害	22
六、历史沿革	38
七、名胜古迹	43
(一)古代建筑	43
山陕会馆	43

光岳楼	52
海源阁	56
铁塔	66
堂邑文庙	72
(二)古代名胜	74
胭脂湖	74
(三)古代遗址	76
颛顼墓遗址	76
权寺遗址	77
埵均店遗址	77
(四)古代城址	77
微子城	77
郭城	78
聊古庙	78
王城	79
巢陵故城	80
凤凰城	81
白雀城	83
武水故城	84
王官镇	86
堆埵镇	87
八、胜迹寻踪	88
三霄宫	88
四知堂	88
吕祖堂	89
玉皇阁	90

静业禅林	92
赤帝当阳	93
万寿观	93
西城关庙	94
一步三关庙	95
鲁仲连台	96
弥陀寺	97
免税碑楼	97
三义宫	97
东昌府门	98
聊城八大会馆	98
崇武渡	99
傅氏祠堂	100
傅家墓群	101
穆孔晖墓	102
任氏家族墓	102
九、民间艺术	104
(一)木版年画	104
(二)蝈蝈葫芦	107
(三)聊城毛笔	111
(四)金银制品	112
十、儒学教育	114
(一)私塾	114
(二)书院	118
(三)科举	120
十一、乡风民俗	131

(一)节日时令.....	131
立春.....	131
春节.....	132
破五.....	135
人日.....	136
登高日.....	136
元宵节.....	136
走百病.....	140
二月二.....	141
清明节.....	144
谷雨节.....	146
端午节.....	146
雨节.....	147
晒龙袍.....	147
夏至.....	148
伏日.....	148
立秋.....	148
七夕.....	149
中元节.....	150
中秋节.....	151
重阳节.....	151
寒衣节.....	152
冬至.....	153
腊八节.....	153
祀灶日.....	154
除夕.....	155

(二)婚嫁	156
议婚	156
合婚	157
订婚	157
娶亲	158
回门	161
童养媳	162
冲喜	162
服亲	162
抢亲	163
招赘婿	163
寡妇改嫁	164
姘居	164
冥婚	165
(三)丧葬	165
初丧	165
入殓与成服	167
落纸与开吊	169
出殡	170
下葬	171
祭祀	172
重丧	172
客死	173
(四)其他习俗	173
拴娃娃	173
剃头和起名	174

换童子·····	175
供张仙·····	175
唤魂·····	176
认干娘·····	176
寄僧·····	176
庆寿·····	177
迁居·····	177
十二、故事传说·····	179
二龙山·····	179
龙山晓市·····	179
凤凰城的传说·····	180
光岳楼的传说·····	180
铁塔的传说·····	181
羊使君街的传说·····	182
邓钟岳批文解家仇·····	182
朱廷禧写对联·····	183
状元骑驴·····	183
奇才奇遇·····	184
柳园巧对·····	184
闹龙街·····	185
躬身“父母官”·····	186
胭脂石·····	186
蝎子居·····	187
王泓阳坐桥·····	188

附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一 地理位置

聊城市，位于山东省西部，东邻东阿、茌平，西接冠县、莘县，南与阳谷交界，北与临清相接。地处东经 $115^{\circ} 41'$ —— $116^{\circ} 08'$ ，北纬 $36^{\circ} 16'$ —— $36^{\circ} 42'$ 之间。东西宽 40 公里，南北长 50 公里，总面积为 1230.8 平方公里。现为中共聊城地委、聊城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鲁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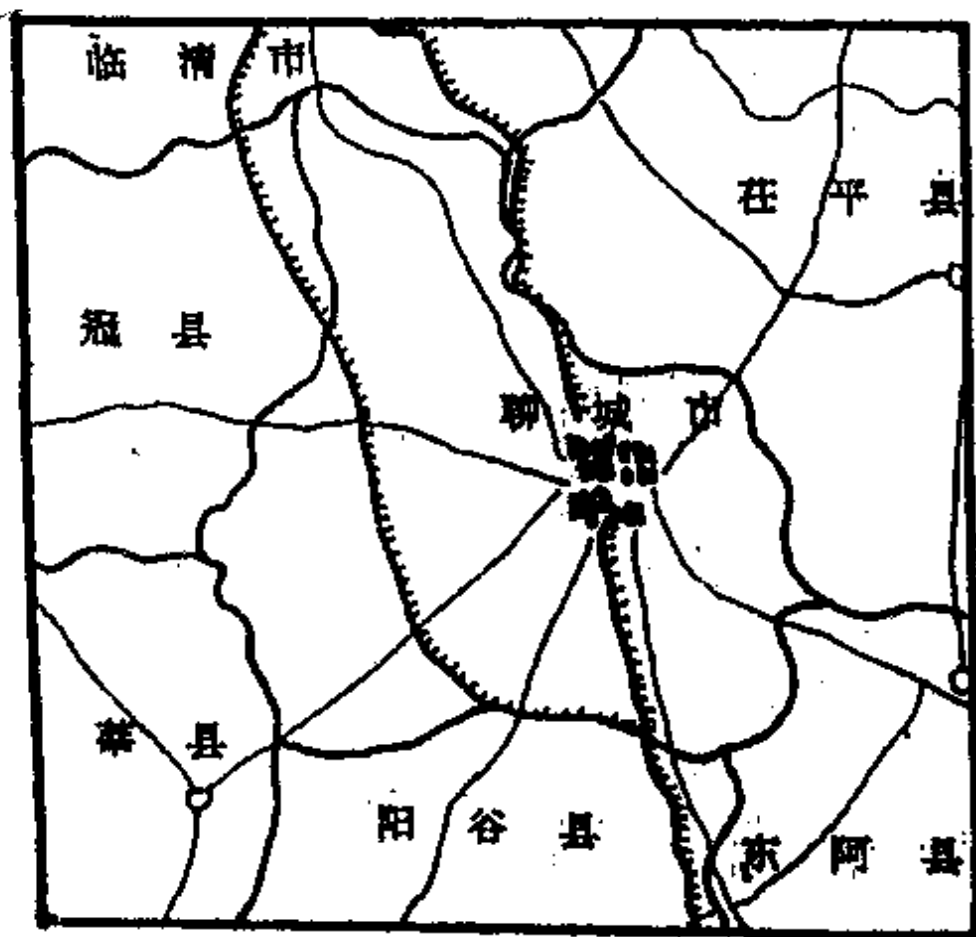


图 1 聊城市地理位置图

二 地形地貌

聊城市为黄河冲积平原。

黄河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北麓各恣各雅山下的卡日曲(今称喀拉渠)。由源头东流,河水清澈,龙羊峡以下,河谷两边出现黄土,河水逐渐浑浊。穿过黄土高原,携带大量泥沙注入下游。

距今大约一亿三千多万年前的燕山运动,太行山隆起,以东地面断裂下陷,为海水淹没。这时,黄河带来的泥沙在山麓前面堆积起来,随着洪水漫流,泥沙向前推移,形成了冲积扇。聊城市位于冲积扇的东部偏北,远古时代就形成了冲积平原。冲积厚度从市境东南的一百米左右,向北和西北逐步增厚到二百米以上。

约公元前 2033 年,夏禹治理黄河,疏浚漯川向东分洪,流经市境,黄河对聊城的地形开始产生新的影响。从西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 132 年)至明·万历初年(公元 1573 年)的 1700 年间,黄河主流又四次经过市境。并有 32 次决口漫及聊城使原有冲积平原的面貌不断变化,延续至今。全市地形大体有以下几类:

(一)岗地

岗地为古河道沉积而成。分河滩高地、决口扇形地、沙质

河槽地三种。其中河滩高地和决口扇形地有的宽达5—10公里,较其两侧的槽状洼地高3—5米。形成缓岗。但局部地片略有波状起伏和沙丘,或出现纵横交错的冲沟。主要分布在沙镇、郑家、张炉集、堂邑、道口铺等西部乡镇和阎寺乡的西北部,以及许营、于集乡的东南部。以上地形海拔高程35.2—38.5米,土壤多为轻沙土或沙土。潜水位多在3—5米。土地一般无盐化与涝灾威胁,但宜受旱。

沙质河槽地系主要河道急流沉积而成,呈条带状。地势较高,土壤偏沙,主要分布在徒骇、马颊、京杭三条河道近侧。

岗地面积合计382.1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31.1%。

(二)坡地

坡地多系黄河泛滥沉积而成,分布较广,地形高低差异微小,个别地段十分平缓。主要分布在市境南部和周公河与西新河之间,以及东部四新河流域。海拔高程32—34米之间,潜水埋深一般2—3米。土壤多为轻沙,有的是两合土,群众称为“蒙金地”。由于黄河多次泛滥沉积,形成沙粘相间,层次分明。在成土过程中,受地形、潜水、气候的影响,土壤中含有一定数量的盐分,地面有不同程度的盐斑出现。全县坡地面积609.6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49.5%。

(三)洼地

洼地分河间浅平洼地,背河槽状洼地两种。河间浅平洼地为黄河泛滥尾水缓流或静水沉积而成。多为黄河改道的河

间地带，呈碟形或椭圆形。群众称之为“漫洼”，如“白家洼”、“曹谭洼”、“牛家洼”等。海拔高程 31——32 米，边缘与洼底相差 0.5——1.5 米，夏、秋季节易积水成灾。因洼地多粘土，不易盐化。但洼地边缘水分补给量大，易形成碱地。

背河槽状洼地为黄河决口后的溜道所形成的狭长洼地，多呈不连贯的条带状。分布在马颊河沿岸的梁水镇、八甲刘到堂邑“放马场”一带。因河水外渗，潜水位高，易积涝成灾，盐化较重。

洼地面积合计 239.1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19.4%。

三 主要河流

聊城市古代属黄河流域。境内河流有黄河，其支流有漯川、马颊河、郭水、羊角河、赵王河、小颍河等。

元代开凿运河(会通河)，属京杭运河水系。

自明·万历初年(公元 1573 年)黄河南下泗、淮，离开聊城。市内河流属海河流域。建国前，有徒骇河、马颊河、赵王河、羊角河、小颍河、周公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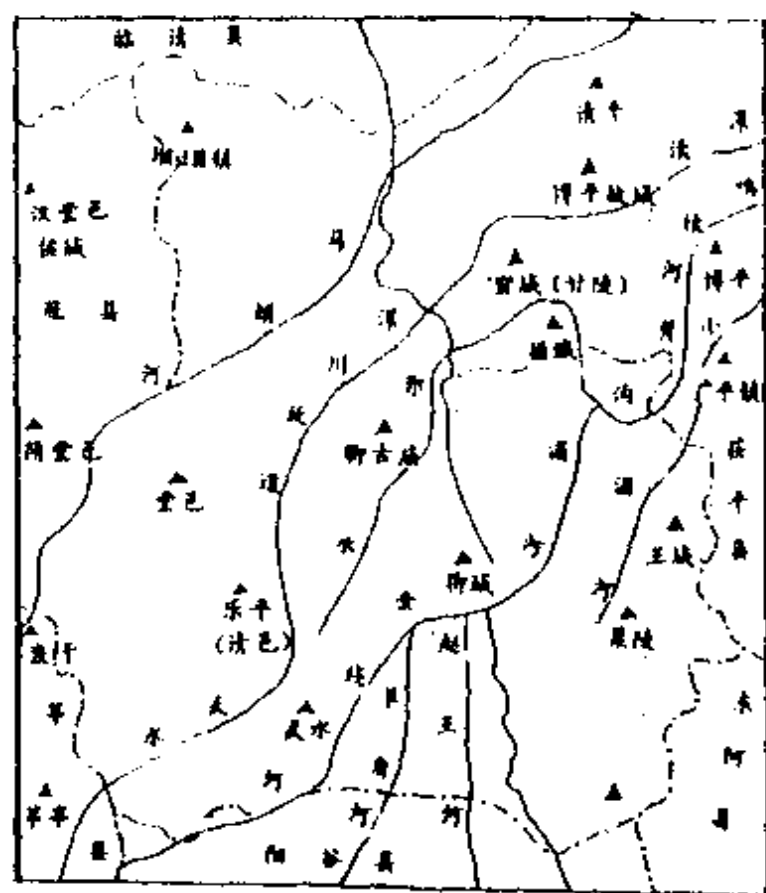


图 2 聊城古代河流示意图

当代河流，主要有徒骇河，及其支流西新河、周公河、赵王河、新水河、四新河；马颊河，及其支流德王河；运河上游（即阳谷段）改为排水河道；周店至四河头段改为引黄二千渠；新开京杭运河聊城段不通航，改称引黄三千渠。

（一）徒 骇 河

公元前 2033 年，禹治黄河，疏漯川。漯川，即徒骇河的前身。漯发源于河南浚县黎阳山，经濮阳、范县、莘县、聊城、茌平、高唐、齐河、禹城、临邑至利津入海。

东周·定王五年（公元前 602 年）黄河在宿胥口改道，东行漯川，把漯川从宿胥口至长寿津（今滑县东北）段夺为黄河故道。此后西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 168 年）、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 132 年）、成帝鸿嘉四年（公元前 17 年）、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 11 年）黄河四次决口，都曾夺漯川行洪，甚至全流东行漯川。尔后又多次夺漯部分河段，至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 1048 年）黄水断续流经漯川达 1650 年。因此千百年间，人们只知有黄河，不知有漯川。

漯川上游朝城至聊城沙镇段又名武水。朝城东北古有“武阳”（为汉代东郡治所），沙镇古称武水，皆因此河而得名。清·嘉庆十三年《东昌府志》记载了《水经注》中的一段：“武水即漯水之别名。武水出朝城之于家铺至董村口，经韩张店入聊城之武水镇，为阳平县地。隋曰武水县、唐曰崇武县，周省入聊。”（唐后为五代，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后周的年代为公元 951——960 年，武水在公元 955 年并入聊城县。）

漯川的河道，后演变为徒骇河，追其起源，本不相干。徒骇为禹治黄河时所疏浚的九河之一，也是当时黄河入海的主要河道。九河的起点，据《书·禹贡》载：“北过降水（今漳河），至于陆（今河北巨鹿），又北播为九河。同为异道，入于海。”九河为禹疏九河之名，首见于《尔雅》一书，即徒骇，太史、马颊、复釜、胡苏、简、挈、钩盘、鬲津。这里的意思是说黄河在巨鹿以北分为九条支流，均是入海的河道。

徒骇河的命名由来。史载：禹治此河，用工极众。此河工难，众惧不成，故人徒惊骇也，因而命名徒骇”。徒骇河的位置，据清·傅泽洪主编《行水金鉴》载：“漳河自巨鹿以北，历南宫、新河、戴州、束鹿、深州、衡水、武邑、阜城、献县、交河、青县、静海……天津入海。即古徒骇河之河道也。”是知现代的徒骇河已非原始徒骇故道。

山东徒骇河的由来，如下：古代由于黄水长期行漯，沿海涝水没有出路，汉·成帝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河道都尉许商在下游漯川与笃马河之间开凿一条名叫“商河”的新河，实行分洪。后来又为排涝需要，在高唐以下的黄河与商河之间开挖了一条土河（又叫大土河）。在滨县与古商河汇流入海，其走向大体是现代徒骇河下游的一段河道。

在古漯川的上、中游，因黄河溃决，又先后开挖过赤河、金河（也叫宋金河）、游河、六塔河、横陇渠等分泄黄水。

金·明昌三年（公元1193年），黄河在河南阳武县决口，南下淮、泗、漯川流域基本摆脱了黄水的侵扰，在古漯川逐渐淹没的情况下，当时把上述的几条河道，分段与下游的土河贯通。自河南滑丰东，南乐之南，经莘县、阳谷、聊城、茌平、高唐、禹城、临邑、济阳、惠民至无棣一段，逐渐演变为徒骇河的

主干。

明代以前，一般都叫土河。《临邑县志》记载：“徒骇河由齐河县经夏口至城东南二十五里，俗名大土河。”《山东省志·东昌河川》记载：“古漯川，黄河支流也，俗名大土河，亦曰徒骇河故道。”可能是明朝年间，人们“以土会徒”冠以禹贡九河古名，称为徒骇河。

明、清以来河道有局部变迁。据民国二十五年出版的《山东水利专刊》载：“徒骇河其上源有二支：一、朝城西南旧有引河（即淄河）宣泄清丰、南乐等县坡水，至莘县城南入金线河；二、阳谷县境西南旧有坡河（即古漯河），宣泄濮、范、观、朝等县坡水，北行至莘县城南入金线河。此两支流，河形断续，多半淤塞。二流合一趋向东北，由为金线河。即以莘县城南为起点，东北行入阳谷之莲花泓、鹅鸭坡至聊城南。运河左岸为终点，穿运东行则为徒骇河。经博平、高唐、茌平、禹城、齐河、临邑、济阳、商河、惠民、滨县、沾化而注入海。”

现代的徒骇河，源于观城南文明寨。左岸连接河南八条排水沟，计有：碱场沟、山柳沟、刘海沟、安堂沟、土塔河、董固沟、理直沟、永顺沟。该河与黄河平行流向东北，至沾化县东北入海，全长 420 公里。上游经过莘县、在聊城市大张乡的于半坡村入境。经耿海南、姜堤口、王堤口、四河头、瓜园，在西新河口出境。市境内全长 47 公里，流域面积 832 公里。有七条支流，其中：跨县的有四新河、赵王河、运河、俎店沟；在市境内有西新河、周公河、新水河，总计流域面积 1677 平方公里。降雨经流均由市境排入徒骇河。

(二)黄河——主流四次经过聊城市境

黄河,即我国第二大河。上源卡日曲出青海省巴颜喀拉山脉各姿各雅山麓,东流经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区,在山东省北部入渤海。全长 5464 公里,流域面积 75.24 万平方公里。有洮河、湟水、无定河、汾河、渭河、洛河、沁河等支流。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河口镇以上为上游,流经高原峡谷,水流较清;河口至河南孟津为中游,穿行黄土高原,含沙量增大,水色浑黄;孟津以下为下游,流入华北平原,水流缓慢,泥沙淤积,两岸筑有大堤,成为高出于地面的“地上河”。

黄河,其主流曾四次经过聊城市境:

1、西汉·元光三年(公元前 132 年)春,河决顿邱(今清丰县西南),自内黄东北行,过观城、朝城、聊城西、博平北,又东北至禹城,东行折北至垦利附近入海。当年五月,又从濮阳西南决口,东南流入淮泗。汉·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主流北行,复归周定五年河徙故道,余波入漯川。流经聊城 120 年。

2、新·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 11 年)。河决魏郡(今南东附近)。主流徙漯川,流经南乐、观城、范县、朝城、阳谷、聊城、茌平、至禹城离漯川北行,至利津东北入海。流经聊城 58 年。

3、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 69 年)王景治河成功,大河自濮阳南向东北流,经聊城东、茌平南折北经禹城西,又东北经滨县入海,流经聊城 800 多年。

4、宋·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黄河在南乐县附近决口,冲出一条新河,经堂邑走马颊河,宋人称谓“东流”。此后,金、元、明代河道极为混乱,经常数道并行,彼此迭为主次,其东流则在马颊河、徒骇河、北清河一带滚动。至明·万历初年(公元1573年)黄河南下泗、淮止,流经聊城约500年。

(三)马颊河

马颊河为禹疏九河之一。因河道上宽下窄,形如马颊而命名。流经聊城的马颊河不是原来的古河。《水经注》载:“春秋时期,齐桓霸世,禹疏九河、川渚多亡;秦汉之时,九河已影迹难寻。”西汉成帝时河堤都尉许商上书曰:“古九河之名,其中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津县界中。”许商说了三条河,其中他六条不知所在。他指出:徒骇在成平,胡苏在东光、鬲津在鬲县(今平原西北)。按九河的排列顺序,自北而南。第一条是徒骇,第五条是胡苏,马颊据三,可知古马颊河的位置大体在河北省的成平县南,东光县北。

流经聊城的马颊河,其形成与演变如下:

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黄河第一次改道前,漯川以北最大的排水河道是笃马河,源出河南浚县,经濮阳、清丰、莘县、朝城、冠县、堂邑、高唐、平原、陵县、乐陵至无棣入海。黄河第一次改道由北南移,不但夺漯,而且曾夺笃马河中游一段河道。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黄河又在馆陶决口,冲出一条新河叫屯氏河,与黄河并行流向东北。

汉·元帝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黄河在高唐鸣犊口决口,冲出一条新河叫鸣犊河。穿越屯氏河,向北叫屯氏别河。

在平原以西分为两支，南支叫笃马河，经平原、乐陵、沿古笃马河道至沾化入海；北支叫咸河，经平原、东陵县之北入海。东汉、三国、晋、隋各代，一直在黄泛影响下，逐渐淤积淹没。以上河道是唐代马颊河的基础。

唐·武则天久视元年(公元700年)，为了分泄黄河洪水，上游利用黄河故道与笃马河道；中游沿屯氏别河北支；下游袭古鬲津河，疏通了一条规模很大的排水河道。河成，以禹疏九河中的“马颊河”命名。其大体走向是：濮阳、清丰、南乐、莘县、冠县、堂邑、高唐、夏津、平原、陵县、乐陵、无棣至月河口入渤海。为近代马颊河奠定了基础。

北宋初，曾挖了一条“八丈沟”，《齐河县志》载：沟口八丈宽。上通汴梁(开封)，下达渤海。在山东境内一段，基本利用了唐代马颊河道，并称为“赵王河”。宋·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黄河决口于横陇(濮阳西)，又在清丰冲出一条河道，经过清丰六塔集，入唐开马颊河故道。所以当时马颊河又叫“六塔河”。宋·仁宗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黄河决口于商胡(南乐附近)又冲出一条新河，与黄河分流为二股，所以唐代马颊河在宋代有一时被称为“二股河”。

自元、明两代开挖运河以来，马颊河被截断，运河以东承担运河分洪与排涝，运西排涝受阻，水灾连年不断，运西“只准报灾，不准挖河”，此禁令延至清代。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山东省建设厅派员修建马颊河南支三孔穿运涵洞，使马颊河上游，又延伸到河南省濮阳县境，成为现代马颊河，并负担排泄运河以西涝水。该河自濮阳南关、经莘县、冠县、聊城、高唐、平原、东北流无棣县下泊头东北入渤海，长440公里。

马颊河自聊城市郑家乡后田村入境，引于聊冠边界，至王

铺全入聊境。从冠县鸿雁渠至王铺拦河闸，长 16 公里，从王铺闸又东北行，至土闸三孔桥出境，长 20.6 公里。境内支流有德王河东支和孟李渠，流域面积 398 平方公里。

（四）运河

运河，和万里长城一样，是我国历史上的伟大工程，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路线最长的人工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经过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 1794 公里，已有 2400 多年的历史。

大运河最早的一段是邗沟。战国时期，吴王夫差为了要北上争夺中原霸主，于公元前 486 年，从扬州附近的邗城引长江水，向北经高邮县西，折向东北入宝应县的射阳湖，又西北至淮安县流入淮河，当时称“邗沟”。公元前 482 年又继续北挖连接泗、沂、济三水，这是最早的南北运河。隋炀帝建都于今河南洛阳，为了加强对江淮地区的控制，搜刮南方的粮食物资和调运军队，于大业元年（公元 605 年），下令开凿运河，从洛阳城西引涧水、洛阳东入黄河，再引黄河水，经郑州，循鸿沟、汴水至商丘，向东南至泗洪南入淮河。又从洪泽湖东北开挖渠道至江苏青江，与邗沟相通，全长 1000 多公里。大业四年（公元 608 年）又调发军民百余万，从洛阳向北经武陟、汲县、临清、天津、直达北京西南涿郡，开凿了此段运河。大业六年（公元 610 年），又从江苏镇江至杭州开凿了一条长约 400 多公里的江南运河。至此，京杭大运河的前身全部凿成，全长 2700 多公里。历史传说，隋炀帝开凿运河经过聊城，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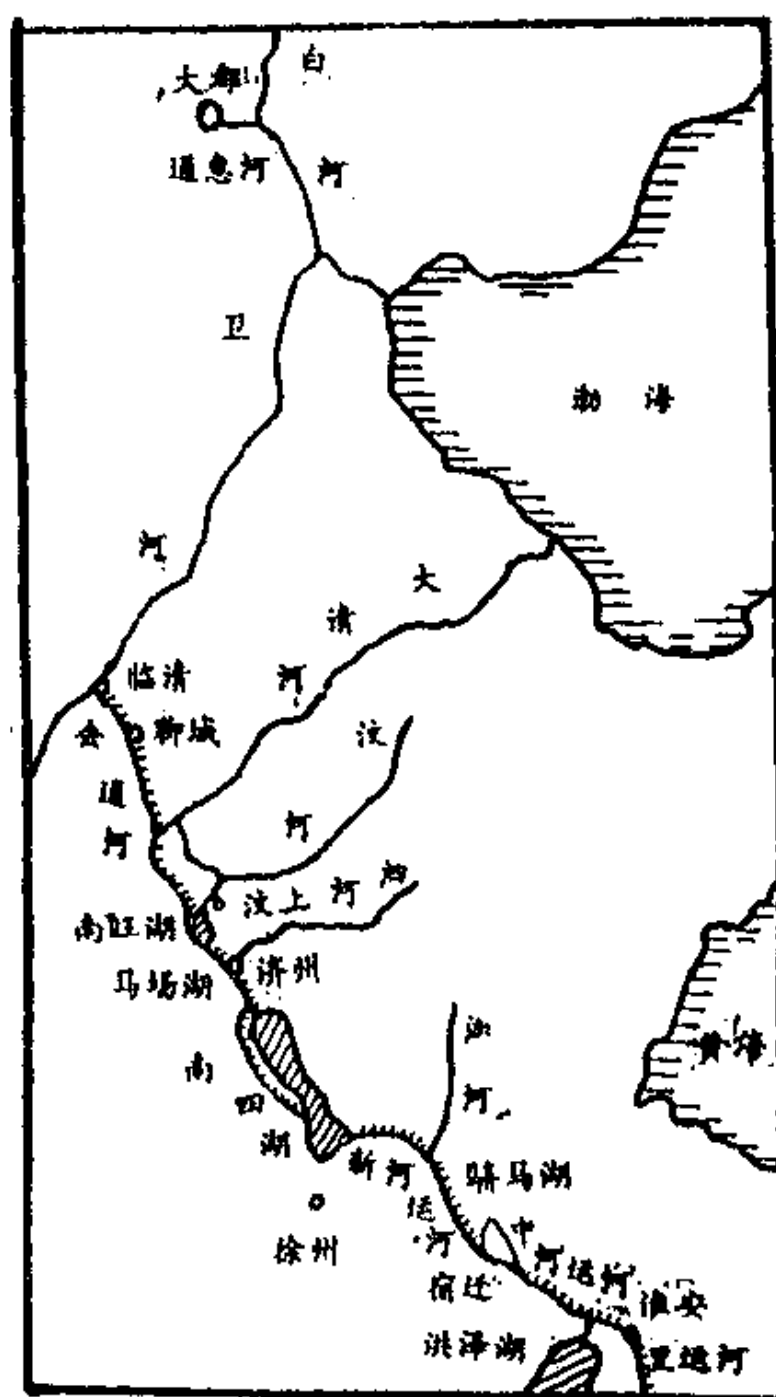


图3 元·明·清运河示意图

公元 1267 年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后,北方农村残破,生产凋敝,吃粮靠南方供给。当时与江南的水路联系要绕洛阳,很不方便。

元朝漕运改变方向从扬州附近走战国时吴王夫差开挖的“邗沟”故道,北上进入淮河,又向北接通黄河,运粮的船只在黄河中逆水西行,到河南封丘县的中滦镇登陆。北行 180 里,到浚县西南的淇门(即淇水入卫河的进口处),又换水运,由卫运河驶抵通州,还要陆行五十里才到北京,这样辗转华北,水陆交替,困难也多。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公元 1283 年)命兵部尚书奥鲁赤等,再次改变漕运路线,从山东济宁开挖济州河,至东平长 150 里。南流入泗水,北流入大清河,经东阿至利津入海。后因海口淤积,又从东阿经茌平陆运二百里到临清以下入御河(卫河),此道多行于洼地,夏秋雨多,转运难阻。

至元二十六年(公元 1289 年),开挖会通河,南自安山与济州河相接,北经东昌到临清通入卫河,长约 250 余里。在会通河上建造了 31 座船闸,蓄节水势,转送往来船只。至元二十九年(公元 1293 年),又开挖了北京到通县的通惠河,这样从北京可以直达杭州,全程缩短了 900 多公里,这就是近代的京杭大运河。对促进我国的经济、文化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元·泰定二年(公元 1325 年)又在徐州以北的运河段上兴建拦河船闸等工程。此后南起徐州北至临清的河道统称为“会通河”。当时运河南由阳谷官桥口入聊城市境,北至梭堤出境,县内长度 65 华里。

1959 年开挖位临运河。自黄河左岸牛屯向北,在阿城南入原运河,至聊城市周店改道西行,经王堤口穿徒骇河转向西

北,至王铺穿马颊河至临清县兴闸口入卫运河。这段京杭运河,代替了旧运河全长 110 公里。聊城县南从周店入境。北至郑堂出境,长度 41.5 公里。

自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公元 1289 年),开挖东平至临清的运河后,通航 90 多年。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 1391 年),黄河决口于河南原武县,漫过东平湖,致使运河大部淤塞,停航 20 多年。明·永乐九年(公元 1411 年),工部尚书宋礼征集民夫 16 万人,开挖南自济宁北至临清 385 华里的元人故道,采用汶上老人白英的策略,“引汶入运”。一、于东平戴村筑坝,拦截汶水,向南导入汶上南旺湖,并在龙王庙实行南北分流,注入运河;二、又自汶上袁口重开新河,北至寿张沙湾接入旧河;三、在运河东岸把济河、泗水、沂河等多处水源汇集成 15 个湖泊,补充运河水源;四、为了调节流量与水位,东平至临清建船闸 16 座、进水闸 9 座、泄水闸 6 座、涵洞 14 座、桥梁 10 座(其中木制活动桥 6 座),使载重八百吨的漕船(运粮船)畅行无阻,每年北运粮食达 400 万石。

清乾隆年间漕运达到鼎盛时期,东昌府商业繁荣,以通济闸(今闸口)为中心,沿河两岸建有“山陕”、“苏州”、“江西”等商人会馆,河中停泊船只接连数里。沿河街道被誉为:金太平、银双街、铁打的小东关。此繁盛时期延至清·咸丰四年(公元 1854 年)共达 400 多年。

清·咸丰五年(公元 1855 年)黄河决于河南兰考铜瓦厢,运河堤被冲毁,黄河穿运,北上漕船逐渐减少。到光绪二十七年(公元 1901 年)裁撤管河人员,运河遂废。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 1935 年)重新疏竣运河,据《山东水利专刊》1935 年编写的《疏竣北运河概况》载:“北运河流域,

原为消纳运西坡水，及恢复黄河临清间航运，故工程计划即依此旨。前定聊城以南坡降五万分之一，以北十万分之一，河底宽十二公尺，边坡 1：2，河底高差为 1.8 公尺，统计土工为一千四百万公方。此次征夫治运，悉循（仍按）以往挑河办法，按地亩调集民夫，计分全河为临清、清平、堂邑、博平、聊城、阳谷、东阿七段，每段派督工员 1 人，就地指导。并设临时工程处于聊城，指导一切。在开工之始，先作施工测量继则洒灰线插标分工，然后由县工程事务所委任区、乡镇长担任监工员，分头组织，乡镇结合，不数日间，全河竟到民夫二十余万人。至七月十五日全河土工大体完成。考沿河人民之所以如斯踊跃者，因为运河可以吸收各坡洼之水，不致淹没良田，然实际心理确欲一睹运河之舟楫连墙，交通便利也。当时，虽曾一度通航，但未能持久。1938 年 11 月 15 日日寇侵占聊城，运河因长期无人治理，遂成废河。

（五）郭 水

郭水，又名黄沟，是漯川的支流，在漯川之右，自西南流向撮城北（撮城即战国时撮国故城，在聊古庙东北 25 里），又东南经王城北（今城东许田庄南），继东北流，至高唐与漯川合。聊城段叫郭水，下游出境后叫黄沟。清朝叶圭绶地理著作《续山东考古录》云：“黄沟，又名郭水也。”

郭水开挖年代不详。周朝，文王季弟受封于聊城，称郭国，郭水由此得名。河道久已淹没，影迹难寻。

(六)赵王河

赵王河,为宋代王安石变法时所挖。

在王安石任相期间,山东各地挖了不少排水河道,后人皆称“赵王河”。聊城市的赵王河开挖时间,约为公元 1072 年左右,至今已 900 多年。该河原名宋王河,北方陷于金后,人心思宋,不敢直言,因宋王姓赵,改名赵王河。

此河是县境南部的主要排水河道,起源于阳谷县的赵升白村,在朱老庄乡四甲李村以东入境,穿过京杭运河,北流至四河头入徒骇河,全长 51 公里,流域面积 693 平方公里。县内长 14 公里。流域面积 63 平方公里。

(七)羊角河

羊角河的名称由来有两种说法:一是羊角为古地名,春秋时有羊角城(今范县南),此河因地得名;二是羊角河入徒骇河前分为两股,形似羊角,故名羊角河,开挖年代不详。

现代羊角河起源于阳谷城北迷魂阵村,向北流入聊城,在明堤村西入徒骇河,全长 32 公里,流域面积约 110 平方公里。1959 年开挖京杭运河将羊角河切断。阳谷段排水入京杭河后,西行 1.5 公里泄入徒骇河。聊城段长 12 公里(流域面积 30 平方公里)裁弯取直,改为灌溉渠道,浇地面积 3.4 万亩。

1972 年 2 月,聊城地区水利局命名为阳谷羊角河,列入水利建设基本资料汇编册内。该河由张大庙裁弯取直向北至

宋堤口西入徒骇河。张大庙下至京杭河段为排水沟,此后,聊城市无羊角河名称。

(八) 湄河

湄河,据北宋地理名著《寰宇记》载:“聊城有微子城,商末为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受封之地”。据旧志县图标微城位置在古摄城,城东有黄沟,后人亦称湄河。古代“微”与“湄”两字通用,因而得名。

清·嘉庆十三年《东昌府志》载:“湄河在府城东七里,一名七里河,受漕河减水闸之水北流县界,又北经县(注:博平)西北邓家桥入徒骇河。明·成化年间,漕河减水泛涨,奏请开凿以泄之,乾隆二十八年知县朱坤曾劝民挑浚。”

意思是过去的漕河(运河)有时水量过大,需要分水下泄,城南四河头运河右岸设有泄水闸和排水沟(称减水或减水沟)。明·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运河和减水沟泛涨,为了寻找排水出路,向北开挖了湄河。三百年后,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聊城知县朱坤作过疏浚。

(九) 小湄河

清·嘉庆十三年《东昌府志》载:“小湄河自城东南旧州坡,汇流入博平界。”清·宣统二年《聊城县志》载:“明·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秋雨淋漓,湄河(注:小湄河)泛涨,淹没禾稼、屋庐”。开凿年代不详。

《山东通志》载：景泰间博平知县龚谦，凿自西南十五里。循城之东而北入鸣犊（河）。嘉靖间知县王宗舜，李鹭相继复浚。”

此河延续到 1958 年，徒骇河改道时在北杨集乡的庄庄占了小渭河下游河道，上游河段成为排水沟。

四 气 候

聊城市处于暖温带季风气候区,属半干燥大陆性气候。温度适宜,光照充足,四季分明,春旱多风,夏热多雨,秋高气爽,冬季干寒,是聊城市的气候特点。

气温,年平均 13.3°C ,其变幅在 12.2°C — 14.1°C 之间。全年以 1 月最冷,月平均气温 -2.6°C ,7 月最热,月平均气温 26.8°C 。

年平均最高温度 19.1°C 。1 月平均最高气温 3.1°C ,7 月平均最高气温 31.6°C 。累年极端最高气温 40.8°C (出现在 1966 年 6 月 22 日)。年平均最低气温 8.4°C 。1 月平均最低气温 -6.9°C ,7 月平均最低气温 22.7°C 。累年极端最低气温 -20.7°C (出现在 1957 年 1 月 15 日)。

降水,年降水量 582.1 毫米。雨量最多的达 985.8 毫米(1961 年),最少的年为 309.0 毫米(1968 年)。全年降水日数(日降水量 ≥ 0.1 毫米)平均为 71 天,一年中降水日数量多的是 1961 年,达 101 天。

季节降水量相差悬殊,年降水总量的 66%集中在夏季,7 月雨量为全年之冠,占年降水量的 30%。秋季次之,占全年降水量的 18%,冬季降水量最少,仅占全年降水量的 3%。

光照,年平均日照时数 2637.6 小时。全年春夏日照最多,冬季最少。一年中 5 月日照最长,达 278.4 小时。6 月次

之,为 274.0 小时。

湿度,年均空气相对湿度为 66%。一年中以 8 月最大,为 81%。5 月最小,为 57%。

霜期,初霜日为 10 月 28 日,最早 1 月 11 日(1671 年),最迟 11 月 17 日(1972 年)。平均终霜日为 4 月 10 日,最早 3 月 24 日(1972 年),最迟 4 月 21 日(1965 年)。无霜期平均为 201 天,最长 223 天(1967 年),最短 179 天(1962 年)。

风,因受地理环境和季风的影响,全年盛行南风,出现频率为 20%,平均风速 3.4 米/秒。春季回暖迅速,气候干燥,平均风速 4.2 米/秒,为全年之冠。其中又以 4 月最大,月平均风速 4.5 米/秒。

五 自然灾害

聊城市历史上旱涝灾害频繁,公元前 207 年至公元 1946 年,共发生较大的水灾 350 多次,旱灾 410 多次。大体上是 5 至 8 年有一次大旱和一次大水,50 年左右有一次特大水灾,一次特大旱灾。在部分年份又是先旱后涝,或大旱、大雨连年不断;另一方面旱与蝗往往并发,洪水与地震有时同来,风、旱、雨密节相随。

东周·定王五年(公元前 602 年),黄河在浚县宿胥口(淇河、卫河合流处)改道,经汉堂邑(馆陶东)西南,漫及县境(造成洪灾)。《山东水利史》

西汉·文帝前元年(公元前 179 年),聊城地震。《聊城史志资料汇编·大事记》

西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 168 年)十一月,黄河决酸枣(今延津县),东溃东郡金堤(又名千里堤造成洪灾)。《聊城县志》《堂邑县志》

西汉·元光三年(公元前 132 年)春,黄河决口于顿丘(今清丰西南),流经聊城(造成洪灾)。《山东水利史》

西汉,建昭二年(公元前 37 年)十一月,齐(聊城属齐)、鲁大雪深五尺。《东昌府志》

西汉·建始四年(公元前 29 年),黄河在馆陶县决口,泛滥兖、予……四郡三十二县(造成洪灾)。(注:聊城属兖州)《山东水利史》

西汉·鸿嘉四年(公元前 17 年)至永乐年间(公元 58 年),(黄河水)东郡(城址在今聊城东北)横流不息,为患八十余年。(注:聊城属东郡)《山东水利史》

新·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 11 年),黄河大决于魏郡(南东附近),河水正流徙入漯川,流经聊城(造成洪灾)。《山东水利史》

新·王莽地皇三年(公元 22 年),天下旱蝗。黄金一觔粟一斛。《东昌府志》

东汉·建武六年(公元 30 年),东郡以北大水,民大饥。《聊城县志》《堂邑县志》

东汉·永光元年(公元 153 年)七月,黄河水溢,漂害数十万户……(注:此时黄河流经县境东部)。《历年黄河决口各地概况表》

东汉·兴平元年(公元 194 年)正月至七月,不雨,谷一斛五十万文,豆、麦一斛二十万文,人相食。《东昌府志》夏,东郡蝗。《聊城县志》

三国·魏·曹丕黄初四年(公元 223 年),在平城毁(汉朝在平在今城西南二十里),洪水漫及聊城。《水经注》

三国·魏·景初元年(公元 237 年),九月淫雨,黄河水出,溺杀居民,漂没财产。九月,冀、兖(聊城属兖州)、徐、予大水,遣御史巡行灾区,赈救之。《东昌府志》

晋·泰始四年(公元 268 年),五年(公元 269 年),青、徐、兖大水。《东昌府志》

晋·咸康二年(公元 336 年)冀、青等六州久旱,谷贵,金一觔值米二升。《东昌府志》

南北朝·宋元嘉二十五年(公元 448 年),山东饥。《东昌府志》

南北朝·北齐·天统四年(公元 568 年),饥,自正月不雨至五月。《东昌府志》

隋·仁寿二年(公元 602 年),河南、河北诸州大水。(注:黄河流经县境东部)《堂邑县志》

隋·义宁元年(公元 617 年),河南、山东大水,饿殍遍野,死者日数万人。《东昌府志》

唐·开元十年(公元 722 年)六月,博州(聊城)、棣州河决,冲毁博州黄河堤。《黄河变迁史》

唐·开元十二年(公元 724 年)八月,博州(聊城)大水。《聊城县志》

唐·开元十二年(公元 724 年),秋七月,黄河南、北大水。《东昌府志》

唐·开宝十三年(公元 754 年),济州为河所陷没。(注:济州在今茌平县西南)《黄河变迁史》

唐·兴元元年(公元 784 年)秋,博州(聊城)蝗。《聊城县

志》

唐·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博州(聊城)饥。《聊城县志》

唐·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八月,博州(聊城)水害稼。《聊城县志》

五代·后梁·贞明四年(公元918年),后梁朱友贞,令其大将谢章彦在杨柳(今东阿县北)决开黄河,以限晋兵,淹及聊城。《山东水利史》

五代·后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六月不雨至九月。《东昌府志》

五代·后唐·清泰二年(公元935年),博州(聊城)水、旱、民饥。《聊城县志》魏、博等州水、旱、民饥,山东之民流散。《东昌府志》

五代·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7年)秋,黄河决博平,漫及聊城。《东昌府志》

五代·后晋·天福七年(公元942年),旱、蝗。《东昌府志》

五代·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43年),旱、蝗。《东昌府志》

五代·后晋·开运二年(公元945年),黄河决,城毁,南徙巢陵故城。《东昌府志》(注:当时博州与聊城县城均在王城——今城东许田庄南。)

五代·后晋开运三年(公元946年)七月,黄河决杨柳(今东阿城北),淹聊城东部。《山东水利史》

五代·后汉·乾祐元年(公元948年)秋,旱、蝗。有鸛
鸛食蝗,禁朴鸛鸛。《东昌府志》

五代·后汉·乾祐三年(公元950年),黄河决博平,漫
及聊城。《东昌府志》

五代·后周·广顺二年(公元952年),黄河决,武水城
(今沙镇)毁。《寰宇记》

五代·后周·显德元年(公元954年),黄河水自杨柳至
博平,连岁溃决,汇成了弥漫数百里的大泽,聊城受害。《聊城
史志资料·水利》

宋·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六月,黄河决朝城,河之南北
诸州皆大水。《山东省水利史》

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博诸州水害稼。《宋
史》

宋·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博州蝗,十二月无冰。《聊
城县志》

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六月,黄河决巢陵,城毁移至
孝武渡西。《聊城县志》(注:孝武渡也叫崇武渡,为漯川渡口,
在今运河大码头附近。)

宋·熙宁六年(公元1068年),黄河决,毁堂邑城,东徙十
里今治。《堂邑县志》

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博州地震。《聊城县志》

宋·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四月,河北、山东大旱。六
月雨复不止,地震。《山东通志》

宋·景定四年(公元1263年),东昌饥。《聊城县志》

元·至元元年(公元 1264 年),博州大水,聊城水灾,大饥。《东昌府志》

元·至元十三年(公元 1276 年),东昌路发生水旱、冰雹等灾害,庄稼田桑尽毁。《聊城史志资料汇编·大事记》

元·至元十四年(公元 1277 年)六月,东昌路大水。《聊城县志》

元·至元二十二年(公元 1285 年)五月,濮阳、东昌旱。秋十月冠州雨雹,济南路河水毁田。《元史·五行志》

元·至元二十六年(公元 1289 年)五月,御河(卫河)溢入会通河,漂东昌路芦舍。《东昌府志》

元·延祐六年(公元 1319 年)六月,东昌路大水。《聊城县志》

元·至治元年(公元 1321 年),东昌路大水。《聊城县志》

元·至顺元年(公元 1330 年)饥,赈东昌及濮州。《临清县志》

元·至顺二年(公元 1331 年)六月,东昌诸路属州县水。《聊城县志》

元·至顺三年(公元 1332 年)三月,东昌路有虫食桑。《聊城县志》

元·至元元年(公元 1335 年)五月,大雨雹。《聊城县志》

元·至元二年(公元 1336 年)三月,东昌府大雨雹;四年(公元 1338 年)三月,大雨雹。《东昌府志》

元·至正十五年(公元 1354 年)五月,大雨雹。《聊城县志》

元·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东昌路大旱。《聊城县志》

元·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东昌路大旱,民食饥荒。《聊城史志资料汇编·大事记》

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雨水七昼夜,深七、八尺,牛畜尽没死。《博平县志》

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5年)六月,山东淫雨,河水泛滥,毁民舍禾稼。八月,东、兖、滚、青等州府赈。《明实录》

明·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黄河决张秋沙湾、东阿、东平、观城、聊城、曹州、东昌诸州洪灾。《明实录》

明·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黄河大决大变,由原来三股河道改为另三股河道,北股由原武决口,经延津、封丘抵东昌,冲张秋、溃沙湾、坏运河道。《黄河变迁史》

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正月,黄河决,漫及聊城。《明史·河渠志》

明·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六月、七月,久雨,水溢堤岸冲决,东阿、寿张、聊城、堂邑等十二县受灾。《明实录》秋雨淋漓,三眉河泛涨漂没禾稼、房屋。《聊城县志》

明·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济宁、东平、聊城、堂邑、博平、茌平、临清等十五县以运河溢受洪灾。《明实录》

明·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东昌、济南、青州等各府奏,所属州县去冬无雪,今春立夏不雨,麦禾无收,计八十九州县大旱。《明实录》

明·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三月,东昌河决(注:运河)

聊城大水。《明实录》

明·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十五年(公元1479年),十七年(公元1481年),十八年(公元1482年),继续四年秋大水,禾稼被淹没。《东昌府志》

明·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秋,大水,平地深尺余,禾稼淹没殆尽。十九年大饥。二十一年大饥,人相食。《聊城县志》

明·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漕河大决(涉及聊城北部)。《博平县志》

明·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去年春夏大旱、大饥,今又旱,人相食。

明·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春至秋不雨,旱蝗遍地,大饥,人相食。(全省六十州县旱)《明实录》

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旱,大饥,斗米百钱,堂邑大疫,死者相枕。《东昌府志》《堂邑县志》七月,地震。《聊城史志资料汇编·大事记》

明·泓治五年(公元1492年),会通河溢(涉及聊城南部)。《阳谷县志》

明·泓治六年(公元1493年)秋,河(漕河)大决,遍地行舟(涉及聊城北部)。《博平县志》

明·泓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秋,东昌府河决。《东昌府志》

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十二月,大雪,平地数尺,拥门塞窗,人畜多冻死。《聊城史志资料汇编·大事记》

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秋潦,冬无冰。《堂邑县

志》

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大风阴晦,正月至六月不雨,禾麦尽枯,至秋仍旱,民多饿死。《聊城史志资料汇编·大事记》

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十年(公元1531年)夏,堂邑大雨雹。《东昌府志》

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漕河决,陆地行舟。《茌平县志》

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二月七日,地震。《聊城县志》

明·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三月二十八日,雨雹,大者如碗。《堂邑县志》九月二十二日,东昌强烈地震。《聊城史志资料汇编·大事记》

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旱,多风。四月初九日黑风蔽日,如夜。五月四日亦如之,麦尽伤。《聊城县志》

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清平、堂邑河决,水灾。《山东明代水旱灾害年表》

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秋,运河又决,平地水深数尺,禾稼荡然,民房漂溺,舟楫遍野者,弥月。《博平县志》

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聊城河(运河)决,大水。《山东明代水旱灾害年表》

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秋,河决,饥。《博平县志》

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十二月三日,东昌大雨及旦(夜以继日木冰),损木杀鸟。《东昌府志》

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七月,东昌大水,庄稼被淹。《聊城史志资料汇编·大事记》

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病疫流行,人民死亡甚重。《聊城史志资料汇编·大事记》

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去春大旱,树皮草根为食。今春夏大旱,盗起民逃,斗米百钱。《聊城县志》

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大旱。《聊城县志》

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六月,蝗。《聊城县志》

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各省灾伤,山东尤甚,民间剥树皮草籽至割死尸,有杀生人而食者。《明实录》

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八月,水溢。《聊城县志》《东昌府志》

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聊城狼群遍野,危害行人。《聊城史志资料汇编·大事记》

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东昌府所属各县,皆饥荒歉收,聊城受灾尤重。《聊城史志资料汇编·大事记》

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十一月,堂邑雨水,冰三日夜,大风拔木。《堂邑县志》

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秋,堂邑大雨,没庐舍。《东昌府志》

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运河决于聊城。《山东明代水旱灾害年表》

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黄河)水由莘县、堂邑流至馆陶东北归卫河,人传为黑羊滩水,漫及县境西部。《东昌府志》

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聊城旱蝗。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聊城、堂邑大饥。斗米百三十钱,人相食。《东昌府志》

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二月,东昌府地震。《聊城史志资料汇编·大事记》

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东昌大旱饥。《聊城县志》

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去年聊城大旱。十三年又大旱,野无青草,盗贼并起,人相食。《堂邑县志》

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春不雨,斗米千钱,糠秕亦值百钱,盗掘新死人至父子相食。夏大疫,死者相枕。秋,蝗起蔽天,人死者十之八九,有鼠千百成群,食禾苗立尽。《东昌府志》《堂邑县志》

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夏旱。《聊城县志》

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秋七月,黄河决于封丘金龙口溃金堤、冲漕河,水入东昌城内。西南房屋陷没,至十二年(公元1656年)冬,始消。《东昌府志》《聊城县志》

清·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九月,黄河在封丘北岸大王庙决口,由长垣趋东昌,坏平安堤、北入海,有二十县百姓漂泊流离达五年之久。《黄河变迁史》

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黄河决封丘金龙口,泛莘县及聊城。《东昌府志》

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东昌大旱饥。《聊城县志》

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六月,蝗灾。庄稼受害严

重。《聊城史志资料汇编·大事记》

清·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山东全省大旱,以聊城、德州、惠民为重,麦绝收,秋收微薄。《山东清代水旱灾情》

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旱。《聊城县志》

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旱,蝗。《聊城县志》

清·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五月,暴风,拔树毁屋,造成灾害。《聊城史志资料汇编·大事记》

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四月,地震。《聊城史志资料汇编·大事记》

清·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饥荒歉收。七月,久雨成灾。《聊城史志资料汇编·大事记》

清·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聊城、堂邑,大水无麦,秋又大水。《堂邑县志》

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聊城旱灾严重。《聊城史志资料汇编·大事记》

清·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秋,漕河决于聊城。《华北旱涝史》四月二十八日,大雨、冰雹。城东树木折伤,麦禾尽毁。秋,运河决口。《聊城史志资料汇编·大事记》

清·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聊城五月大雨,人饥相食。《聊城县志》

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旱。《聊城县志》

清·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四月二十八日,聊城、堂邑、馆陶大雨雹,麦稼尽毁。《东昌府志》

清·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春,大饥,米麦斗值四五百钱,转徙卖妻子者载路于时。秋大疫,死者相枕。《堂邑

县志》

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春,夏风霾大作,黄沙蔽天,麦禾枯。《聊城县志》

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秋雨连绵,东昌府被水成灾,秋霖雨(三日以上),水及郡城。《聊城县志》

清·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聊城去秋大雨,伤禾稼。今秋又淫雨,大水。《聊城县志》

清·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旱。《聊城县志》

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旱。《聊城县志》

清·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七月,山东兖州府属之阳谷、滕县,东昌府属之聊城、堂邑等县被雹。《清实录》

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秋,大水。《聊城县志》

清·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夏,蝗。《聊城县志》

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蝗蝻害稼。《聊城县志》

清·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至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的二十九年中,聊城发生大雨涝九次,其中连续三年的一次,连续两年的一次,民大饥。《东昌府志》《聊城县志》

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秋,蝗。《聊城县志》

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秋,蝗。《聊城县志》

清·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八月,聊城、博平运河漫溢……茌平、高唐一带大路水深三、四尽不等。《清实录》

清·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9年)秋,蚱蝗生。《聊城县志》

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1年)八月,蝗。《聊城县志》

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2年)秋,蝗。《聊城县志》

清·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全省大旱,聊城、临清、高唐、范县、东阿等七十八县春夏大旱,有的旱至秋季。人相食。《山东清代水旱灾情》

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秋,禾被旱。《聊城县志》

清·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运河决口,漫淹禾稼(涉及聊城北部)。《博平县志》

清·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秋,河决卫家楼,漕河溢。《聊城县志》

清·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东昌河决,聊城运河西岸龙湾堤漫决九丈。《清实录》

清·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岁雨水凶,徒骇河决。《聊城县志》

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夏秋连涝,东昌府大涝,山东有五十五州县被水、被虫(蝗虫)。《清实录》

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夏、秋连涝,东昌大涝,聊城大水浸城。《聊城县志》

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聊城、堂邑被雹。《清实录》

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决口,漫流入运,东昌大水。《聊城史志资料汇编·大事记》

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聊城堂邑连遭三年大旱。《聊城史志资料汇编·大事记》

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东昌大饥。《聊城史志资

料汇编·大事记》

清·光绪三年(公元 1877 年),全省特大旱年,齐河、聊城、堂邑、茌平等九十七州县大旱,有二十八州人相食。《山东清代水旱灾情》

清·光绪七年(公元 1881 年),大水,后连年大雨。光绪十六年、十七年(公元 1890 年、1891 年)尤甚,水与护城堤平,不溢者仅三寸,堤根渗漏,日夜筑堤防守,始获平稳,西南几成巨浸,往来必以船渡,行人苦之。至光绪二十五年(公元 1899 年)水患始息。《聊城县志》

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 1895 年),卫、运两河涨溢,沿河州县村庄多被淹没。《清实录》

民国七年(公元 1918 年)八月,雹灾。高粱 960 文一斗。二十年(公元 1931 年),遭受雹灾。《聊城水利资料》

民国二十年(公元 1931 年)六月,雹灾。《聊城史志资料汇编·大事记》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 1937 年)秋,淫雨连绵,(聊城地区平均降雨 978 毫米)客水汇于聊城,水深 1~2 米,洼地达 3 米以上,徙骇漫溢,冲破护城大堤。城墙漫塌五处,城关各街毁民房 3000 余间。农村人畜伤亡不计其数。《聊城自然灾害概要》 另据《莘县县志》载:“卫河在大名娘娘庙决口,洪水入莘境,加之本地之涝水,平地可行舟,成灾。《聊城史志资料·水利》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 1937 年)六月,地震。《聊城史志资料汇编·大事记》

民国三十一年(公元 1942 年),堂邑大旱。《聊城史志资料汇编·大事记》

民国三十二年(公元 1943 年),聊城、堂邑、冠县、莘县特大旱灾。自民国三十一年秋大旱,蝗虫遮天蔽日,尔后蝗蝻遍地,有的如蚂蚁密集成堆、成球。三十二年又大旱,麦无收。卖妻弃子,饿死无数。加上日伪顽军抢粮,掠夺财物,造成方圆百里的“无人区”。

民国三十七年(公元 1948 年)七月,大雨连绵一周之久,庄稼受灾严重。八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时,突降雹灾,大如鸡卵,小如大枣,,造成重灾。《聊城史志资料汇编·大事记》

六 历史沿革

聊城,是我国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早在六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

聊城名称之由来,据传,一曰:春秋为齐国西境聊摄地,后为齐国吞并,因国衍城,故曰“聊城”;二曰:此城因位于古聊河西岸,由河及名,然“古聊河”至今仍查无记载。总之,两说姑存,留待考证。

据《论语·微子》与《东昌府志》记载:聊城在商汤末期,为殷王之庶兄微子启受封之地。即“微子城在县东北十八里。”

西周时期,聊城为周郭国,周文王季弟受封于此。清《东昌府志》记载:“聊城县郭城,即亡国郭氏之墟。郭城在府东北。”

春秋战国时,聊城为齐之西境。当时,齐国在此筑城屯兵,为齐、燕两国争战之地。据《战国策》记载:鲁仲连射书退燕兵即于此。聊城始见于史乘。其古城址在城西北 7.5 公里“聊古庙”处,距今已有 2500 多年。

秦统一六国后,废旧制,设郡县,置聊城县为东郡地。

汉承秦制,行郡国并行之制,下统侯县,聊城属兖州部东郡,治濮阳。

东汉后期改治武阳。

西晋时期,全国分为十九州,聊城属冀州部平原郡。

东晋十六国时，政治变化无常，但后赵、前燕、前秦、后燕时，聊城均属兖州所辖。齐魏、北魏时，聊城属济州管辖。

北魏时，泰常七年（公元 422 年），安平王镇守平原，聊城县治所东迁筑之王城，为北魏时期的平原郡城。其城址在今城东 10 公里处。

隋朝开皇三年（公元 583 年）废郡，十六年（596 年）又于王城置博州。大业二年（公元 606 年）废。隋朝动乱，隋将宇文化及杀杨广，自江都举兵至此，隋臣郑善果从宇文化及据聊城。窦建德自称长乐王，攻陷其城，杀化及获善果，重置博州，领聊城、博平、武水、清平、高唐、堂邑六县。

唐代，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讨平窦建德。天宝初年，改博州为博平郡。

五代时期，石敬瑭灭后唐称帝，聊城属石晋（后晋）。开运二年（公元 945 年）黄河决口，王城被淹没，郡、县治南迁巢陵（在今城东南 7.5 公里处）。

宋代，改郡为博州，县、州治所在巢陵城。宋·淳化三年（公元 992 年）黄河决口，巢陵城毁，州县治所迁孝武渡西（孝武渡在通济闸上游，即今东关闸口南，聊城一中附近）。熙宁三年（公元 1070 年），筑土为城，即今之聊城。

金代，聊城为山东西路博州治所。县为州领，博州即聊城。

元代，聊城为山东宣慰司东昌路总管府治所，县为府领。东昌之名，始见于此。但是，东昌一词，并非始见于元代，而是在西汉之际。当时，东昌非一地名，而为一封号。汉宣帝刘询（公元前 113 年—前 49 年）封清河王刚之子成于聊城，为东昌

越侯，简称东昌侯。《东昌府志》云：“清河王刚子成封于此，东昌之名始见。”之所以名东昌，据传一曰因徒骇河东北过在平县遥昌乡；一曰聊城自秦以来属东郡，因“东”又加含吉祥之意的“昌”字而取名。1789年征集民工开凿南起东平、中经聊城、北至临清的会通河，即今贯聊城的古运河。会通河的开挖，在历史上对聊城的繁荣起着重要作用。

明代洪武七年，改东昌路为东昌府，聊城为其治所，县为府领。明在此设平山、东昌两卫，置重兵镇守。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由东昌守御指挥佥事陈镛主持，将宋筑土城改建为砖城。

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陈镛出于军事需要，为“严更漏窥敌望远”，用修城余木于旧城中央建造了更鼓楼，即今光岳楼。明·惠帝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燕王朱棣靖难之师曾力战于城下，明·成祖九年（公元1411年），征集民工15万疏通会通河，使载重千石的漕船能以顺利通过。聊城开始成为沿河九大商埠之一。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莫与齐在城墙上又修筑敌楼27座，城墙垛口2700余，四门建敌楼，使此城更加坚固，巍峨壮观。

清代，聊城仍为东昌府治。乾隆年代漕运达到鼎盛时期，聊城声位愈增，被誉为“挽漕之襟喉，天府之肘腋……江北一都会”。秦晋、江南商贾云集，“山陕”、“苏州”、“江西”、“武林”、“赣江”等八大会馆傍河而立。河中桅杆如林，岸边货积如山，白日车水马龙，夜间灯火通明，大码头一带成为物资集散的重要港口。附近，刻书、印刷、制笔等作坊遍布。至今仍流传着“金太平、银双街、铁打的小东关”等种种说法，生动地

反映了当时这一带的繁华景象。康熙帝曾来聊 4 次，乾隆帝东巡、南巡过聊 9 次，5 次登光岳楼。当时的画师曾根据聊城城池、运河、铁塔、光岳楼等绘出“光岳晓晴、巢父遗牧、崇武连樯、绿云春曙、古瓷铺琼、圣泉携雨、仙阁云护、铁塔烟霏”等东昌八景，刊入《南巡盛典》一书。由漕运带来的兴隆繁盛延至清代咸丰四年（公元 1854 年），长达 400 余年之久。明、清兴隆繁盛，书院林立，文化名人辈出。据府、县志记载，这期间聊城考中状元 3 人，进士 99 人，举人 439 人。“任、邓、朱、傅、耿”堪称历史五大名人。清·道光年间，江南漕运总督杨以增在此所建的“海源阁”藏书 20 多万卷，为清代四大藏书家之一，深为国内外藏书界所钦羡。清·咸丰十一年（公元 1861 年）的宋景诗起义，清末山东义和团首领朱春登都是以这里做为活动中心的。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废府设道，东昌为东临道，辖 29 县，聊城为其治所。1926 年 1 月，改东临道为东昌道，辖 14 县，聊城为其首。1927 年，中国共产党鲁西中心县委在聊城成立，并组织了震撼鲁西平原的“坡里农民起义”。1928 年，全国改道为行政区制，聊城县直属山东省。1936 年，聊城为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辖 12 县。“七七事变”后，共产党鲁西北特委同行政督察专员范筑先合作，建立鲁西北抗日根据地。1938 年 11 月 15 日，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在此壮烈殉国。1940 年，鲁西北行政公署成立，为纪念范筑先将军，改聊城县为“筑先县”。1947 年 1 月 1 日，聊城解放。当时为了防止敌人重占聊城，遂将城墙拆毁。

新中国成立后，恢复聊城县，隶属平原省聊城专区。

1952年10月平原省撤消，聊城专区划归山东省，聊城仍为专区驻地。1956年4月，堂邑县撤消，其所辖马颊河以东31乡划归聊城县。1958年12月，改聊城县为聊城市，1963年4月改市为县。1983年8月，撤消聊城县，恢复聊城市，仍为聊城行政公署驻地。

七 名胜古迹

(一)古代建筑

山陕会馆

山陕会馆位于聊城东关古运河西岸。坐西朝东，面河而立。

明清两代，聊城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商贾云集，车樯如织，各地富商竞相集资兴建会馆，以作“祀神明而联桑梓”之用，山陕会馆是当时众多会馆中的一个，其后，随着运河水运交通的衰落，诸会馆相继废弃毁坏，唯有山陕会馆保留至今。

山陕会馆亦俗称关帝庙，是山西、陕西商人集资合建的一处神庙与会馆相结合的古建筑群。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始建，历经四年，山门、正殿等主体工程竣工。其后逐年扩修，至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方具现在之规模。会馆东西长77米，南北宽43米，占地总面积3311平方米。整个建筑群由山门、戏楼、夹楼、钟鼓二楼，南北两看楼、南北两碑亭、南中北三殿、春秋阁、望楼、游廊、南北两跨院配房等亭、台、楼、阁一百六十余间所组成。大小房间凡起脊屋脊及挑角正檐处均饰以龙兽鸱吻。整个建筑不仅布局紧凑，设计合理，而且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

山门

山门，即会馆的大门，为三间牌坊式门楼。顶部呈歇山式，下由八根木柱支撑着整体，有六层如意斗拱承托着金壁辉煌的琉璃瓦顶。牌坊下辟一正门和两个便门。正门高3米，宽2.3米。门框用灰石雕成。其纹饰是二十只不同姿态的仙鹤飞翔于祥云之中（上部六只，左右各七只）。上部两角部位是用浮雕手法雕成的凤凰，中间为麒麟。两便门各高2米，宽1米。门框亦为青石雕成，纹饰是祥云蝙蝠。正楼顶下有木质浮雕垂花门罩，内容为托塔天王等佛教人物和大象、骆驼、麒麟等佛教吉兽。其下为“山陕会馆”的石雕匾额。笔力道劲，浑厚大方。正门两侧的门柱上刻有木质楹联一副：

本是豪杰作为，只此心无愧圣贤，洵足配东国夫子；

何必仙佛功德，惟其气充塞天地，早已成西方至人。

对联主要是歌颂关羽，但也正好体现了会馆即是关帝庙的宗旨。

左右便门上亦有石刻匾额。左为“履中”，右为“蹈和”。便门两侧为砖砌八字形影壁，上有砖雕垂花罩，左刻“精忠贯日”，右刻“大义参天”，仍为对关公的高度评价和赞扬。

戏楼

戏楼，座东面西，为三层三间重檐歇山建筑。进入山门，首先看到的是戏楼的后山墙。山墙中央，有一条从戏台下穿过通往前院的甬道。甬道宽2.16米，高2.12米，入口处有砖雕垂花门罩。门罩上方有一石刻横匾，“岑楼凝霞”四个大字颇见功夫。甬道左右各有一个石刻照壁，左刻松鹤，右刻梅鹿，松鹤象征着多寿，而鹿者禄也，乃多财之意，体现了商人的两种愿望。照壁下有精致的石刻插屏架，上有细腻的砖刻垂

花壁罩，壁罩上装饰有琉璃制黄牡丹、绿麒麟和万年青等。在山门和戏楼之间，还有一遮雨过楼将二者联为一体。在遮雨过楼上，原还挂有“祖述春秋”木刻匾额一方，后不知毁于何时。

戏楼的正面为三间台口。戏台呈方形平面，台高 2.3 米，前台宽 9.6 米，深 5 米，后台宽 8.6 米，深 3 米。台上有四根方形檐柱支撑顶部，结顶正脊为歇山式，又于左右各出歇山，成十翼角，房面覆绿黄二色琉璃瓦。四根檐柱均为石雕。次间柱础刻有花卉图案，明间柱础正面，左刻“吉庆”，右刻“如意”，均为变形篆。柱身刻有楹联。内联楷书阳文：

宫商翕奏，赏心是金榜题名洞房花烛；

扮演成文，快意在坦道骏马高帆顺风。

外联楷书阴刻：

结五万春花，奏雅宣和，无戾风骚称杰构；

谱大千秋色，镂金错彩，有神世教既奇观。

戏台迎屏上原绘有四幅大型花卉。迎屏左右木柱上刻有阳文楹联：

响遏行云，一曲笙簧欣乐利；

歌翻白雪，八方舞蹈荷升平。

戏台折屏上各有一幅石刻工笔图画，左为“海市蜃楼”，右为“天台胜景”（均高 1.80 米，宽 0.58 米）。戏台藻井色彩明快，遍绘蓝地及白色团鹤图案。戏台额枋玲珑剔透，中间雕刻福祿寿三星和两条飞龙，左右刻人物莲花，皆栩栩如生。

夹楼

夹楼，位于戏楼的两侧，为二层三间单檐建筑。中间一间屋顶高起，下有拱门内外通行。东向门上各有石雕匾额一方，

左为“对岳”，右为“望海”。两侧小间的二楼均开有东向圆窗，上部均装饰有木质垂花莲柱。西侧则为大花棂窗。上层楼内原为演员们的化装室和休息室。在楼内的墙壁上，至今还可隐约地看到清·道光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咸丰二年、三年、五年、七年、十年，同治十年、十一年，光绪十一年、十三年，民国二年、八年，前后一百二十多年中，山西、山东各地的戏曲班社和教育部的易俗社、各个时期的演员们所写下的对“戏东”、“班社主”不满的诗句以及京剧、山西梆子、河北梆子等剧种的一百二十多个传统剧目，这些剧目，对于研究中国的戏剧史，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钟鼓二楼

钟、鼓二楼南北对称，分列于夹楼外侧。均为单间二层重檐歇山十字脊方形楼阁，筑于高近4米的砖石方台之上。楼四面各有十二根檐柱承托着第一层房檐。房面覆灰瓦，饰脊兽。钟楼位于会馆的东北角，楼阁南门上有阳刻“振聋”横匾一方，南面中间的石柱上有阴刻楹联一副：

其声大而远，

厥意深且长。

鼓楼位于会馆的东南角，楼阁北门上也有阳刻“警聩”的横匾，北面中间的石柱上也有一副阴刻楹联：

当知听思聪，

岂可耳无闻。

此钟鼓二楼正体现了神庙中的晨钟暮鼓之习，也是会馆和神庙相结合的例证。

钟鼓楼下各有一小院，院内翠竹茂密，院墙上各有一圆形月门通往庭院。

庭院

庭院，由戏楼，南北中三大殿、南北看楼，南北碑亭所围成。东西深 23 米，南北宽 33 米，中间有一条平直的石板路，路两边各有株百年古槐，浓荫如盖。庭院的正面是大殿，大殿台阶下，有一对高大雄健的石狮。石狮呈蹲式，座高 1.2 米，通高 3.18 米。狮座中间束腰，通体浮雕花瓶、瓜果、钟、塔、荷、梅、红蓼、枇杷等。

看楼

看楼，位于庭院的两侧，面阔五间，上下两层，楼长 16.5 米，深 5 米，房面为灰瓦卷棚顶。为当年众商们边看戏、边喝茶、边谈生意的地方。

南、北两碑亭

南、北两碑亭，分列于南、北两看楼的西首。各为三开间，歇山顶覆以筒瓦，飞檐高出看楼和大殿房面。碑亭正面全部敞开。额枋上彩绘日出、龙虎、瓜果、人物图案。南北亭下各竖立四幢石碑，举目可见。即南碑亭竖立的四幢石碑西数第一幢为清·嘉庆十四年立的“山陕会馆众商重修关圣帝君大殿、财神大王北殿、文昌火神南殿暨戏台、看楼、山门并新建飧亭、钟鼓楼序碑”。第二幢为嘉庆十四年立的“春秋阁碑”。第三幢为同治四年立的“山陕众商会馆续拨数釐金碑记序”。第四幢为嘉庆十四年立的“会馆大工告竣碑记序”。北碑亭中，西数第一幢为清·乾隆三十一年（公元 1766）立的“山陕会馆重修戏台、建立看楼碑记”。第二幢为嘉庆二十二年立的“山陕会馆接拨釐头碑记”。第三幢为道光二十五年（公元 1845 年）立的“重修山陕会馆戏台、山门、钟鼓亭记”。第四幢为乾隆十一年（公元 1746 年）立的“山陕会馆碑记”。此外在南北

碑亭的东西墙壁上还分别镶嵌着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山陕会馆置买园地阔步数目、四至及买价画字税契碑”,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山陕会馆建修南北亭等费用开支碑”。这些碑刻,基本上较完整的记载了会馆买地、始建、历次重修、各次修建所用的银两开支数目等,是研究会馆的重要文字资料。特别是八幢立碑的背面,还刻有各商号名称及其捐银数目,为研究清代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南、北、中三大殿

三大殿,即中殿和南北配殿。中殿即关帝大殿,北配殿为财神殿,南配殿为文昌火神殿。座落在会馆的中部,与戏楼对峙,为会馆的中心建筑。

关帝大殿,即三大殿的中间三间大殿,也称正殿。顶部硬山起脊覆绿色琉璃瓦,并高于南北配殿。关帝大殿前廊有方形石柱四根。石柱正面刻有楹联,内柱刻阳文:

伟烈壮古今,浩气丹心,汉代一时真君子;

至诚参天地,英文雄武,晋国千秋大丈夫。

外柱刻阴文:

非必杀身成仁,问我辈谁全节义;

漫说通经致用,笑书生空读春秋。

四根檐柱的上方,镶有三块木质透雕额枋,中间一块刻有老子和八仙人物。左边刻有“神仙传”故事。右边刻有“行孝图”,即我国古代二十四孝中“《哭竹生笋》、《扇枕温衾》、《怀桔遗亲》、《为母埋儿》、《闻雷泣墓》、《恣蚊饱血》、《卧冰求鲤》等故事。三块木质透雕额枋的上方,除绘有六幅《西游记》故事工笔画外,还木雕牡丹花十二朵作为装饰。檐廊正中,悬挂有木

质阳文匾额，上书“大义参天”四字。

关帝大殿，又分为献殿和复殿，即前为献殿，后为复殿。并两殿中有过廊相隔。进入献殿迎面可看到西墙正门上“富国裕民”的木质匾额。当年，人们一般祭祀关公或商贾们聚会多在此殿进行。献殿的后面为过廊，并与南北配殿中献殿后面的过廊相通。由过廊向北或向南，都可通过廊两头山墙上的角门进入南、北跨院。南角门外侧的上方，镶有石刻匾额，上书“南极”二字，以和北角门外侧上方的“北拱”二字相对。过廊的后面是复殿，即复殿紧靠献殿。复殿中间的偏后部，原有一暖阁，暖阁前供有三尊楠木雕像。即中间的为关圣帝君，两侧分别为关平和周仓。关帝像高3米，身穿刺绣滚龙袍。鎏金冕旒，威丽端庄，俨然帝王形象。关帝神像的前面，原有一神案，神案前顺序排列有典铜铸造的大型五供。五供之后，竖立一柄青龙偃月刀，刀杆中间斜挂一口锃锋夺目的长剑。正殿中复殿的后面仍有檐廊，廊下有木质圆柱四根。圆柱下皆以精致的石雕作为柱础。四根檐柱的上方，镶有三块木质透雕额枋，中间一块雕刻有人物和牡丹，南北两侧雕刻有飞龙麒麟等。均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在檐廊的迎风板上，两侧还装有“道续尼山”和“义秉麟经”的镶匾。八个大字，进一步体现了关帝庙中所信奉的是道地的儒家正统思想。

财神殿，即三大殿中的北大殿。位于正殿的北面，是当年众商们祈祷发财的地方。

财神殿也同样分为献殿和复殿。并两殿檐部原有天沟相接，即将两殿连在一起。献殿的前廊有方形石雕檐柱四根，檐柱下各以石雕的麒麟、大象作为柱础。檐柱的侧面、背面分别刻有花卉图案，正面分别刻有两副楹联。内柱上刻阳文：

德兆阜財，萃萬國物華天寶；

行以利涉，慶一時海晏河清。

外柱上刻有陰文：

位津要而掌財源，萬里腰纏畢至；

感錢神以成砥柱，千秋寶載無虞。

四根檐柱的上方，鑲有三塊木雕額枋，中間的一塊刻有六只飛雁和一座城堡。兩側分別刻有鼎、花瓶、香爐和石盒。檐廊的正中，懸挂有木質陽文匾額，上書“功司利濟”四字。財神殿獻殿的後面為復殿，原供有財神大王的神像，可惜不知毀于何時，至今已蕩然無存。

文昌火神殿，即三大殿中的南大殿，位於正殿的南面，並與財神殿相對，是當年眾商們祭祀文昌火神的地方。

文昌火神殿的設置大致和財神殿相同，即前為獻殿，後為復殿。獻殿的前廊，有方形石雕檐柱四根。檐柱下各以石雕的麒麟、大象作為柱礎。柱礎的側面分別刻有仙鶴祥雲的花卉圖案，正面刻有楹聯。內柱上刻陽文：

氣本似珠，看午夜光分奎壁；

功原濟水，居離宮位按丙丁。

外柱上刻陰文：

位南天以居尊神焰熒熒臨斗柄；

鄰北極而宰化星精朗朗俯魁垣。

四根檐柱的上方，鑲有三塊木質額枋，中間一塊刻有首尾相接、神態各異的七只芦雁和菊花，兩側的兩塊各分別刻有梅花、荷花瓶、大香爐和茶壺。檐廊的正中，懸挂有一方木質陽文匾額，上書“風時浪恬”四字。文昌火神殿獻殿的後面即復殿，原也供有文昌火神像，不知毀于何時，至今已不存在。

春秋阁

春秋阁，位于会馆的最后。面阔三间，上下两层，单檐歇山，灰筒瓦顶，斗拱抬梁式结构。阁前廊有木质檐柱四根，自地面直达檐部。前廊额枋均为木质透雕，内容为人物、牡丹、金瓜花卉等。中间迎风板上刻“金阙巍煌”四字。南间刻“层构飞甍”四字。北间刻“翔翬栖凤”四字。春秋阁左右还各附设一座望楼，望楼紧依春秋阁，上下各一间。两望楼券门上各有扇形匾额一方，南曰“接步”，北曰“登阶”。春秋阁前左右各有游廊三间。

春秋阁过去也是供奉“关帝”的处所。一楼内原有大幅关羽画像，二楼原装饰有木雕关羽生平故事连环画，现已失存。目前，只有二楼西墙上还仍保留着一方阴线石雕的关羽全身像。

春秋阁楼上中间的脊檩上有两行朱墨字：“大清嘉庆癸亥（公元1804年）九月壬辰补建春秋阁三间，于十一日卯时上梁大吉。信士：山陕众商阁会等同心沐手谨志。”从中可知其楼阁为会馆创建六十年后所兴修。

会馆后墙北侧还辟有后门，门上有石刻横匾一方，上刻“会馆”二字。后门内是一小巧的四合院，院内有东屋三间，南屋三间，西屋两间，并有门通往会馆北跨院。北跨院原是一个花草繁茂的花园。

山陕会馆是一座集商业与文化之大成的古建筑群。整个建筑中，除保留的亭台、楼、阁一百六十余间外，还保存有历年重修大小碑刻十九幢，石雕方檐柱三十根，浮雕、透雕和精密木质额枋四十二方，作为柱础的石雕狮子、大象、麒麟等十二

座，照壁、折壁人物、花鸟、山水等石刻画十二幅。上百个柱础上几乎都刻有花草鸟兽等装饰。尤其木柱上刻的楹联两幅，石柱上刻的楹联十副，正楷行书兼备，阴镌阳刻皆有，为难得的书法珍品。因此，山陕会馆在建筑、雕刻、绘画、书法诸方面，都具有较高的艺术鉴赏价值。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对山陕会馆这座古建筑群一直非常重视，一九七七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九八八年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光岳楼

光岳楼位于聊城旧城中央，始建于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其建造与筑城有着密切的关系。聊城城墙始筑于宋·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当时为土城。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东昌卫守御（明时聊城为东昌府治，有二卫，即东昌卫、平山卫）指挥佥事陈镛为了军事上的需要，主持改筑为砖城。并且在改筑砖城的同时，复因“严更漏而窥敌望远”并利用筑城余料，于洪武七年（1374年）始建此楼。实际上此楼是有其一定的政治、军事意义的。

“光岳楼”初名“余木楼”，到明·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重修时，又因地为名，称之为“东昌楼”。清·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西平李赞（考工员外郎）在他“题光岳楼诗序”中说“余过东昌，访太守金天锡先生。城中一楼高壮极目。天锡携余登之，直至绝阁，仰视俯临，毛发欲竖。因叹斯楼，天下所无。虽黄鹤、岳阳、亦当望拜。乃今百年矣，尚寞落无名称，不亦屈乎？因与天锡评命之曰：‘光岳楼’，取其近鲁有光于岱岳也。因和敖翰林诗一律，以归天锡，不知斯楼以为

何如？”此后四百八十年来历代重修碑记中，都一直沿用“光岳楼”，但人们仍习惯地称它为“鼓楼”。

光岳楼为四重檐十字脊楼阁，由楼基和四层主楼组成，共有踏跺一百一十级，总高三十三米。

光岳楼楼基为砖石砌成的正方形高台，台平均底边每边长 34.43 米，垂真高度 9.38 米，上缘每边长 31.93 米，下大上小，有显著的收分，呈四角台体。四面各壁半圆拱门，券至台中心处是十字交叉拱。拱门面阔平均为 5.76 米，拱脚直高 2.90 米，矢高 2.88 米。券上中砌门额，过去的题名：南曰“文明”，北曰“武定”，东曰“太平”，西曰“兴礼”。台顶边用叠涩出檐砖三皮，上筑女儿墙，墙高 1.2 米，厚 0.45 米。因运河关系，东关为市肆区，似应面东为主向，然而此楼却仍以南向为尊。所以光岳楼巨匾多悬于南面四层檐下。南向拱门两侧开二小拱门，形制与中间的拱门相似，东侧的砖镶匾额为“凤城仙阙”，西侧为“阆苑瀛洲”。西门为假门，只存形式。东门是登楼的唯一通道，门宽为 3.14，拱脚直高 1.75 米，矢高 1.57 米，而实际使用仍嫌过大，于是在券内另砌小券，门洞宽度仅为 1.86 米。入门内为一方室，东设踏跺，升四级至梯台，南壁有一小窗，供通风透光之用。北转升三十七级至平台，再升十四级达台面。共计五十五级。梯台上修一卷顶敞轩可以防雨水之侵入。其建造年代，应为清乾隆年间。又适在楼东之中线上，并由于东关为主要大道，故增此建筑作为标志。敞轩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卷棚顶，不施斗拱，更觉明快轻巧，与楼形成极好的对比，这也是我国的传统建筑惯用手法。明间、次间面阔皆 2.30 米，梢间则为 0.67 米，仅及明次间面阔三分之一。而梯井地位占明次三间，梢间形成一周敞廊。

故除其北面为梯道出入口外,其余三侧柱间砌以槛墙。台面墁砖,绕以女墙,其东西两侧各设排水道。

第一层楼地面比台面略高,约为10厘米,呈正方形,四周围以阶条石。此层楼有四门、八窗、六十四柱。面阔与进深都是七间,明间面阔特大,约4.05米。次间、梢间较明间为小,自2.75米到2.90米。屋间面阔顿小,自1.75米到1.89米,尚不及明间之半,即为楼身的迴廊。大概就是宋《营造法式》所谓的“副阶周匝”。楼身檐柱一周共二十根,直径0.60米,全部包于厚达1.34米们的砖墙内。每面明间设二个板门。两次间开窗。内槽金柱一周计十二根,直径0.60米。金柱及檐柱长度直达三层,通高11.58米,且内外等高。此楼建造为扩大中央空间,将“当心间”之“四大金刚柱”全部省去,形成九间大空间。此层在北向门内,即明间檐柱与金柱间置穿插枋,上搁楞木楼板以承鲁班神龛,左右设小梯可升降。东向次间为登二层的通道,由南向北上四级至平台,东转升九级进入梢间平台,折南十四级达第二层楼面。

第二层楼内外有柱六十四根,面阔进深均七间,楼外设迴廊及木栏杆。该层四方明间辟门,两侧为方眼格窗,东西两次间为梯井通上下层。内槽金柱内用板壁围成一长方室,中又经大小间分,南向中间辟门,左右开圆窗。仰视之上为空井,可见四层之梁架,此室系后构,过去用于供“文昌”之用。

第三层是暗层,实际为结构层。面阔进深均为五间,檐柱二十根,金柱十二根都自下直贯而上,即内外槽柱列。内外柱间是梁架,与二层贯通,故暗层实仅三间,中间为空井,四周置栏杆。

第四层为楼之最高层,共有柱二十八根,面阔进深皆三

间,平面呈正方形,较其下诸层骤然缩小。明间面阔 5.66 米,大于其他各层明间,目的显然是为十字脊加长,以适应整个形体对称。明间设窗六扇次间装冰纹圆窗。中间为空井,四周设栏杆。楼顶为十字顶,顶下垂伏莲及莲实,四角为木刻浮雕人物及花鸟装饰。

楼脊为歇山十字脊,脊顶装有一座高三米,直径 1.5 米的透花铁葫芦(不知何年而设),1937 年范筑先时在铁葫芦上加上了自动风向标。

光岳楼上的建筑构件,大部分是初建时的原物,虽几经维修,但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面貌,是明初建筑的重要遗物,并许多地方保留了宋元风格。以形式而论,砖台、重檐、十字脊内部置空井等,仍袭宋元楼阁遗制;就结构来讲,柱之侧角升起,楼置暗层,内外等高双槽柱列,斗拱疏朗比值,以及柱头科斗口未加宽等,则上承了唐宋以来的传统作法;同时也与其它明初建筑有若干相似之处,开“官式”建筑之始。所以光岳楼是古代建筑史由宋元向明清过渡时期的代表建筑。

在光岳楼上,原曾有匾额十四方,楹联一副,分别悬挂于楼之各层。基座上有两方石匾,分别镶嵌在南面两侧小拱门的上方,东曰“凤城仙阙”,西曰“阆苑瀛洲”。楼梯口处横匾曰“共登青云梯”。一层楼上有匾两方,悬挂于东、南两门之上,东曰“泰岱东来作翠屏”,南曰“宇宙文衡”。北门金柱上有木刻楹联一幅:

泰山东峙,黄河西临,岳色涛声,凭栏把酒无限好;

丛台射书,魏乡明志,义行高路,登楼怀古有余馨。

二层楼四面各悬挂横匾一方,东曰“太平楼阁”,北曰“望阙承恩”(后改为“宇宙文衡”),西曰“就日瞻云”,清康熙皇帝的御

匾“神光钟映”匾额挂于南面。四层楼的南面悬挂有清乾隆年间状元邓钟岳题写的“光岳楼”巨匾。另外,在二层“文昌殿”和一层“鲁班庙”上方,分别悬挂着“履中集福”、“文光射斗”、“文明景运”和“巧夺天工”四方匾额。

在光岳楼上,原还有石碑九幢,横条壁碑十六块,九幢石碑分别立于一层楼东向门外廊下,其中两座是乾隆皇帝登光岳楼的御题诗碑,其余的均为光岳楼重修碑。十六块横条壁碑分别嵌于一层楼上周墙壁上,其中四块是重修光岳楼碑,十二块是明清两代文人的题诗碑。

据文献记载,光岳楼在六百多年来,只解放前就进行过十二次维修,并所经维修多有碑记,这些碑刻大都由当时的东昌知府或名人撰文,书丹。如一层楼的南门西侧清·道光二十二年立的“重修光岳楼碑”就是由著名藏书家“海源阁”藏书楼的创始人杨以增撰写的。可惜这些碑刻及匾额在十年动乱中遭到严重破坏,本来遗留不多的匾额被横扫一空,九座石碑全被拉倒,乾隆皇帝的两座御碑,均被砸毁只有壁碑幸存下来。近年来,文物工作者已把残存的几块石碑树立起来,使这些古代文化遗产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1988年,光岳楼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海源阁

海源阁位于聊城旧城内光岳楼南百米开外的万寿观街东段路北杨氏第三进院北房东首的跨院内。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为我国清代著名藏书家杨以增的私人藏书楼。并由于杨氏祖孙几代人的努力,使海源阁的藏书多达三千七百零五部,二十二万四千六百余卷。其藏书之宏富,版

本之精善，海内闻名。因此，世人常把它与江苏常熟县瞿绍基之“铁琴铜剑楼”、浙江杭州丁申、丁丙之“八千卷楼”、浙江吴兴陆心源之“皕宋楼”合称为中国清代四大私人藏书家。其中又以瞿杨两家宋元刻本为最，因此又有“南瞿”、“北杨”之称。

海源阁为坐北朝南四开间二层楼房。楼为砖木结构，硬山瓦顶，外观朴实无华。其下为杨氏家祠，上为宋元珍本藏书处。海源阁藏书楼上层中间门楣上悬有杨以增亲书“海源阁”阳文匾额一方（白地蓝字，长 1.12 米，宽 0.45 米）。跋为：“先大夫欲立家庙未果，今于寝东先建此阁，以承祀事。取‘学记’‘先河后海’语，颜曰‘海源’，盖寓追远之思，并仿鄧范氏以‘天一’名阁云。时道光二十年岁次庚子亥月是浣，以增敬书并识。”下有“杨以增印”和“至堂”阳文篆刻书印章两方。楼下家祠门前的金柱上悬有木刻楹联一副：

‘食荐四时新俎豆；

书藏万卷小琅环。

这是海源阁的主藏书楼。实际上，整个杨氏院落都与这一海内闻名的藏书楼密切相关。

杨氏的宅院，其中轴主线上为四进院落。大门坐北朝南偏东侧，西部为南屋三间。二门位于中轴线的正中。二门以内两侧为东西书屋，正北为前客厅。五开间硬山建筑。穿过前客厅就是第二进院，有东房、西房各三间，与前客厅相对的是五间后客厅，穿过后客厅是第三进院，为杨氏住房，有北房五间，东西房各三间。第四进院亦是海源阁的重要藏书处。有北房五间，东西瓦房各三间，明清版本的书籍多藏于北院。海源阁藏书楼的后部为花园，前院东侧有带门窗木栏杆的长廊式读书亭，分为南北两座。有人认为这是外来借书者的读

书处,其粮食、帐房、厨房等一应生产、生活用房,都设在东北的小院内。

海源阁的藏书处,除了聊城内的杨氏宅第外,还有肥城城西华胥庄的“陶南山馆”(又名“眉园”)。其“海源阁丛书”的全部书版原也藏于聊城城内杨宅后院,以后迁移到聊城西南二十五里的田庄“弘农丙舍”(又称“厚遗堂”)其中有些书板还是活字板木字和铁范。是研究中国近代出版印刷业的重要实物资料。可惜,毁于战乱之中。

海源阁的兴衰大体经历了创业、发展、守业、败散四个阶段。

1. 创业阶段

海源阁创业阶段,即杨以增时期。杨以增(公元1787—1856年)字益之,号至堂,一号东樵,清·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九月十六日生于聊城一个知识分子家中。自幼酷爱读书和藏书。他在三十五岁(公元1822年)考中进士后,开始步入政坛。先在贵州省任知县、同知、乡试同考官,贵阳府知府。继任广西省左江道、湖北省安襄荆郢道,后调河南省开归陈许道。五十二岁时升两淮盐运使,未到任,擢升甘肃省按察使。五十八岁升陕西省布政使,代陕西总督,代理陕西巡抚。五十九岁真除陕西巡抚并权陕甘总督总理粮台。六十岁升江南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卒于任所。他于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开始收藏宋元珍本。他所处的时代,正是道、咸混乱之际。特别江南,更是处于内忧外患的漩涡之中。南方许多私人藏书家的藏书时有散出。先是苏州大藏书家汪世钟的“艺芸书舍”的藏书散出,这时,杨以增正任

江南河道总督，以最有利的条件，把这批藏书购得，用粮船沿大运河运往聊城的海源阁藏书楼。为海源阁藏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发展阶段

海源阁的发展阶段，即杨以增之子杨绍和时期。杨绍和（公元1832—1875年）字彦和，同治四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日讲起居、翰林院侍读等职。他在北京为官时，清室怡府“东善堂”藏书散出。而“乐善堂”藏书原得于毛晋“汲古阁”、钱曾“述古堂”，多系名家之旧藏，宋元珍本十分丰富。杨绍和将“乐善堂”散出的藏书，尽力搜购。仅这一次就购得精善之本一百余部。极大地丰富了海源阁的藏书。使海源阁藏书发展到鼎盛时期。改变了以往藏书中心多居于南方的格局。正如著名学者王献堂先生所说：“余以目验所及，知其得于乐善堂者，正不亚于艺芸书舍……综上两支，可知杨氏藏书，半得于南，半得于北。吸取两地精帙，萃于山左一隅，其关于藏书史上地位之变迁，最为重要，以前江浙藏书中心之格局，已岌岌为之冲破矣。”

3. 守业阶段

海源阁的守业阶段，即杨以增之孙杨保彝时期。杨保彝（公元1852—1910年）字凤阿，同治九年举人。历任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山东优级师范教务长，山东通南局会纂等职。他曾编集“海源阁书目”（未刊）六卷，计分经、史、子、集四部，共书三千二百三十六种，计二十万八千三百卷有奇。又编“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四卷，计分经、史、子、集四部，共书四百六十四种（据后来王献堂先生考证，实为四百六十九种，一万六千三百余卷。）一万一千三百二十八卷。

4. 败散阶段

海源阁的败散阶段,即其曾孙杨承训时期。当时为了避免藏书毁于土匪战乱之中,先后曾将藏书中的珍本分散到天津、济南等地。一九二七年,杨承训首先将海源阁所收藏的主要宋元珍本,移藏于天津英租界寓所。所藏明清版本的书籍,移藏于济南纬一路东兴里杨氏所建的新居内。一九三一年,又将部分宋元珍本以八万银元抵押给天津的盐业银行,日寇投降后,展转归于北京图书馆。济南所存明清版本书籍,后归山东省图书馆。而留存于聊城海源阁的部分藏书,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聊城两次被土匪占据时,几乎被抢劫一空。

海源阁的藏书有两大特点,一是宏富,二是精善。所谓宏富,不仅有见于著录的三千七百多部,二十二万四千陆百余卷,还有不见于书目的唐人写经、宋元抄本,明清珍本等。另有书画、碑贴、砚石、印章等收藏也极丰富;所谓精善,是指其宋元珍本之多。为标明对宋元珍本之重视,特辟“宋存书屋”。杨以增不惜重金,购存宋元珍本。其宋本《史记》,以“三百八十金购之吴门”;宋本《汉书》“以朱提五百易得之”。可见杨氏在购存善本书时,是不遗余力的。经过杨氏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使其所藏宋元珍本十分丰富。据杨保彝所编《海源阁宋元秘书目》计,有四百六十九部(王献唐《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序)一万六千三百余卷。这是国内私人藏书家中的所无以匹敌的。

海源阁的几代主人,不仅致力于藏书,而且还致力于刻书。特别是杨以增,在其好友梅曾亮、包世臣、高均儒,吴熙载等人的帮助下,先后刻印了“海源阁丛书”数十种。如《叶石农

先生自编年谱》、《蕉声馆集》、《蔡中郎集》、《三续千字文注》、《九水山房文存》、《艺舟双楫》、《六艺纳目》、《助字辨略》、《唐求诗集》、《牧今书》、《惜抱轩尺牍》、《小沧山房尺牍》、《柏砚山房文集》、《楹书隅录》等书，都是杨以增时期刻印的。其子杨绍和、孙子杨保彝又刻印了《杨瑞勳奏疏》、《禹贡九州图》、《恒星赤道图》、《皇朝一统图》、《万国地球图》、《今释古今图》等书。其曾孙杨承训在一九二〇年又刻印了杨氏三世先人的诗文集《退思庐文存》、《仪晋观堂诗钞》、《旧瓶斋诗词钞》等书。

杨氏藏书印章也是很多的。杨以增之父杨兆煜时，就有“古东郡厚遗堂杨氏藏书”的印章。杨以增的藏书章常见的有“杨氏海源图”、“宋存书室”、“四经四史之斋”、“杨东樵读过”、“杨以增印”等。杨绍和则有“仪晋观堂”、“杨绍和藏书”、“杨绍和”等。杨保彝有“杨氏伯子”、“陶南山馆”、“聊城杨氏三世守藏”等印章。据统计，到目前为止，杨氏五代人所使用过的藏书印章约有六七十种之多，如果能将这些印章收存到一起，也是一批相当重要的文物资料。

海源阁在我国藏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我国的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将海源阁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只是后来保护措施落实的不够得力，致使海源阁日趋残破，最后遭到全拆除的厄运。

为继承和发扬前人热爱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努力发掘和保护伟大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一九九二年十月，聊城市人民政府筹集资金，历时一年有余，在杨宅旧院内，仿照海源阁旧制，又建起一座富丽堂皇的海源阁纪念馆。慕名而来的海内外游人，尚可从中寻觅到海源阁的旧日风采。

附：海源阁人物志

(杨以增父)孝直先生传

先生有官膺科目不书，书乡谥，重乡人之所上也，姜元考之碑曰：国人乃相与论德处，谥乡、谥立，而德以既焉。盖自陈文范孟贞曜昉于汉而著于唐，由来以久，而明诚张子独为宋儒之所靳然。如明史之徐贞宪邓文统皆乡谥，而录入本传，官所修也。予徵孝直，谥议于邓君琳枝，辄叹其乡之多许劭而何其与先生适相如哉。作孝直先生传。

孝直先生姓杨氏，讳兆煜，字炳南，先世秦人，自华阴迁晋洪洞。入明，以指挥籍临清。国朝改为东昌卫，著聊城籍。曾祖永禧，曾祖母唐氏，苦节六十有四年，载郡乘。祖帝锡。父如兰，候选州吏目。母赵氏。先生于兄弟行居次。生而端重，稍长渐父师之训，笃孝友，有规检。应童子试，擢第一。举嘉庆戊午科，中式举人。戊辰会试，大挑二等。癸酉铨即墨教谕。于时已失怙，在官六年。戊寅夏，以母老，乞养归，不复仕矣。即墨前任教职，与邑令不协，相讦各徇以躯命，遂成大狱。诸生又与邑令相持，多所牵连。督学连章，再入告诸生，或殒死道死，五年而后定讞。于是教官颇首鼠。士所量于教官者甚轻。先生承乏，勤督课，使士志先定，徐教以鉴前车，明理晓事。顾亦不强聒而与之语，语无复有一语迂阔。即墨人士，遂以率从。当涂黄左田先生，督学二东，力整顿，士风丕变，然微迫束湿之势。先生于役莱郡城，值同人大聚，欲乘学使者风烈，士不敢轻有陈诉。时增长册费，有乡试出学使之门

者曰：“此在我义所必不为，为且与当事清名有损。”同人迂不肯听，先生乃作色而起，语甚激，其事始已。长清夏教谕仲言，读书人也，为同事所苛虐，顾避去。闻先生日思迎养母，母老告长途且道险，欲如唐人以柳易播迺格于例，不准行。未几，先生以念母不置，竟去即墨。去之日，手其所得文休承写泥金佛经曰：此可以藉佛力而延母算矣。此外，则囊空如洗。先生论贴、品诗、读画具有鉴赏，好讽诵陆渭南、吴祭酒诗，时或声振林樾。奉母承色笑，日取元人诸院本或小说家言之佳者，琅琅雅诵，母乐甚。母或时不悻，必长跪陈启，至欢慰乃起。母时年九十余，先生婆娑漆下，亦自忘为六十许人也。母殁，丧礼参宋儒书仪家礼，飭予以增建祠，規制一准诸大清通礼，识者题之，晚年赴以增，迎养楚中，遍览襄阳、隆中、岷首、鹿门、习家池诸胜，觞咏其间，写为长卷曰：“吾以续二劳九水之游。”修复孟事，制象赞，手书刻石。道光戊戌夏六日卒，年七十有一。于是门下士邓琳枝等，综先生服官事亲，生平行谊之实，上乡谥，众议允乎，遂剑称为孝直先生。娶于和，年不永殁，已数十易寒暑。尊姑述之，必流涕。继室赵，抚前室子，无异视人。两贤之子以增，壬午科进士，今官河南开归陈许道。以坊，廉贡生肄业，国子监候选训导。赞曰：孝为顺德，直则生之理也，予谥法为不细矣。国朝胡沧晓先生，官不逮谥，乃以子大司寇贵，予谥文良先生，所遇不难同邀异数。今先生以论德而处者，为乡邦所礼重，则先生与文良先后固适相如矣。抑古者制谥之法，先上其行，实于朝下，太常博士议之，先生之行实通勒，予何敢辞。宋潜溪曰：“为圣贤有用之学者，达则为公卿，而行其道；不达则为师友，而其道明。”又曰：“牧伯以政为治，教官以教辅治，职均重矣。”先生于取舍之地，审义利而

見諸當官者，卓然如此。其內行之篤，則奉母孺慕若將終身焉。有兄早世，獨以一身型于家，而教其子以聖賢有用之學。觀以增由州郡歷台司，施措乎于朝野，道不既行矣乎？先生頎而長，美須髯，胸不設城府機械，人見而自誦鄉人，或窘無聊賴，引為身謀，亦往往為人所給。老而不悔，乃自號曰“實夫”。嗚呼！實之為德，是先生之才與直也。夫為之傳，而以付諸其家者予之責已。

（原載《聊城县志》）

楊以增傳

楊以增，字益之，一字至堂。幼兒穎異，博覽群籍。年十七、入邑庠，旋食饒。嘉慶己卯，舉于鄉。道光壬午成進士，即用于貴州知縣。甫抵省，權長憲同知。有夫訟出婦者，婉諭之，相與感悟拜泣去。補荔波，調貴筑。乙丑戊子，兩充鄉試同考官，升松桃直隸廳同知，貴陽府知府。清厘積牘，至數百件。時黎平有賄買頂凶之案，將就戮矣，洞得其實，為平反焉。擢廣西左江道，調湖北安襄鄖荆道。所轄境與秦楚豫壤相錯，俗悍多盜，時與提軍羅思舉會哨于鄖，宵小斂迹，羅特敬札之。以父憂歸。服闋，授河南開歸陳許道。值河決祥符，督修兩坝工程，昕夕從公，數月蕆事。升兩淮監運史，未之任，擢甘肅按察使，緝獲白蓮教匪夏長春、毛智遠等，并他省黨悉與就擒。中衛縣民，有鬻童養媳為娼者，不從，炮烙死，為請誣女，而置某于法。升陝西布政使。時巡撫為林文忠公則徐，深相契，至舉以自代。旋權撫篆，次年遂有真除之命。歷一年，升江南河道總督。計自州縣起家，洊歷開府，莫不勤以律身，誠以報主，歷始終如一日。其他汲寒暖，撫災黎，周恤知

交，创兴义举，美德非一端焉。咸丰五年冬，卒以任。照军营病故例，赐恤，予祭葬，溢端勤，祀乡贤。

（原载《聊城县志》）

杨绍和传

杨绍和，字彦合，号颢卿，端勤仲子。生有夙慧，七岁能诗。咸丰壬子举于乡。旋丁父忧，服阙，由中书改官户部郎中。上书当事，陈钞法利弊，杜侍郎翔，充山东团防大臣，奏调襄办团练，清厘齐河，争团武定，缚官堂邑，郛城、单莘杭漕诸巨案，一裁以法。辛酉春，杜侍郎还京，巡抚谭奏留办山东军务。时贼势张甚，请于僧邸，自率乡兵数百人，身当前敌。初战于附郭，再战堂邑柳林及莘冠诸邑。歼贼数千人，旬余迭复四县，事平擢员。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陕西道缺简放。维时父丧未葬，遂请假家居三年。成进士入翰林。召见时，垂询家世，并山东办理军务情形事甚悉，遂擢右赞善。时民教相哄，烧毁洋楼之案。夷使相持不解。疏陈四事，大旨在慎求才，改兵制，节财用，谨洋防。厥后海疆多故，交涉日棘，已早卒见及之。生平笃于师友，如刘渔村、梅伯言、包慎伯，故后均刻其著作行世。乡里困乏，助婚嫁、筹丧葬者，未易一二数。为学得主敬工夫，而尤邃于汉学，名物训诂，研究精密，毛诗公羊皆有札记，未成书。所成者楹书隅录及诗文集而已，卒祀乡贤。

（原载《聊城县志》）

杨保彝传

杨保彝，字师龄，号夙阿，绍和子。以祖父端勤公以增荫

得知县。幼禀庭训，循礼法，天怀旷逸。喜尚论古人，下迄本朝掌故。口若悬河，令人娓娓忘倦。同治庚午，举贤书。以迭遭父母丧嗣父母丧，福母之丧。偃蹇家居者十余年。所学益有根柢。改官内阁中书，转员外郎中。入总理衙门，遇事多有建白。为济宁孙公懋公毓汶所倚重，资深擢通员，晋二品衔。光绪庚子，拳匪肇乱。京都显宦，多惑于拳党，且有崇拜之者。保彝独立陈其不可恃，且论外交不宜失和，以格于当道不见纳。既而公命名被戕，激怒郁都，联军入京，两宫西狩。其祸卒如所料，可谓有先见矣。变法以来，以不宜于时，遂退隐于肥城陶南山庄。筑眉园以居之。绝口不谈时事。居平自奉俭约如寒素，每于乡邻清话，人爱戴之，若忘其显贵者。东抚吴公，闻其贤，延为续修山东通志局会纂。并充优级师范教师。以岁饥，诸生膏火不敷，捐薪俸以济之。旋亦辞归，恫时将乱，以郁愤致疾卒。无子，择族子嗣，病革时，以祖父所遗海源阁宋明版书，及古字画金石，禀官立案，永作家祠世守，勿为子孙毁弃，论者谓其保存先人遗泽为无忝所生云。

（原载《聊城县志》）

铁 塔

铁塔位于聊城市体育场东南角，原东关旧运河南岸，明代隆兴寺遗址之上。

铁塔为八角形楼阁式佛塔，现为12层，通高15.8米，由塔身、塔座两部分组成。

塔座为石砌正方形上下叠涩不对称式须弥座，高2.90米，底边长3.17米，占地面积10.16平方米，塔座牙脚四角成卷云状，髹牙刻宝装覆莲一周，莲瓣中间起脊，脊两侧突起楠

圆形泡，瓣尖卷起作如意形；正面阴线刻缠枝花卉纹饰。罽牙上有二层叠涩，下层正面阴线刻缠枝花卉纹饰，上层刻云头、仰莲纹一周。束腰四面均有伎乐人物浮雕。南面中有二龙作上下翻滚状；左右各立一人，左者风化过甚，面目服饰不清，右者亦足身穿长衣，肩披飘带，左手曲臂举一物，右手曲臂置于胸前，脚踏瑞云。东面有二伎乐人，似胡人俑，多髯，长袍窄袖，戴包头，手持飘带，均作舞蹈姿态。北面有二凤，雌雄追逐，作顾盼相戏之状，左右各一伎乐人，服饰与东壁同，左者残缺，形态不详，右者左手举一物，似手鼓，右手举一锤，作敲击舞蹈状。四面有二伎乐人头戴朴头，肩披飘带，身穿长衣。左者前掩腰鼓，欹腰双手作敲击姿势；右者曲臂作站立状。束腰东南和西南两隅，各有一金刚力士，手按双腿下蹲作顶托状，怒目凸腹，形象雄伟，束腰上罽涩三层。下二层均刻减地平钹伎乐人物、象、鸾凤、仙鹤、带翼鱼化龙及缠枝牡丹纹饰。上层刻仰莲一周，形式与罽牙上的宝装覆莲一样。方涩平脚正面阴刻缠枝花卉纹饰，其上有二层叠涩方台，下层刻减地平钹忍冬卷草花卉。上层刻云头，仰莲纹一周，形式与束腰下的云头，仰面莲纹相同。

塔身系用生铁仿木结构分层冶铸，逐层迭装。铁壳中空，厚度6—10厘米不等，内填碎石砖瓦，无登临设施，此塔原为十三层。倒塔八层塔身，只找到七层，尚缺一层，各层塔身均残缺不全。修复后为十二层，从塔身收分情况看，似缺第九(?)层，全塔现存高度15.5米。

第一层塔身，直径1.53米，底部一周宝装覆莲，塔身八面分别有四个假门与假窗，门额有簪四枚，簪面成削角方形，假门上均有铺首和门钉，东西两面的门做成半掩门式，假窗为破

子棖窗。转角置圆倚柱，都铸成刹头式，有的侧角和升起，柱间无阑额上有普柏枋。每面补间铺作均隐刻五铺作重抄偷心造，转角铺作为实跳五铺作重抄偷心造。

二至七层塔身均无门窗雕饰，八至十层雕有格窗花饰。各层倚柱及斗拱与第一层相同。每层塔身均有腰檐平座，腰檐为仿木檐铸造，有檩枋、檐椽、飞椽、瓦垄及斜脊等。腰檐平座的铺作均为四铺作单抄计心造。第五至十一层的平座上见有栏杆，其他各层平座的栏杆均已残缺。塔身逐层收分，塔顶置仰莲葫芦宝瓶式塔刹，此刹现今重铸已非原样。

因原十三层铁塔由于风灾地震、年久失修，上部的八层塔顶在百年前已经倒塌（仅存下部五层塔身与塔座），1973年3月，聊城市政府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即组织人员对铁塔进行了清理和维修。

在清理塔基座底部时，正中一块一米见方的石块下，有一深约80，南北长86，东西宽62厘米的地宫，四壁刻有仰莲、云水浮雕等图案，底部有一深5，长57.6，宽33.2厘米的槽坑。在地宫内，除发现有石函、银函、铜佛、铜器等一批佛教器物外，还发现有唐至明代的钱币。

在地宫内发现的石函，呈长方形，高29.4，长37.6，宽23.8厘米。分函室、函盖两部分，函一侧阴刻铭文十行，计六十一字，

古有铁塔，在东关街北，永乐年倒。天顺年间，东昌府僧纲性都、纲性深，隆兴寺住持祖崇，僧德宁发心募缘，至成化二年三月初六日重立铁塔记。 石匠掌丑造

石函内放置一银函和两包骨灰。

银棺呈长方形，长10厘米、宽6.6厘米、高7.2厘米，分

棺室、棺盖两部分，底部四角均有垫脚。棺身正面刻“辟支佛舍利”五字，棺底刻“大明成化丙戌（1466年）三月吉日造”。其他地方刻草木花纹。棺内有丝料灰袋一个，袋下四角各置素面无字银币一枚，币径3.4厘米、厚0.2厘米，穿呈◇形。布袋已成残片，内装骨灰和若干“舍利子”（实为石英、玛瑙、石灰质石珠）。

石函内的两包骨灰分别用黑、白布袋装置，布袋已朽成碎片，黑制袋内装黑色骨灰，并有银块，铜块各一，绿松石3枚（径1.4厘米），绿釉红陶人头一件（高2.5厘米、宽1.9厘米、厚1厘米），舍利子百余粒。白布袋内装黄灰色骨灰和舍利子百余粒。黑白两个布袋里的舍利子的石质与银棺内的相同。

在地宫中清理出的铜质器物共六件。其中佛象、观音菩萨、供养人、觚形器二件，净水瓶各一件，均为明代遗物。

鎏金释迦牟尼象，高11.8、宽9.4厘米。螺髻，双目微合，二耳垂肩，袒右肩披袈裟，右手平伸五指抚右腿上，右手置于前脐作降状，魔印结跏趺坐于仰覆莲须弥座上。

观音菩萨像，高25.2、宽10.5厘米。头戴宝冠，面相端庄，身披璎珞，手贯环钏，肩搭飘带，腰束长裙，右手上举，拇指与中指作环状，其余三指微伸，左手持宝珠于脐前，作说法印状，结跏趺坐于仰覆莲须弥座上。

供养人，高4.2厘米。头戴高尖冠。身穿宽袖长袍，立姿双手合十。高4.2厘米。

两件觚形器，均高16.7、横宽10.2、纵宽7.9厘米。各分三节，上部六棱喇叭形口，中部椭圆形箍腰，四面各有一竖棱，下部六棱喇叭形圈足。

净水瓶，高18.6，底径6厘米。分器盖和器身两部分，盖

呈宝装覆莲形，顶部有一柱，柱端呈蒜头状。器身为盘状口，高颈，颈部一周凸棱，球状腹，腹一侧有兽头顶瓜棱盆形流和插销。宝装覆莲形圈足。

石台，呈扁平长圆形，长径 20、短径 18、厚 5 厘米，为放置佛象之用。

青花瓷瓶，高 16.4，口径 5.3，底径 6.1 厘米；圆唇、侈口、高颈，颈有二耳，圆肩深腹，圆足。白胎，白釉青花，颈腹部有植物花纹，为宋代遗物。

鏐钱，计 684 枚。即唐代开元通宝 17 枚；南唐唐国通宝 1 枚；北宋宋元通宝 4 枚，淳化元宝 1 枚、至道元宝、16 枚、咸平元宝 9 枚、景德元宝 5 枚、祥符元宝 17 枚、天禧通宝 10 枚、太平通宝 3 枚、天圣元宝 27 枚、明道元宝 2 枚、景祐元宝 5 枚、皇宋通宝 94 枚、庆历重宝 1 枚、至和通宝、7 枚、至和元宝 20 枚、嘉祐元宝 7 枚、嘉祐通宝 26 枚、治平元宝 24 枚、治平通宝 3 枚、熙宁元宝 119 枚、熙宁重宝 24 枚、元丰通宝 89 枚、元祐通宝 17 枚、绍圣元宝 26 枚、元符通宝 6 枚、圣宋元宝 34 枚、崇宁通宝 1 枚、崇宁重宝 1 枚，大观通宝 5 枚、政和通宝 33 枚、宣和通宝 16 枚；南宋建炎通宝 7 枚、绍兴元宝 4 枚、乾道元宝 2 枚、淳熙元宝 4 枚、金代正隆元宝 3 枚、大定通宝 1 枚；元代至正通宝 1 枚；明代宣德通宝 1 枚。

关于铁塔的始建年代，铁塔本身没有记载。据清·嘉庆十三年（1808 年）《东昌府志》卷十二载：隆兴寺旧址在城东门外，洪武二年建有铁塔”，又宣统二年刊印的《聊城县志》载：“隆兴寺在城东门外，前洪武二年建，中有铁塔”。都很简略，没有留下可供考证的文献资料。虽然在地宫出土的石函上有明·咸化二年的铭文，但也只记“古有铁塔在东北街北……”，

难以据此确定年代,目前,只能依据铁塔形制特征和出土文物来进行推断。

塔的平面作八角形,与现存大多数宋塔平面形状多一致,塔基座为方形上下叠涩不对称式须弥座,是唐宋时代佛塔的主要特征之一,与宋《营造法式》卷十五砖作制度相符。各层塔身的柱、枋、斗拱和檐部结构,均为仿木结构形式,其外形和楼阁式木塔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各层塔檐上设置一平座的做法,在宋代的塔中常可以看到。如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和江苏苏州“报恩寺塔”等。塔身转角倚柱铸成刹头式,有侧角和升起,与宋《营造法式》之制相合。门额上有4枚方形门簪,与宋《营造法式》卷三十二《小木作制度》图样的板门背面所绘的门簪后尾枚数相同。至于板门作关掩状,窗子为破子根窗形式等,皆为宋代流行的装饰手法。

塔基座内外的浮雕,均采用“剔地起凸”雕刻技法,个别的作品仍保留五代的作风,如须弥座上的大莲瓣与成都前蜀王建墓棺床的风格大体相近(见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又如塔基座北面的双凤和塔基内出土鸾凤,与南京栖霞山五代时期舍利塔基上的风格相近(见愈剑华《南京栖霞山舍利塔》、《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11期)。

从大多数浮雕风格来看,不象唐代那样凸起、丰腴紧凑,造形较唐显得有些呆板。从雕刻技法看呈摸角,为平状,与河南巩县宋陵瑞禽的风格接近(见郭湖生等《河南巩县宋陵调查》,《考古》1964年11期)。这些浮雕中,如狻猊形象与宋陵永熙陵镇陵将军石刻的正、背面雕刻的狻猊非常相似(见《宋陵》,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西面伎乐人物所戴的朴头,脸型和饰也是宋代浮雕中所常见的。又如娼伽、鸾凤、仙

鹤、缠枝牡丹等形象与宋《营造法式》卷三十三所绘的插图相近。从浮雕内容看,除装饰铁塔外,还可以表示镇墓祥瑞之意。综合以上情况,从塔的形制及造像风格进行分析比较,其建造年代似在北宋晚期。

关于铁塔的铸造工艺,据实物观察,塔身中空,书是以整块泥模为芯,外面制范进行浇铸,现铁塔外部还留有明显的范块拼接痕迹,塔身多层应是分节叠铸的,如此高大沉重的仿木构建筑的制成,说明宋代铸塔工艺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地宫出土的文物,除有早期货币之外,时代均在明代,石函和银函上即有明确的铭刻纪年,可以断定此塔至少在明成化年间进行过重修。

该塔是现存为数不多的铁石结构建筑,造型俊秀挺拔,不论在建筑结构或石雕艺术上,均有很高的研究价值。1977年,被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堂邑文庙

堂邑文庙位于聊城城西四十里,堂邑旧城东北隅,始建于金大定年间(1161—1189年),整个建筑坐北朝南,占地十余亩,系采用我国传统的中轴线对称组合形式而建。现存建筑有大成门、大成殿、木牌坊、乡贤祠、名宦祠等。

木牌坊

木牌坊,也称棖星门,是文庙的临街大门,三开间,木结构。下用四根立柱支撑坊身,四根立柱前后又用八根斜撑木钹住立柱,以求稳固。12根木柱之下均置以青石柱础。木柱之上采用十字钻心连接拱承托流水檐,顶为灰瓦浅脊。整个

牌坊玲珑雅致。

大成门

大成门是通往大成殿的第二座大门。面阔三间，砖台砖墙，歇山脊，绿色琉璃瓦顶，斗拱抬梁结构。正脊饰大吻，四条垂脊有吻兽。

大成殿

大成殿是文庙的中心建筑，面阔五间（22.45米），进深三间（12.45米），筑于60厘米的砖台之上。大殿正面主次间辟门，两侧各设一窗。大殿梁架为斗拱抬梁式结构，一周有斗拱44攒。房面为歇山脊，覆绿色琉璃瓦。正脊浮雕云龙图案，脊两端是高高翘起的大吻，四条垂脊装饰仙人和脊兽。整个大殿蔚为壮观。

乡贤祠、名宦祠

乡贤祠、名宦祠位于大成门左右两侧，皆面阔三间，进深一间，砖墙瓦顶硬山脊，正面辟一门二窗。二室原系祭祀本地“乡贤”、“名宦”的祠堂。

在大成门前，还有一棵围径3.6米的柏树，苍劲挺拔，独立院中。《堂邑县志》曾载，文庙前后有古柏四十株，致为森茂。此树和记载相印证，成为文庙古老的象征。

堂邑文庙迄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是鲁西北地区现存唯一的文庙建筑群体。1977年，被列为聊城地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古代名胜

胭脂湖

胭脂湖，旧称环城湖。位于聊城故城四周。共有八大湖区，分二十余块水面，总面积达4.2平方公里，略小于杭州西湖，为济南大明湖的五倍，是我国北方城市中罕见的人工湖泊，与西子湖、莫愁湖并称为我国三大美女湖。

胭脂湖始挖于宋代，宋·熙宁三年(1070年)筑城墙及护城堤时，掘土成河，河面宽约四、五十尺。熙宁九年重修护城堤，护城河相应扩大。明清两代历有加宽和修缮。解放后，又经多次治理，遂形成今日之湖泊。

胭脂湖，风景秀丽，四季迷人，并随着荷香亭、依绿园、环城公园，铁塔公园，江南竹寨、湖滨浴场等一批景点相继建成，更使得胭脂湖多彩多姿。

湖心岛

湖心岛，座落于胭脂湖中的西北角，面积275平方米。1984年辟为景点，开始投资兴建。其整个景区由望岳亭、溢香斋、翠园、沁园、金鱼馆等组成。为人们向往的休息游览之地。

望岳亭位于岛的西北角，高7.8米，占地80平方米，黄琉璃瓦垂檐6角攒尖顶，6柱拱托，柱间设有坐凳，供游人休息。垂檐内均绘《聊斋志异》中《胭脂》故事。建筑精巧宏丽，与光岳楼遥遥相对。

溢香斋位于望岳亭北，为殿堂式歇山顶建筑，共三间，占

地 60 平方米,用作茶社,以接待来宾。

翠园位于岛的东半部。占地 740 平方米。设有展室、摄影室等 13 间,均为青砖白墙,仿古建筑,古色古香,幽静典雅。

沁园位于岛的南部,布局精巧,廊壁漏窗,图样各异。前园临湖有观景台,为 7 间敞廊,供游人休息观景。

后园为花园,内有石刻雕塑,喷水花边系仿苏州园林建筑。园内翠竹繁茂,百花锦簇,是人们游乐留影佳地。

金鱼馆位于岛的西南角,占地 150 平方米,为平顶檐口玻璃顶建筑,内设展室 3 间,供展各种鱼类。

钓鱼台

钓鱼台位于旧城西门与北门之间的胭脂湖边,全长 850 米,是人们钓鱼的好地方。

1988 年 5 月,山东省钓鱼协会和聊城钓鱼协会曾在此联合举办“寿翁杯”钓鱼比赛。1989 年 5 月,中国钓鱼协会将聊城胭脂湖正式确定为“中国钓鱼协会聊城垂钓基地”,并投资在湖边建起了钓鱼区和招待所。

为美化钓鱼台环境,地方政府又在湖边设置了浮春亭、姜太公白玉雕象,“龙”字巨碑,进岛小渡口等系列景点。这些景点,无不吸引着全国各地的钓鱼爱好者。

荷香园

荷香园,位于胭脂湖西北角。园中建有荷香亭。荷香亭垂檐攒尖,六角飞翘,双檐十二脊皆饰毛兽,建筑精巧别致。在亭之东北檐下悬有木质匾额一方,匾为白地蓝字,上书“荷香亭”三个大字。亭四面偎依湖水,荷莲、柱间设有坐椅,以供人们休息观赏。

临亭建有拱形水桥，并水桥连接湖岸，亭桥相依，颇具江南景色。

荷香园向西为一假山，山上绿树葱郁，花香鸟语，如诗如画。

依绿园

依绿园，位于胭脂湖内沿岸的西北角（也即聊城古城的西北角），始建于宋代，名自公亭，后改名为“绿云楼”，为聊城古代城上二十七楼之一。被列为东昌八景，曰“绿云春曙”。此园原由晚清书屋、小玲珑洲、丽农山房，枕流漱石、绿云深处，环碧草堂等若干景点所组成。建筑精巧，景色迷人，相传为当时的知府们宴游休息的场所。

清朝末期，园废楼倾，仅存遗址。近几年来，地方政府又在遗址上开辟了绿茵草坪，新建了园林小品等景点，现已成为人们理想的游览场所。

（三）古代遗址

颛顼墓遗址

颛顼墓位于聊城市西北 7.5 公里处，为长方形高台地。颛顼墓为黄帝子孙，曾继黄帝为帝，称高阳氏。聊城为其属区，临视之地。传说此墓是他的衣冠冢或泥塑像的埋葬处。

现颛顼墓遗址为一处龙山文化至周的遗址，遗址暴露面积 500 平方米左右，考古工作者曾在此遗址上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的罐、豆、盆，殷代的鬲，以及周代的绳纹筒瓦等。

权寺遗址

权寺遗址位于聊城市李海务乡权寺村西，遗址暴露面积约1万平方米，该遗址文化内涵较为丰富，北部沙坑的断面上可清楚地看到文化层，文化层堆积厚度约为1.5米，采集标本主要有龙山文化的石斧、石镞、石铤、鼎足、鬲足、陶壶、陶罐和黑陶片等。此外，还采集到岳石文化典型器物尊形器的残片。该遗址延续时间较长，大致为龙山文化至汉时期。

掘均店遗址

掘均店遗址，位于聊城市蒋官屯乡掘均店西70米处。面积约44000平方米。遗址地势平坦，东部有四新河穿过。

从河崖断面看，文化层厚约2米。采集标本主要有龙山文化的陶罐、陶盆、器盖、鼎足等。

（四）古代城址

微子城

微子城，即商殷王之庶兄微子启受封之地。据清·嘉庆《东昌府志·城冢记》云：“微子城在聊城东北十八里。”

聊城在商汤末期，为微子国，是殷纣王之庶兄微子启受封之地。微子是商王帝乙之庶长子，名启，殷纣王之兄。纣封启于微，不子爵，故称微子。纣荒淫无道，微谏之不听，即走出离开商王朝，及周克殷，微抱祭器归周，而后周武王改封于宋。商邱为宋国都城。

考庶，支庶也。旧称非正妻所生之子为庶子，微与纣排列为兄，故称庶兄。《聊城乡土志》载：“周武王封微子于宋。”按东平、曹州皆宋地，而载微子则在聊城境内。又《寰宇记》记载：“聊城微子城，纣之庶兄封邑于此，故有城存。”也是指聊城东北十八里的微子城。

《考古录》上说：“据聊城县志图，微城所在，正古摄城，摄城临黄沟，黄沟亦称湄河。”考“微”、“湄”二字古通用，湄河即微河。所以微子城就是春秋战国时的古摄城，即摄国故城。

郭城

郭城，即周郭国之城，为周文王季弟的受封之地。据清《东昌府志》记载：“聊城县郭城，即亡国郭氏之墟，郭城在府东北。”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朝时，聊城为周郭国，周文王季弟受封于此，后入齐。周·惠王七年（公元前 670 年）郭亡。齐桓公至郭问：“郭何故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所以亡也”。由此，则为亡国之墟之由来。

因《续山东考古录》记载：“摄邑故城在博平西南三十里许，又名郭城。”又因杜预春秋释地曰：“聊城县东北有摄城”，并云《魏志》记载：“聊城有畔城，而无摄城，郭城，微子城，实一城耳。”所以，很多人认为微子城即是摄城，摄城又名郭城，即摄城、郭城、微子城名称不同，是因时而异其名，实际为一个城池。

聊古庙

聊古庙位于今聊城北十五里，西新河西岸，推算治所在聊

古庙的时间为一千零二十一年，距今已二千五百多年。

《左传》载：“鲁、昭公二十年（公元 522 年），晏子对齐侯曰：“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其为人也多矣。”聊摄（博平县志·通志曰：聊摄二小国名），齐西界也。这是聊城出现在史册上的最早记载，聊古庙即最早见于史乘的古聊城所在地，也是秦、汉、魏、晋时的聊城故城。

聊城在春秋战国时期，其地已有名。据《聊城乡土志·兵事录》“战国时燕国军事家乐毅，带兵攻聊城不下，闻弦诵声后，以书喻之乃下。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 249 年），齐将田单率兵伐燕复国。燕将保聊城，齐田单攻之年余未下。齐国高士鲁仲连射书城中，燕将见书泣三日，犹豫不能自决，欲归燕，已有隙恐诛，欲降齐，所杀虏于齐甚众，恐降见辱，叹曰：‘与人刃，我宁自刃。’乃自杀，聊城乃复归齐”等记载看，这里在当时已成为齐燕两国争战的筑城屯兵之地。

聊城春秋战国时属齐国。秦朝置县属东部（濮阳为郡治所）两汉因之。《考古录》载：“三国时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 227 年），聊城为县王国，正始五年（公元 245 年）复故。晋时聊城属平原国。至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公元 499 年），聊城治所，由聊古庙迁往王城。”

王 城

王城，在今聊城城东小店子村西南，许田庄以南。建国初期尚有 3.5 米的土堆遗址，当地群众称为“老台”，现已平为良田。此地“洪水陷旧州”的各种历史传说仍在群众中广为流传。

王城是北魏时期的平原郡城，也是隋、唐时期的古博州

城，又是当时的聊城县城。《水经注》：“黄沟又东北经摄城北，又东经文乡城北，又东南经王城北”，其中所记王城当指此而言。北魏·明元帝太常七年（公元422年），为安平王镇守平原所筑，谓之王城。至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废镇立平原郡治此。《考古录》记载：“太和二十三年移平原郡于此，并移聊城县治此。至北魏孝昌时，又分置西聊县（今聊古庙），至北齐又废西聊入聊城。”当时平原郡领：聊城、博平、茌平、西聊四个县。

清·嘉庆《东昌府志》载：隋·开皇三年（公元582年）废郡，十六年（公元596年）又于王城置博州，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废。隋乱，隋将宇文文化及，杀杨广，自江都举兵至北，隋臣郑善果从化及据聊城。窦建德自称长乐王，又攻陷其城杀化及获善果遂据其城。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讨平窦建德重置博州（见《元和志》）。博州领聊城、博平、武水、清平、高唐、堂邑六邑。

五代时期聊城属后晋。石敬瑭灭后唐称帝，国号晋，史称后晋，也称石晋（公元936—946年）。石晋·开运二年（公元945年），黄河决口，王城淹没，即清·嘉庆十三年《东昌府志》所载：“故博州在今府东北二十五里，晋·开运二年河决城圯。”由此，郡、县治便南迁巢陵，县治所在王城的时间为四百四十六年。

巢陵故城

巢陵，即巢父的陵墓。巢父，传说为唐尧时的一位高士。《汉书·鲍宣传》载：“尧舜在上，下有巢由，是上古时两大高士，巢父与许由也。相传，尧以天下让许由，许不受，乃逃于中

岳颍水之阳，箕山之下隐居，农耕而食。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洗耳于颍水之滨。时巢父牵牛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为九州长，恶闻其声，因而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山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我牛口，于是牵牛上流饮之’。尧以天下让巢父，巢父居不营世利，亦不受，树上筑巢而隐居，因此号称巢父。”《东昌府志》地图上，标有“巢父遗牧”故址，为巢父隐居躬耕之处。明、清时则把《巢父遗牧》列为聊城的八景之一。

巢陵遗址，在今聊城东南十五里大石槽村西头，当地群众叫巢父陵。其西南原有一南北土陵叫祭岁坪，南原有一大坑叫卧牛坑，西南原有一大土丘叫尧王坟，东北百米处，原有一处寺院叫洪佛寺。

清·嘉庆《东昌府志》载：“石晋巢陵城，开运二年（公元945年）河决王城毁，南徙巢陵，于此立州。今治东南十五里，址犹存。”（见《永乐志》）此巢陵，即指东昌地名而言。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六月，河决巢陵城毁，州、县治所移至今治。推算县治在巢陵的时间，为四十七年。

1969年，中国科学院的文物考古专家曾对巢陵遗址进行过考察，发现此处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层，并出土有汉代的砖块、绳纹筒瓦片等。实际此处为一处古代文化遗址。

凤凰城

凤凰城，即今之聊城古城。

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六月黄河决口，巢陵城毁，州县治所迁至崇武渡（又名孝武渡）西，即今治也，宋·熙宁三年（1070年）建城，旧筑以土。

公元 1115 年至 1234 年，北方沦为金地，聊城为山东西路博州治所，县为州领，博州即聊城，

元代(公元 1260 年至 1363 年)，聊城为山东宣慰司东昌路总管府治所，县为府领。(东昌之地，系汉朝孝宣时，封清河刚王子成为东昌侯而得名)

明·洪武元年(公元 1368 年)，改东昌路为东昌府，聊城为其治所，县为府领。洪武五年(公元 1372 年)，东昌卫御守指挥陈镛主持，将宋筑土改为砖城。城墙内层纯为三合土，外层用特制的大砖和石头砌置而成，四门是两道城门，东、西、南都有扭头门，北门为重叠门似凤头。东西二门的扭头门，门向南似凤翅；南门扭头门，门向东似凤尾，故名凤凰城。

据明·嘉靖四年(公元 1525 年)李廷桐撰《重修东昌记略》记载：城池“周七里有奇，崇尺三十有五，濶杀尺三十有五，为门凡四。东曰：“春熙”、西曰“清远”。南曰：“正德”。北曰：“宣武”。城上登望之楼，凡一十有七。前代所谓“绿云”、“望岳”二楼焉，楼卒之舍四十有八，每门有水门、吊桥、涵洞、堰门，池深二十尺，广加十尺，盖皆拓而新之。”大致可看出整个城池的建筑情况。文中记载：周七里多。但民间传说四周中九里十三步，大概连环城的十二个炮台(又名射箭台)也数在内了。又说城墙高度三丈五尺，底宽三丈五尺，城楼比较有名的是东北角上的“望岳”、西北角上的“绿云”二楼。四门除城门外，还有堰门(即二道门)。东西南三面系扭头门，北门为重叠门。水门是城门外护圈上开设的小门，平时关闭。东西南三面水门与城门相对，外面为吊桥。北面水门向东开。吊桥对着堰门。城高池深布列严密，易守难攻，故当时有能陷不失的凤凰城之说。

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莫与齐,在城墙上又重修敌楼二十七座,城墙垛口两千七百有奇,四门名称变更为:东曰“寅宾”,西曰“纳日”,南曰“南熏”,北曰“锁钥”。四门都修有敌楼,都是仿摩京都门楼建筑,飞檐重楼,巍峨壮观。明朝御史邑人傅光宅诗云:“偕客登城楼远眺”,想是当时有楼梯可以登临,民国以后,就不见楼梯的踪迹了。头道北门里有一座大影壁迎门矗立,城东南角有一座塔式的“魁星楼”,西北角建有“关帝庙”,越发把这座古城衬托得壮严雄伟。

凤凰城,水深池固,便于坚守,历史上的设防重点和扼守要地。明朝初期设平山、东昌两卫,共一万一千二百人,分布四野屯兵垦田。清初仍置两卫,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将平山卫撤销,并入东昌卫。民国以来,军阀时期1928年聊城驻三个军共三万余人,五月北阀军占济南,军阀部队,闻风而逃。聊城空防数月,因此在1928—1929两年,土匪王金法曾三次占据聊城,给人民造成严重祸害。日本投降后,顽军王金祥,赵振华、郭培德残部二千人窜入城内据城拒绝解放。1946年元旦,我军将其包围,围困一年,至1947年1月1日敌人弃城逃窜。当时为防止敌人重占聊城,将城墙拆除。现仅存城墙墙基,并已被辟为环绕古城的道路。

自公元九九二年,从巢陵迁至今城至一九九五年为一千零三年。

白雀城

白雀城,即今堂邑城。

宋代,堂邑县属河北东路博州(治聊城)。宋·熙宁六年(公元1068年),河决堂邑城毁,东徙十里始迁今治,县令耿几

父建土城。相传城工甫毕，白雀无数万翔集上空，即呼为白雀城。

金代，堂邑县属山东西路博州（治聊城）。

元代，堂邑县属山东宣慰司东昌路总管府（治聊城）。

明代，堂邑县属山东布政司东昌府（治聊城）。洪武年间知县陈孟隆加筑堂邑城。

清代，堂邑县属山东东昌府（治聊城）。

抗日战争时期，曾改名为武训县。1949年建国后恢复堂邑县。1956年堂邑县撤销，分别划归聊城和冠县。今堂邑城为聊城县堂邑镇驻地。

武水故城

武水故城，即隋武水县故城，现为聊城沙镇。

《元和志》记载：“武水县本汉阳平县地，属东郡，隋·开皇八年（公元588年），改阳平县为清邑，十六年（公元596年），分清邑置武水县，在武水之南，因名之。”

《寰宇记》载：“武水即今博州武水县理是也。五代时期，后周·广顺二年（公元952年），河决冲没，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割属聊城。”

《九域志》载：“聊城有沙冢镇即故武水城。”《金史地理志》载：“聊城有武水镇。”

《东昌府志》记载：“武水故城，在聊城西南五十里。宋·大观三年（公元1110年）置武水巡司于此。”《寰宇记》载：“故城内有石柱，后魏孝文帝所立，为业东之表。武水从石柱北是也。”（见《一统志》）

当年的武水县城，地势较高，城内十字街中心的高度等于

聊城光岳楼的最顶峰。民国以后，尽管是座土城，但并未坍塌，再加地方多加培土修筑，禁止人为破坏，大体尚可看出古城风貌。

古城呈方形，南北门相距约千米，东西大约八百米。围墙修筑高峻，垛口内有走道，可以行人。东西南北四座城门，都设有更房，可以防卫匪患。

四座城门内均建有高阁，阁内又建一厦门，可按时启闭，即形成每道城门三道关隘。

四座高阁，分筑于城之四面，建筑风格基本相同，均建在高高的平台上。每阁面阔三间，歇山九脊顶覆盖绿色琉璃瓦，飞檐挑角均装饰仙人、甲鱼、海马、路兽等。阁内塑有神像，栩栩如生。

东阁，阁下为碧霞元君行宫。有砖砌莲台，雕刻考究。暖阁正中为碧霞元君女神，金冠皇袍，执圭端坐，雍容华贵，神态慈祥。左右有待女站立，前置香花宝鼎。明柱上刻有木质楹联：

驼山瞻圣灵，峰连恋峙，两道青螺扬峻德；

武水环神刹，深川长流，一泓银练漾洪功。

对联字迹工正，笔峰遒劲，不仅形象地描绘了碧霞宫的景色和地理环境，而立意高远，并对万世功德进行了颂扬。由楼梯登阁，阁中朱户丹窗，雕梁画栋。图上供奉文昌帝君塑像，两侧为两童塑像，各捧以书剑。

北阁，阁下殿中供奉真武神像，两侧为龟蛇二将。真武大帝裂眦北指，大有气吞河山之势。阁上为玄武真神，形象可怖。

西阁，阁下殿中供奉关帝神像。阁上为福、禄、寿三星神

像。

南阁，阁中也仍供奉关帝，关帝后面即供有财神，与西阁相比，只是塑像和服饰不同。

当年，每逢四座阁中神之诞日，常举行庙会，届时人山人海，十分热闹。

从公元 596 年置武水县至 955 年割属聊城，共计三百五十九年。

王官镇

王官镇，又叫王官寺，即今王官庙。位于聊城东南四十里，在聊、阿之间，东汉古黄河西岸。

《九域志》与《金史地理志》均载：“聊城有王官镇。”

《山东通志》载：“聊城王官镇，在东南四十里，宋朝置镇，设巡检于此，今为王官庙。”

《山东考古录·杂考》载：“宋王官镇在东南四十里，今作王官庙。”

此地，世代相传叫梁王城。一九三七年前原有七十二全神古寺院一片。古寺院为大型古建筑群，自东而西有五处大庙院相联。最东一处是玉皇阁，再西是孔庙。最西是佛爷殿。此外还有土地庙、娃娃殿等四处小庙院。另外还有三处和尚住宅，其中一处为楼房。寺院前面自西而东有二人合抱的古槐六株。寺院内外碑碣林立。古寺南建有砖石砌成的戏楼，在万人坑涯处还建有“魁星楼”，楼上有魁星立像，右手执笔，作欲点状元姿势。

一九三七年春，国民党政府，拆除了佛爷殿，在原址建立了王官镇乡农学校。一九四一年春，日本汉奸又在此安设据

点,刨掉古槐,拆除了大部庙宇。一九五一年又拆掉玉皇阁,用其砖石在于集修建区公所、供销社。重挖四新河后,又用王官碑石在牛王庄西南四新河建一座水闸。至此,仅存孔庙一座。石碑一无所存。王官庙何时所建,无可考证。

堽埵镇

堽埵镇,位于聊城城北 30 公里。现仍有堽埵村。

清·嘉庆十三年《东昌府志》记载:“堂邑有堽埵镇,堽埵城即堽埵,在堂邑北五十里,堽埵与柳林古城皆明·嘉庆二十二年(公元 1543 年)筑。(见《一统志》)。”

现堽埵村有堽埵冢。冢为圆形,高约 16 米许,底周围长 350 米。据《堂邑县志》记载:“堽埵冢大丘崛起,土花斑烂,相传为古冢。”现在该冢南、西两侧其断面上可看到夯土层,土层厚 10—15 厘米,表面发现有较多东周及汉代的陶片及板瓦、筒瓦片等。据有关学者考查,此冢为汉代清河王刘庆墓。堽埵冢保存完好,已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八 胜迹寻踪

胜迹寻踪,主要是指历史上曾存在而现在已不再存在的名胜古迹。约有 20 处。

三霄宫

三霄宫,位于聊城东关外珠市街南首的二龙山北头,莲花池对过。始建年代不详。原有正殿五间,顶为歇山式,覆灰色琉璃瓦。内壁四周布满绘画。正殿的南壁上门之左右各绘一幅壁画。一副为“洪桐县移民图”,画有人们在尘沙滚滚的荒漫古道上,扶老携幼车载家产与牧畜,由兵卒押送的场面。另一副为“红孩妖为崇图”,内容选自聊城民间故事。北墙,绘有“哪吒闹海”故事连环壁画和“白蛇传”大幅壁画。画面人物情态刻画细腻,性格鲜明,尤其大幅壁画对场景的描绘十分壮观。正殿两山墙,画有“观音得道”、“释迦降生”、“普贤训象”等佛教故事。

据说,在民国时期双街基督教会美籍牧师陶锡嘏,暇时常在三霄宫观赏壁画。并不止一次地拍下大量照片。遗憾的是三霄宫在战乱中化为灰烬,不留一丝踪影。

四知堂

四知堂,位于聊城市堂邑旧城中,为元时堂邑县令张养浩所建居室。“四知”,源于后汉杨震故事。杨震,字伯起,弘农

华阳人。当时，杨震迁升为东莱太守，路经昌邑。昌邑王密夜怀金十斤见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你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四知”即由此而来。张养浩因以名居室曰“四知堂”，以示清廉。

吕祖堂

吕祖堂，位于聊城西王路北，是当年游人荟萃的地方。山门内东西两廊，可环行全院。院内三间正殿，中有佛龛，供有吕祖泥塑神象。西间陈列风架签语，东间置有桌椅。全殿整洁庄严，让人有肃穆之感。

出殿后门，庭院宽广。有一株老槐，树干苍劲，枝叶茂密，亭亭如盖，满院阴凉，树下设石凳，备游人坐息。北房是座两层阁楼，上有一文士塑像，纶巾道袍，与舞台上的诸葛武侯相似。右手下按着一套书籍，神情逼真，栩栩如生。在阁楼檐下，向南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吕祖庙的戏楼，再往前是一湖碧水，芦苇片片，直到南堤。

阁东一跨院，三间北房，是主持道人的住室。庭院幽静，花卉多种，金鱼数缸，青草丛生。门联是：

不除庭草留生意；

爱养盆鱼识化机。

屋内陈设，古朴雅净，前后玻璃大窗，阳光充足。隔窗北眺，堤上垂柳，疏密相间，郁郁葱葱，行人时隐时现。窗下湖水涟涟，东边荷花，西边芦苇，直至北堤，与堤柳相映成趣。

出屋南行，是一座过厅，中悬一匾，上书“三契堂”三字。屋内有几椅，供人休息。墙壁上镶嵌着几十块二尺见方的石

刻草书，显得满屋龙蛇飞舞，气象万千。

三契堂檐下往西，可通西院正殿。往南有一便门，可通大街。路南正对西院大殿，有一戏楼，场地空旷。解放前，每年旧历四月十三日吕祖庙会，常在此演戏。戏楼抱柱上，有一副木刻对联：

歌管楼台仙阙下；

夕阳城郭画图巾。

（据说此系聊城状元邓钟岳所写）很能表达当时的情景。

玉皇阁（皋）

玉皇阁，位于聊城市闸口桥东，迎春桥北，小东关街东首的石桥附近。

玉皇阁有正门三间，边门两座，砖瓦结构，雄峻古朴。正门南侧，有一座石头小庙，飞檐翘角，玲珑剔透。庙内供有手执铜鞭的王灵官。

走进正门，可看到左边的青龙，右边的白虎二神守护着庙门，使人见而生畏。门内，为一片空阔的院落，坐东向西，有三间大殿。檐下一匾，上书“三元宫”三字，书法苍劲遒逸。两边各有配殿，南殿三间，北殿五间，都是红砖绿瓦，砖木结构。并里面供奉着泥塑神象。

三元宫正殿供奉的神象，正中为天官，两边是地官、水官，都是金身。再两边是十个彩塑的元帅，即左边是雷震子、马喜、王灵官、温良等，右边是高亭、赵公明、亲环、刘元帅等。

两边配殿，南配殿三间里面正中供奉的是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美髯飘逸的关圣帝君。左边是虎目圆面紫黑，须如戟，手执青龙偃月刀的周仓，右边是眉目清透，手捧黄绸

包裹大印的关平。北殿东三间，正中供奉着贵神，左边为财神、福神；右边是喜神，禄神，纱帽蟒袍，消眉秀目，一派文官气象。西两间供奉的是幡首银须，慈祥和蔼的土地，及青面红发，狰狞可畏的鬼王。西边配殿东山头下各有南北侧门一座，经常不大开放，可谓“门虽设而常关”。南配殿西边，有砖石钟鼓楼一座，内悬大钟，古驳斑烂，击之振聋发聩。

由三元宫往后去，又是一座宽敞的院落。院落尽头，是一座巍峨壮丽的崇楼高阁。檐下匾额书有“无二尊”三个大字。翘角飞檐，四角均悬以铜铃，微风吹来，叮当有声，如昊天之乐，飘逸人间。砖石楼基，分二层，约一丈多高，下层高四尺，上层约一丈，正中石质台阶数十层。拾级而上，是三间大殿，四周围以半人多高的木质栏杆。大殿正中，供奉的还是天官、地官、水官三尊金身神像。左右两边是八个生肖神像，共十二尊，均为彩塑。前面两根柱子上有张牙舞爪的二龙盘踞，活泼生动，栩栩如生。神后面上部，又是三尊金身神像，正中为斗母娘娘，法相庄严；左为王母，慈祥婉顺；右是银眉白髯，笑容可掬的南极老寿星。三尊神后，靠墙及楼板为彩色山塑，有骑龙、骑凤、骑狮子、骑孔雀、骑麒麟的各种神仙，或飞翔于空中，或行走于山石树林之间，山洞中并有仙童探望，称为“万仙阵”，也称山塑，为鲁西北一带绝无仅有的名塑。再两边南北相对，列着八仙过海的八尊神仙，即韩湘子、曹国舅、吕洞宾、何仙姑、李铁拐、蓝采和、张果老及汉钟离。

八仙后面，靠南边有扶梯西向，靠北边也有一扶梯东向，大概是准备香客参拜毕下楼的扶梯。到了玉皇阁最上层（一共两层），两边柱子上有一副楹联：

尊号仰玄穹九天阊阖开宫殿；

宸居腾紫气万象包罗拱极枢。

上面有一块蓝底金字大匾，上书“昊天金阙”四字。

正中供奉着金身的玉皇大帝，冕旒抱笏，清眉秀目。左边配享的是真武大帝殷交，右边配享的是玄武大帝殷洪。传说殷交、殷洪都是殷王的儿子。再左边是长生大帝，右边是微生大帝，左右又各五个站班的神像，对面立着，纱帽蟒袍，抱笏恭立。不知为何“神”。

玉皇阁建筑于何时，已无据可考。据石碑考证，明万历、正统年间曾有修缮。明·嘉靖八年，玉皇阁曾遭受一场火灾，后又重建。至解放围城时被拆除，现已无存。

静业禅林

静业禅林，位于聊城旧城东南三华里的龙湾村东南角，紧傍运河。据有关碑刻记载：“静业禅林”创修于明代，清嘉庆年间重建，是地方上颇负盛名的丛林古刹。

静业禅林之整个寺院坐北朝南，由山门、前殿、正殿、偏廊、僧舍、斋堂、知客室、碾室、磨坊、牛马棚、藏经房等建筑所组成。殿宇宽敞，规模宏大。

前殿供奉关帝，法身高达丈余，彩塑装金，肃穆威严，周仓、关平两将，分侍左右。

正殿塑像三尊，为释迦、文殊、普贤。前殿和正殿东西两壁，都绘有壁画，内容多取才于三国故事、民间传说、佛经典故。

藏经房珍藏佛经数千卷，多为元、明珍本或抄册。是研究中国佛教的重要资料。

静业禅林寺之后院，即牲口棚的东墙外，有大片空旷园

院，建有土房多间，是一处“丙舍”，专为寄放灵柩之用。另正殿前有一东庭，也是寄放灵柩之处，但多为官宦殷富之家使用。

静业禅林，历属于阳谷县阿城镇的“海慧寺”。即“海慧寺”为主寺，主寺以下又分设下院，下院僧人统归海慧寺管辖。

亦帝当阳

赤帝当阳，即关帝庙，位于聊城东关大街古运河西岸，清孝街南头。

庙内建筑主要有山门、正殿、后殿、院园等。山门南向，门外有木质牌坊一座，上书“赤帝当阳”四个擘窠大字。庙前后有古槐数株，夏日浓荫蔽日，绿枝延展，凉爽宜人。

正殿供奉刘备，后殿供奉关羽，皆为高大泥塑神像，气势威严，巍然可观。又因牌坊上有“赤帝当阳”四字，人们便习惯地称此庙为“赤帝当阳”。

据传，该庙始建于清初，牌坊上“赤帝当阳”四字为清·顺治六年（公元 1649 年）进士、刑部左侍郎任克溥书丹。

万寿观

万寿观，位于聊城光岳楼西南方，海源阁藏书楼旁。其前身为房老庵。明·洪武二十九年（公元 1396 年）后军都督金荣奏改今名。弘治年间由郡人候宁又复扩建。主要建筑有昊天阁、三清殿、郁罗萧台、九龙钟特室等。三清殿后高壁上有状元邓钟岳所书“阆苑瀛洲”四个大字，高逾一丈有余，笔力雄道。

昊天阁，系砖木结构，双层楼台，飞檐挑角，气势磅礴。阁之正中檐下悬有金字匾额，上书“仙阁云护”四字。笔力道劲，不知出于何人之手。

阁之楼上供奉天官、地官、水官，为道家尊奉之神。三尊神像，服饰不同，神态各异。均雕塑精湛，栩栩如生。

阁后特室内有口“九龙钟”，高达三米，重约万斤，钟上雕九条飞龙，或戏珠，或昂首欲飞，神态各异、活灵活现。据传，此钟在当年是有灵验的。每逢天旱不雨，地方官常对钟虔诚祈祷，即“击之辄有雨”。过去的历任知县韩龙震（乾隆 39 年）、郑纪绪（同治 4 年）、吴艺晨（光绪 29 年）等，都曾因旱祈雨而得过甘霖沛降。并韩龙震还曾作过《谢雨祭龙钟文》。郑公也因“祷雨辄应”而遂建楼悬钟而为文记之。（邑志中皆有记载）

西城关庙

西城关庙，位于聊城旧城西城墙上。庙依据西门城墙而建，即城上和城根下各建有庙，并均具有一定规模。两座庙建于何时无确切记载。据本地群众推断，此庙至少在金大定年以前早已存在。

城下关庙，山门朝东，由正殿、偏殿、两庑、戏台等建筑所组成。布局紧凑，院宇深邃。常年有道士住持。进庙后右庑下塑有赤兔马一匹，形体比真马还要高大，杨鬣奔蹄，似作腾蹕奔驰状，旁有马僮控制。庙左边为登城跑道，可以上城眺览。

大殿为南向，殿中供有关帝铜像，像高五尺八寸，德容威严，巍然可仰。神座下有灵签及药方签名一百号，终年香火不

断。

城上关帝庙,据明·嘉靖十五年穆孔晖题“灵义勇武安英济王铜像碑记”,明·崇祯十一年张凤翔“重建关圣帝君庙碑记”和道光八年刘煜“重修西城关庙记”等石碑记载看,亦应建筑精细,富丽堂皇。遗憾的是,两座关庙,已随城墙的拆除而毁灭。

一步三关庙

三关庙,位于聊城旧城南门外护城河吊桥之南。即冲大路有一座高阁,阁子下建台基,台下建有券洞,车马往来均可通行。台上为砖木结构,顶呈歇山式,正檐上覆以绿瓦,气概雄伟。

阁之东西两面各建一庙,好似陪衬中间高阁,列为左右两翼。三座庙均为供奉关帝。又因三庙相距很近,即出阁而行迈步则可踩入它庙之地,故此地被誉为“一步三关庙”。

三座庙所塑关帝神像风貌各异。阁中关帝为冕旒执笏,身穿绣龙黄袍,面容严肃,巍然而坐。

东边庙内,所塑关公之像为身穿战袍,常服装束,曹营夜观《春秋》姿势。即身躯端坐略偏,两足微蹙,手执书卷,凝神而读。

西边庙内所塑关公为挂印封金像。即全身盔铠,骑着赤兔马,并将青龙偃刃挑过锦袍,立于桥上。

此外,三座关庙的壁画,也是根据《三国演义》中关公故事,一幅幅精心绘制,神态生动,形象逼真。虽历经年代悠久,当时的颜色仍艳丽如新。

鲁仲连台

鲁仲连，战国时齐国人。善于谋划，常周游各国，排难解纷。秦军围赵都邯郸，曾以利害进说赵魏大臣，劝阻尊秦昭王为帝。齐国要收复被燕占据的聊城时，又写信劝说燕将撤守，并将书信由门射入城中，以对固守聊城的燕将陈述利害。燕将见到书信，再三阅读，一连三日声泪俱下，迟迟不能自决。欲归燕，因与燕王有隙，怕被诛。欲降齐，怕因杀伤齐国兵将甚多，不被刘所容。不得已自杀身亡。守城燕军失帅，齐军很快收复了聊城。后人为了纪念鲁仲连，便建了高士台。

鲁仲连台，亦名“高士台”。即鲁仲连射书喻燕将处。鲁仲连台位于聊城旧城东门外。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由东昌知府陆梦履为纪念历史名人鲁仲连所建。

清·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县令黄汝铨曾对此重加修葺，并“为楼于其上，大书曰‘射书处’，其高与城等。”嘉庆二年，知府毕亨再次重修高台，且撰《鲁仲连射书台记》碑文。

《一统志》记载：“台高七十余尺”，台的南面，可拾级而上，台上崇楼壮观。台下辟有供门，是进入城东门的必经之地。台的门洞两侧，各有石刻横额，东书“鲁仲连台”，西曰“旷古高风”。

民国初年，楼已不存，而台基尚称完整。以后随着日月流逝，风雨剥蚀，以及兵燹之乱，其台基被逐渐破坏，至今已不存在。

弥陀寺

弥陀寺，位于聊城市沙镇南。整个寺由钟楼、鼓楼、罗汉堂等组成。寺内殿宇壮丽，楼阁亭廊，幽邃清宁。

据说此寺在三十年代，其钟楼、鼓楼、罗汉堂仍有残存。以后，罗汉堂被毁，铁铸的十八罗汉也被置于露天废墟之中。至建国初期我国大炼钢铁时，十八尊罗汉被熊熊烈火熔化已尽。

现弥陀寺前的一眼古井仍存在。据说，当年寺内原有井，但却比不上此井的水质。因此，老方丈沏茶，必用此井之水。

免税碑楼

免税碑楼，位于聊城闸口南太平街西头，座南面北，正对运河。

碑楼红墙灰瓦，飞檐翘角，古朴庄重。内有石碑一幢，上额刻“圣旨”二字，两边雕有二龙戏珠。中间刻有“聊城临清等五处永禁设关卡”等碑文。

据传，该碑立于清康熙年间，因刑部侍郎任克薄，予设计谋智免皇粮而成佳话。那时，东昌府为鲁西北政治、军事、文化、商业中心，自立此碑后，因关卡少，税轻，南来北往商船，多在聊城装卸货物，以至使聊城经济得以长达四百余年的繁荣。

三义宫

三义宫，位于聊城市东城门外，坐西面东，与鲁仲连台隔河相望。但建筑年代无考。

三义宫建在东城墙下，与城头的二郎庙上下掩映。苍松古木严如山林。山门朝东，高耸峻朴。门眉有一石质匾额，上书“三义宫”三字，为入城必经之路。

宫内庙宇南向，正殿塑刘、关、张三像，神态威严。四壁绘有“桃园三结义”、“破黄巾”图画。民间习俗，凡结交兄弟，换帖几来该庙，并必在神像面前盟誓，叫做“义结金兰”。

三义宫庙宇宽广，环境虽近通衢，但很幽静，犹如泰安的岱庙，并院中常有占卜者、押诗条者、下棋者、及做小买卖的人。

民国后，在此曾设立“三义宫”小学。

东昌府门

东昌府门，位于聊城旧城内西口北，大门对古棚街。

府内里有寺堂五间，左一间多貯兵器盔甲，右一部貯人命案杀人凶器，门常常上锁。

府内共有院落四进，即二堂、三堂（花厅），向后为知府夫人所居之院（官院），最后面有花园。现在的旧城西北角西花园，即其故址。院内昔有绿云楼，其“绿云春曙”是聊城古八景之一。

聊城八大会馆

聊城地处南北要冲，因运河通船，交通便利，遂成为沿河九大商埠之一。当时东关运河两岸的大闸口、大码头一带，各省所建会馆林立。

据史载，聊城当时闻名全国的会馆共有八处，简称“八大会馆”。目前，有文字可考和碑碣记载的会馆共有六处，即太

汾公所、山陕会馆、苏州会馆、江西会馆、赣江会馆和武林会馆。

太汾公所，位于聊城东关米市街路东。据清·同治十三年（公元 1872 年）《旧米市街太汾公所碑记》记载，为清康熙年间由山西太原府、汾阳府商人集资兴建。

山陕会馆，位于聊城双街南段即古运河西岸。始建于清·乾隆八年（公元 1743 年），现有山门、戏楼、三殿、碑亭、春秋阁等大小房屋 160 余间。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苏州会馆，位于聊城东关大码头南路西。清·嘉庆十一年（公元 1806 年）始建。道光四年（公元 1824 年）并由苏州商人陆续扩建。

江西会馆，位于聊城东关大闸口东岸路东（现闸口煤场附近），由江西商人集资兴建。原有有关碑刻十七幢，不知毁坏于何时。现只存有清·道光十年（公元 1830 年）特制的瓷香炉一座可供参考。

赣江会馆，位于城内楼东大街路南，约在今新华园的商场附近。始建年代无考，只知由江西商人兴建，并后曾多次扩建。

武林会馆，位于山陕会馆南邻，大王庙附近。又名浙江会馆、杭州会馆，已无资料可考。

崇武渡

崇武渡，即当年运河的一个重要港口。位于聊城城南运河沿岸。渡旁有崇武驿，有山陕、江西、苏州、赣江、武林等会馆。官吏往来，商贾集会，多寄宿于此。明清时期，运河河阔水深，堤坝坚固，河上帆樯林立，船如梭穿。茶、米、糖、纸、竹

木器材以及当地的乌枣、槐米等土特产品，源源不断地运进运出，码头上人来人往，货物堆积如山。很有一番兴盛繁荣景象。人们当时曾将此列为聊城八景之一，曰“崇武连樯。”

傅氏祠堂

傅氏祠堂，即清代开国状元傅以渐家祠正堂，位于聊城市东关街路北。

傅氏祠堂面阔三间，通面阔 12.8 米；进深二间，前带廊厦，实亦为三间，通进深 8.2 米。外观为硬山起脊，正饰花草螭吻，灰砖墙，灰瓦顶。

前厦及正堂的面阔相等，均为 4 米。山墙为青砖垒砌。前廊及正堂之间原为木质花棧隔扇，三隔扇均能当做门打开或关闭。现隔扇已被拆除。室内共有金柱四根，柱径为 0.3 米，柱高 4 米，柱础为古镜式，柱间纵距为 4.8 米，柱头之上是五架梁，其上为三架梁，正中脊柱是正心桁。梁、檩均有随梁枋和随檩枋，用料粗大，精美。方椽之上为扒砖压顶。北侧金柱距北墙 1.3 米，墙内藏后檐柱，上施抱头梁与金柱相接，室内西次间用砖墙相隔，南首开门，门槛特别高，达 40 公分。

据调查，傅氏祠堂临近原有一幢看祠人住的小屋，小屋后面有大门牌坊，进牌坊可见正堂檐下居中所悬“傅氏祠堂”四个大字的匾额。正堂内靠北墙设神龛一个，其中为木雕像，疑为傅以渐雕像，龛前有许多牌位，上书傅氏家族列祖姓名，龛前随梁枋垂下三道黄裱圣旨，内容不详。龛前左右两次间相对悬挂两匾。一九六六年，曾在龛前东侧匾后找到一个木匣，内有著名的“傅以渐骑驴上朝像”一幅。傅家每年大年三十都来此打扫卫生，初一来祭祖，放鞭炮，十分热闹。

傅氏家族是聊城任、邓、朱、傅、耿五大家族之一。傅以渐(公元1609—1665年)字于磐,号星岩,顺治三年进士一甲第一名,为清朝的开国状元,初授翰林院修撰,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深受顺治帝器重,道德文章为一时之冠。其家族曾出现过一大批官宦、学者,如傅绳勋官至兵部侍郎,傅斯年为国立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88年,傅氏祠堂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傅家墓群

傅家墓群,即清朝开国状元、兵部尚书傅以渐祖塋,自始祖到傅以渐为七世。位于聊城南偏西三里处。建于明代成化年间。墓地面积大约一顷多,里面柏木森森,凉爽宜人。

傅家墓群的大门北向,砖木结构,高约丈许,灰瓦起脊,两扇木质大门颇为厚重,门上有一石刻匾额,上书“傅氏光塋”四个颜体大字。二十年代四周还有半人多高的花墙,以后渐圯而消失。

进大门是一条通道,不远处为一牌坊巍然耸立,石刻剔透玲珑,两旁有石刻楹联:

赫赫阳功泽庇百年状元后;

煌煌诰命同称三代宰相家。

牌坊上的横额是“皇恩宠赐”四个大字,笔力端正雄健,寓颜于柳。过去的牌坊,甬道不远处两旁有华表、石羊、石马、翁仲等相对排列,尽头石碑高耸如林,有御赐、钦赐的几块丰碑,高丈许,字体工正遒秀,造诣颇深。此处大概是傅氏祖先的塋墓。

傅氏先塋大门东,有一门并列,较矮小,门上石额曰:“傅

状元莹”，进门亦为一甬道，不远处路两旁有石柱二根，上有望天猴各一，相向而立。再往前走，不远处路旁有石碑各一，上面为“文行忠信”，“清正廉明”八个大字，书法端健有力。再往前走即傅状元莹，碑石林立，与祖莹参差。莹后有许多无石碑之坟，大概是后代宗族之墓。

靠近墓园后墙，有一小型石碑，高二三尺，上有“皇天后土”四字。

穆孔晖墓

穆孔晖墓，位于聊城市堂邑镇张庄村南。原有林地 40 亩，墓前原有石碑两座，石桌一张，石猴、石马、石羊、石虎、石狮各一对，南有石门一座。墓身南北长约 10 米，东西宽略短于南北，墓身高约 10 米。墓棺南头，有墓志铭石刻两块，高 63 厘米，宽 61 厘米、厚 10 厘米。上刻“明通议大夫南说太常寺卿赠礼部右侍郎谥文简穆公”等字。

穆孔晖，人称穆阁老，名孔晖，字伯潜，号玄庵，谥文简。祖籍山东堂邑县（今聊城市堂邑镇）张庄，生于明·成化十五年（公元 1479 年）。明·弘治十八年（公元 1505 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因不附宦官刘瑾的权势，被矫旨调南京礼部主事，诛瑾后，复旧职。迁南京国子监司业，充经筵讲官。嘉靖初年参加修《武宗实录》，进学士堂院，兼撰文官诰敕。孔晖学宗王守仁，于佛学上颇有研究，后研究六籍，潜心理学。著有《读易录》、《前汉通纪》等。居官 30 年，卒年 61 岁。

任氏家族墓

任氏家族墓，据《聊城县志》载，位于古运河以东。

任氏家族为聊城五大家族(任、邓、朱、傅、耿)之首,任克溥曾为清·顺治六年进士,光禄大夫,官至工部尚书,在康熙时代显赫一时,在当地影响颇大。

1991年11月下旬,聊城一中在校东侧建楼挖地槽时,曾挖出石羊一对,石羊为青石料,跪式,长1米,宽0.4米,高1.1米(含底座),五官棱角鲜明,神态木纳,死气深深,造型较为笨拙。经考古工作者鉴定,出土地点原为任克溥的第一墓地。

据说,清朝后期,任克溥墓已由此迁往城西的仙庄。

九、民间艺术

(一)木版年画

木版年画,亦称“木版水印”或“印花套板”,是我国的传统刻版印刷方法之一。唐、宋流行单色印刷,明末发展为彩色套印。

制作本版年画的印版,一般需用纹理较细的杜木(杜梨树)或梨木板材,板厚需三厘米左右。制作时,一般是先将各种图案描绘在版材上或画在薄纸上贴于版面,然后进行雕刻。版材正面先刻骨头(眉眼及主要部分),版材背面再刻人物衣饰及次要部分,印版一套由三块印版(六面)组成。清末民初刻制一套印版需用三块银元,建国前后刻制一套印版需用九十斤小米。印版分为大号、中号、小号三种,大号版长约60厘米,宽约40厘米;二号版长约40厘米,宽约30厘米;三号版长约30厘米,宽约20厘米。刷印颜色共有六种,着色顺序为:先印黑青(紫),再印黄绿,后印红丹(橙色),刷印六次,版画即成。

清代,聊城曾有山西商人开设的三家年画店,经销年画、门神。后来,这三家之一的“刘振升画店”,迁往当时的东关清孝街。据说,此画店开业后相当发达。由于生意兴隆,于是同类行业应运而行,即有的从外地搬来聊城,有的在各地经营。其商品产地分布于原寿张、阳谷、聊城、堂邑、莘县等近20个

城镇和乡村。年画作坊，除聊城本籍或客籍商户已定居于此，常年经营色纸、帖套，仅到一定季节才忙于经营年画之外，其他均系临时性经营，即只干一个阶段。大致是每年一过阴历年，便把铺面辞退，返回原籍。这类画店，大多是半农半商户。到清末民初时期，聊城的清孝街、铁塔寺一带的年画、门神店已有一、二十家店铺。字号有聊城的五福祥、义和祥、福盛和堂邑的月泰、同顺和、裕兴和、福源成、魁元隆、广和及莘县的通顺、福兴等。这些店铺，有的独资，有的合股，都能长期经营多年。

聊城木版年画每年的开业印刷季节，多数是在秋天八月节以后开始。而有的店铺资金充裕，销货量大，如“五福祥”等家，也常从阴历的六月间就开始印画，其他较早的，也有从九月、十月间着手开印的。但一般的画店，则是“腊月初挂小牌子”（整顿铺面，筹备货物），“腊月十五挂大牌子”，即开始营业。并平均每个画店，需用纸 20 件（600 令），产量是相当可观的。

东昌府的木版年画，除销售本省西南各县和泰安、济南、潍县等地外，还远销我国的山西、河南、河北、东北等地。不过，每地所要的样式，各有差异，甚至城南、城北都不一样。这主要是因各地传统风俗、审美爱好不同所致。所以批发外贩的货色，必得适应当地情况。

聊城木版年画的版式图案，各式各样，均不相同。就当时的灶王像来说，同为门神画，就有所谓的“摇钱树”、“里烧锅”、“外烧锅”、“金灶”、“大飞灶”等。聊城一带，民间供的灶君，为灶王母两个神像，神座下也有一串铜钱和鸡犬炉灶伴衬，叫做“金灶”。个别地方，如河南等县镇，则是一个灶王居中而坐，

左右两位夫人相陪，座下的鸡犬、摇钱树等，方向较有改变，即所谓的“大飞灶”。此外，还有“天地像”等产品，尺寸略小于灶王，也是套色印刷，中间则是一尊俨然帝王的神像，并有牌位写有“天地三界十方万灵之宰”一行字。这即为过去数千年间家家传统供奉，号称“无二尊”的玉皇大帝。此外，还有什么“天地馮子”、“灶王馮子”、“财神馮子”等等，都是一种不满五寸，印有简单象征形图案的小画。这类小画，大多都是作为供祀某种神的代表物所用。总之，其印刷样式，多不一致，一般是要投合不同地域的风土礼俗来分别刻版。

聊城木版年画，图案丰富，花样繁多，多达近百种。花卉年画有：牡丹、荷花、金鱼等。历史英雄人物有：秦琼、尉迟敬德、赵匡胤、三国人物等。神话故事年画有：“封神演义”、“八仙人物”、“西游记人物”等。吉祥年画有：“五谷丰登”、“五子登科”、“麒麟送子”、“莲花哪咤”、“年年有余”等。还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年画有：灶王、门神、财神、天地神等。

聊城的年画作坊，历来是刻印分家。刻工出于聊城刻书版的地方，大都在堂邑西部的几个村庄，如西三奶奶庙、骆驼山、徐一发、许堤口等村庄，就有很多干这类刻工活的人，其中的不少妇女也会操刀雕刻。雕刻大都约期交件，论件承包。印工大都来自张秋镇。以后，其手艺也传给了本地徒工，逐渐在聊城发展起来。

聊城的木版年画的兴隆时代，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民国年间，年画作坊在聊城的清孝街还有数十家之多。他们常年做色纸、帖套。一至腊月，便把已印刷储存的年画摆放出来应市；或另辟营业店铺，挂上招牌。老贩子是年年主顾，逢季节必到。这种情况虽没有从前兴盛，但还能维持下去。民国

十五年(公元1926年),即北伐战争后,聊城的年画、门神、曾视为迷信品,已不准贴用。又因废除阴历年,年画受到影响,乃至一蹶不振。事变后,国家多事,百业不振。加之敌寇猖獗进侵,战争动乱,致使清孝街一带的纸作坊、年画、门神店,大部分都迁回了原籍,纷纷停业。年画版片,大量散失。从此以后,聊城的传统年画、门神产品,便流散于乡村。在聊城、堂邑、阳谷一带的村镇上,时有印刷发卖。

总之,聊城的木版年画,在历史上曾有过它的繁荣昌盛时期,特别是在鲁西一代的广大村镇和城市,给广大人民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响甚大。在它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对山东潍县及其它地区的年画发展,也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

(二)蝈蝈葫芦

蝈蝈,即昆虫。其形似蝗虫,短翅大腹,雄性能发出响亮的叫声。用葫芦喂养蝈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据文献中“深秋,笼养蝈蝈,俗呼为叫哥哥,听鸣声为玩,藏怀中,或伺以丹砂,则过冬不僵。笼刳乾葫芦为之”所载,可知当时为听其叫声而养蝈蝈的习惯已经形成。

旧时,聊城人对蓄养蝈蝈有着广泛的爱好。夏秋之季,将蝈蝈从田间捉回,放到由高粱秸或细竹蔑编制的笼子里。悬挂在院内瓜架下或凉棚、窗棂前,听其不时发出清脆悦耳的鸣叫声。秋去冬来,将蝈蝈放进葫芦揣入怀中御寒,闲暇无事在房前街头晒暖,取出葫芦,让蝈蝈爬出,在阳光下抖翅嘶鸣,另有一番情趣。

清末民初,聊城蓄养蝈蝈的风气甚盛,蝈蝈葫芦的销售量也颇多。其种植、制做、销售蝈蝈葫芦的村庄大都集中在城

关、阎觉寺、梁水镇三乡。如陈庄、郎庄、大杨庄、赵李王、小赵庄、拐李王、王辛、王家庙等。这一带多为沙土地，蝓蛸葫芦极易生长，而且壳质细腻松软，便于削刻。在众多的制作葫芦的工匠中，尤以郎庄的郎发敏（外号五和尚），陈庄的陈金语、大杨庄的杨印台削刻的蝓蛸葫芦图案精美，刀法流畅，堪称佳品。凡经他三人之手削刻的葫芦，每只售价一块银元，有时高达三块银元以上。价格如此昂贵却依然供不应求，登门购葫芦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故当时三人名扬省内外。

每年春季种瓜的时候，种植葫芦最为适宜，约在夏季三伏天成熟，每亩地可产葫芦四至五千个，将成熟的葫芦摘下，放到沸水里煮约一分钟捞出，堆放到一起，用葫芦秧盖上闷六至七天，扒出洗净晒干便可制做。聊城蝓蛸葫芦大致分为两种，一是圆形葫芦，凭其自然生成的形状制做；二是半圆葫芦，将葫芦从中间锯开，锯口处粘一薄木板，葫芦呈半圆状。制作工艺有两种，一是削葫芦，一是刻葫芦或称画葫芦，所用工具有：锯、画刀、刻刀、削刀、圆丈（圆规）等。制做削葫芦较为简便，先把晒干的葫芦，放到颜色锅里（一般为枣红色），沸水煮二十分钟左右，捞出晒干削制。用削刀在葫芦上削出各种花草鱼虫，浅削图案清晰，深削阴阳分明，红底白花，乡土气息浓郁，质朴美观。图案削毕，再在顶部用半圆切刀开一圆口便完成了。制做画葫芦，技术性较高，不但要有绘画技能，还应具备娴熟的刀法，二者缺一不可。画刻前先将晒干的葫芦，用食用油和黑烟滓擦去污垢，然后直接用画刀在葫芦上画刻各种图案或戏剧人物等，画刻完毕再用食用油细擦一遍，这样既有光泽，图案也更加清晰。此外，还有一种是涂彩葫芦，即将刻画好的画面，根据需要涂上各种颜色，色彩艳丽，图案鲜明，人物

造型栩栩如生,更富有魅力,既可蓄养蝈蝈,又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蝈蝈葫芦的画刻内容繁多,开始时多以自然界树木花草的装饰形式较为多见。以后,逐类逐渐增多,至今已经发展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成熟的艺术。

蝈蝈葫芦的外壳画刻装饰,大体可分为五类:

一、树木花草类

树木花草类,一般是以树木和花鸟为主体来构成图案。如“松树花篮”(即松树与花篮的连续组成)、“喜鹊闹梅”(即喜鹊与梅花的连续图案)、牡丹、大菊花、小菊花(都是用片刀削出花的平面抽象形)、“松鹤延年”(即仙鹤与松树组成图案)、茴香花(即五个花瓣都刻双线表现的抽象形)、鸡翅膀(即两个偏圆点与长短线长短线条组成一个单翅图案)及“鸳鸯戏水”等,显示出人们对生活和大自然的热爱。

二、历史故事类

历史故事类,多以历史故事的题材构成图案。如“孟母教子”(即孟子幼时接受母亲教育的故事)、“徐母骂曹”(即《三国演义》中徐庶之母骂曹操的故事)、“岳母刺字”(即岳飞的故事)、“武母悬梁”、“西施浣纱”、“昭君出塞”、“貂蝉拜月”、“贵妃醉酒”、“贵妃沐浴”、“黄鹤楼”、“空城记”、“江东记”、“战北原”、“刮骨疗毒”、“收姜维”、“诸葛亮吊孝”、“墙头记”、“二进宫”、“三进宫”、“拾玉镯”、“鞭打芦花”、“乌盆计”、“文广司武”、“犯军令”、“盗玉马”、“芝麻官”、“武家坡”、“苏武牧羊”等,均属此类。这类图案一般以人物为主,附以必要景物,人物形象生动,多富有戏剧趣味。

三、神话故事类

神话故事类,多以神话故事为内容构成图案。如“八仙过海”、“十八罗汉斗悟空”、“西游记”、“济公传”、“水淹四洲”、“金山寺”、“哪吒闹海”“盗仙草”“嫦娥奔月”、“天女散花”、“菩萨普救”等。

四、传说故事类

传说故事类,大部分取材于当地民间的传说故事。如“胭脂”、“红玉”等。

五、动物类

动物类,即以动物为题材来组成图案。如“八骏马”、“狮子滚绣球”、“二龙戏珠”、“回头望月虎”、“下山虎”、小鸡、小狗、小猫、牛马驴骡等。

清末民初,是蝈蝈葫芦发展的兴旺时期。其销售,除了在本外地外,省内和南方各大城市(如济南、青岛、上海、南京、开封、西安等)均有市场。一般是每年八月十五中秋节以前人们即担挑葫芒出发,到天津、北京、西安、苏杭等地方去卖。大杨庄的人们在民国 32 年以前走到湖南、湖北,最远到广东、广西、云南,东北三省。并时常自上年出发,到下一年的古历五月才返回来。他们一般是把卖葫芦的钱,兑换成家乡所需要的货物带回来。如从天津换来杨柳青的年画;从北京换回妇女头上的插花;从两广、云贵换来中草药;从苏杭、南京换来竹货等。过去的杨庄一度还是全国蝈蝈葫芦的批发集市。当时的批发价格一般为一斗(三十斤)麦子可买三个画葫芦,一斗玉米可买 100 个削葫芦。有时当地人到外地销售,每人可挑四至五千个葫芦,除去来回途中必要的开支外,还可换回三担高粱或买回一头小黄牛,这样的经济收入在当时对于贫苦农民来说是相当可观的。总之,昔日的这种葫芦不仅给人们带

来了较大的经济效益，而文化上的往来也促进了鲁西民俗艺术的发展，丰富了民间美术活动。

(三)聊城毛笔

清朝末年，聊城有制笔匠八、九百人，全年总产量 300 万余支，大小作坊 30 多家。其中较大的作坊有“余子尚”、“玉山堂”、“老文友”、“鲍乾元”、“魁允堂”、“恒顺堂”、“文聚堂”、“德华斋”、“德润斋”、“老魁盛”等作坊。各作坊工匠多者 100 余人，少者 30 余人。此外，另有小作坊 22 家。制作毛笔分作两大工序：一是水盆，制作笔头；二是干棹制做笔杆。艺徒学徒期间就要分学。水盆五年出徒，干棹四年出徒。当时毛笔种类共 200 余种，毫长最大的“抓笔”用六寸长猪鬃、羊胡精制。可写三尺大字。最小的毫毛只有半寸。聊城毛笔除少数纯羊毫楷笔外，基本上沿用传统的“韦诞法”制作，经过大小七十二道工序才为成品。其特点是外形美观，刚柔相济、富有弹性，吸墨性强，经久需用。书写时纵横挥斫，挺拔有力，圆润流畅，不掉毛，不散毛，具有精品毛笔所特有的“尖、齐、圆、健”4 质，是书法绘画之佳品。产品大多销往山西、河北、河南及本省各地。

清·顺治 3 年(公元 1646 年)开科大考，聊城傅以渐用本地毛笔写出了光彩照人的文章，深得顺治皇帝的赞赏。御笔钦点头名状元。康熙皇帝巡幸聊城曾用聊城毛笔撰文赋诗，并为光岳楼题写了“神光钟英”的匾额。康熙 60 年(公元 1722 年)聊城邓中岳用本地毛笔进京应试，康熙皇帝朱批“字压天下”钦点头名状元。海源阁创始人杨以增用聊城毛笔撰写了《重修光岳楼记》碑文，从此聊城毛笔闻名遐迩。

进入民国后,随着木版印书业的没落,毛笔制造业逐渐呈现凋零景象。大作坊相继关闭,小店号勉强维持,全县毛笔制作工匠不足 200 人,年产毛笔的数量也只有 50 万支左右。

建国后,制笔业由个体经营转向合作经营,并从进一步精选原料、改进传统工艺入手提高产品质量,相继用苏杭产优质羊毛、兔毛和黄尾、苘麻,制作出“极品精选长锋大楷”、“极品精制中楷羊毫”和“民主”、“和平”、“前进”、“胜利”等名牌大中小楷笔,不仅在国内十分畅销,而且被省外贸部门定名为“狼毫卷笔”出口,并 5 次从青岛、上海、广州等口岸出口销往香港、日本、南洋群岛等地。

随着人们书写工具的改变,毛笔的使用范围也逐渐缩小,自然聊城的毛笔业也逐渐解体。1983 年春,聊城仅有的几位老技工在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聊城毛笔厂”,将历史技艺留传后人,以求聊城毛笔业的振兴与发展。

(四)金银制品

金制品,主要是金箔,系清·光绪元年(1875 年)由聊城“泰兴金店”(后改为“万兴金店”)生产。此制品的原料以黄金为上,白金、赤金次之。从原料到成品,大体要经过熬液、铸造、规截、锻打、切剪、包装 5 道工序。产品具有薄(厚度为 1.5 丝)、脆、轻的特点,主要用于匾额、楹联、屏风、文物、卷帙、联对、首饰、佛像、建筑物的装饰,还可入药。产品多销往豫、皖等省以及朝鲜等地。

银制品,按其形状,大致可分为丝货、片货、响货 3 类。丝货是将银成丝后,蟠结连系而成的首饰,如“九连紫龙头”、“九连环戒指”、耳坠、项链等;片货是捶银成片后做成的首饰,有

花鸟虫草、人物、动物 30 多种样式，响货有儿童佩戴的腕铃，妇女头发上插戴的响器等。银器的制作，是将银熔化，倾倒在钢制的模具内而成“毛坯”，然后再根据需要精心雕磨，焊接，即为成品。其产品主要有簪、环、钏、坠、戒指、项链、脖锁、卡子、镀金、点翠等 10 余种，近百个花色。产品除行销附近几十个县和河南、河北等省。70 年代以来，由于原材料缺乏等多方面的原因，金银制品的生产已几近绝迹。

十、儒学教育

(一)私塾

私塾，是私学的一种形式，在我国封建社会教育中已有很长的历史。春秋末期，孔子在曲阜杏坛设学，首开私人讲学之先例，这是我国私学之始，到战国时期私学大兴。汉朝以后，私学成为我国封建时代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末民初，在官立学堂尚未普遍之前，聊城的私塾乡城都有。私学的形式很多，但主要的有三种，一是由董会办学，聘请塾师，学生按年龄大小和程度高低以及家境贫富交纳学费（即束修），这叫私塾。二是有钱有势的富户延请塾师，自己设馆以教授子弟，这叫家塾。聘请塾师的人家叫“学东”，被聘塾师人住在学东家，由学东供给餐饌这叫“供饌下榻”，聊城城内这类私塾较多，因塾师多非本城人，不便“走教”，他们只拿“束修”做为工资。第三类是由塾师自己设馆，招收乡邻友好之子弟入馆，称为“学馆”，这类私塾在广大农村颇为多见。如阎寺庞庄秀才庞岱山，胡屯秀才胡其昌等人均在民国初年在自己家中设馆办学。

对于私塾中任用的塾师，一般都由学董或学东的亲友举荐，待确定以后于旧历年前把聘书送达所要聘请的人，这叫“下关书”。应聘者把“关书”收下，就算确定任教，只等来年“就馆”（即开学）。

教师就馆一般在正月十六这天，书房里设立孔子的牌位，上写“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学生与家长汇聚一起，先由教师在孔子牌位前焚香行跪拜礼，然后学生按年龄大小依次对着牌位向孔子及老师行跪拜礼，这就是拜师仪式，也即开学典礼。教师聘期为一年，腊月十五以后，由学东设宴招待教师，席散之后，教师回家，名曰：“解馆”。如果来年继续聘请，年内要另下“关书”。

私塾的教学形式与学校不同，私塾是由一个塾师，同在一个学馆，教授年龄不同，程度不一的学生，不分年级高低，学习年限无统一规定，教学无一定进度要求，学生人数少者三五人，多者一二十人。在同一个学馆内读“四书”“五经”的学生，也有发蒙的幼学者。其教学特点是，同窗读书，分别教授，没有课时之分。

私塾的课程可分读、写、讲、作四方面。读，主要是读“四书”“五经”，读的顺序一般是从《百家姓》读起，然后是《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易经》、《春秋左传》、《礼记》等等，有的兼读些《弟子规》、《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千家诗》、《唐诗合解》等，作为课外开拓读物，但不全设。凡是先生教读的，一律要求背诵。每天早上，先生教学生读课文（所谓“教”，只是教给念，并不讲解），教完之后，由学生熟读背诵。待背熟后，再去接受先生检查即执书去先生桌前反身背诵。先生检查时提示段首一句，由学生按顺序往下背，这叫“提书”。有时学生因背不熟或漏句，则要挨打，一般是打一巴掌而已。挨打后如学生仍生涩滞阻，如师怒，则要罚跪。罚跪即跪在地上，须要腰杆挺直，两手捧书，而唸唸不休，倘身躯偃缩，即还要遭打。遭打是先生用戒尺（即

一尺左右的方扁形木板)打学生的手心,即一般是先生紧抓其手,厉声喝其伸平,然后则用戒尺使劲打之。有时学生哭着求饶,但也照打不误。其疼痛之难忍,常吓的其他学生目瞪口呆,直出冷汗。尽管是遭打,但打而仍须直跪,直至将书背下来,方可结束。如果一本书读完了,还要经过总复习之后,从头到尾背诵一遍,这叫“背通本”。背会通本,再学下一本。

写,是练习写大小毛笔字,要求正楷、每天每人一盘大仿,一篇小字。大仿先从“描红”开始,然后写“仿影”,再后写“跳影”,最后写碑帖。碑帖以“欧”、“柳”二体为多,如“多宝塔”、“玄秘塔”、“皇甫碑”、“九成宫”、“圣教序”等。每盘大仿写完,要交老师批阅,先生用朱笔在好的地方画圈,在差的地方打杠,然后发给学生,这叫“盘仿”。

小字,每天可写一百至三百字,也按仿影或小字帖抄写,写完后先生有时检查,有时不检查。

讲,是由先生每天讲新课文,主要是教给学生句读和生字的读音,并不讲解课文。待学生程度有了提高以后,先生就给“开讲”。一般先讲“二论典故”,然后讲解《孟子》、《大学》、《中庸》,讲《诗经》、《左传》。有的兼讲《千家诗》、《唐诗合解》之类的诗篇及《古文观止》一类的补充教材。先生讲完,学生自己领会、理解,然后向先生“回讲”。

作,主要是作文章,开头先写记叙文,皆用文言。逐渐作议论文,多是从四书里摘出一句作为命题,作八股文。八股文即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落下或收结等部分组成。又因在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部分,各有两股互相对应的文字(共有八股),故称之为八股文。废科举后,仍有一些私塾先生让学生作八股文。八股也叫“八比”,又

称“制艺”。开始写时要从“破题”开始，例如“学而时习之”，这个题目，可以写“圣人以学勉人，时习要矣”作为破题。然后写“夫学不时习，不可为学也”，作为“承题”。然后就是“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程式。前四部分称“半篇”，能完成八部称“满篇”。

另处也作一些短诗，以五、七言律诗为主，初学者以五言绝句为主。作律诗要先从“对对子”（也称对仗）开始，先背诵“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之类的歌诀。另外再学点有关声韵的知识，使学生懂得平仄。

私塾教师的来源多半是家境清贫而又不愿从事其他职业的小知识分子，有的是秀才，有的是贡痒廪监生中的落魄者，其水平亦参差不齐，有真才实学者不乏其人。如沙镇王堂廪生秀才任呈祥，官至奉政大夫，一生从事教育四十余年，从学者二百余人，成才者百余人，入庠者三十多人，病逝后学生立碑赞曰：“从学数百人，教无类，诲无倦，一时均沾时化雨。”其子任光谱，考取府痒生，办私塾三十余年，从学者一百五十六人，入痒者五人。当然，大部分塾师多为以教糊口，靠收些束修维持生活。

私塾教育自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以后即开始衰落，可是直到大革命时期，我市仍有一定数量的私塾，读经讲经依然盛行，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聊城城内因学校停办解散，市民子女无处就学，仍又出现过一些零散私塾，不过这仅是一种非常时期的过渡教育，已不是教育的主流。

私塾中的制度规矩一般都很严格，如学生上厕所要“领签”，教桌上放有“手简”，违犯纪律的学生要被打手掌。另外还有罚站、罚跪等戒律。

据初步统计,全县农村清末至民初共有私塾一百余处。较发达的集中在沙镇、于集、梁水镇、斗虎屯、堂邑等乡镇。较著名的有沙镇的孙丰、王堂、丁楼,于集的孙堂、裴寨、王寨、于集,大张的李知洲、糖坊、齐楼、庄户,郑家的温集、李海、西邱,侯营的孙克胜、田庄,蒋官屯的孟营、李行、李官屯,许营的韩庄、王庄,梁水镇的任老九、大杨庄,李海务的谭庄、权寺,西王的姚屯、端庄、郭屯,堂邑地南街、陈庄、南关等村镇的私塾。

(二)书 院

书院即官办高级私塾,仍为我国封建教育的一种办学形式,也是清末聊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开元六年(公元 1718 年)设丽正修玉院,十三年改称集贤殿书院。置学士、掌校刊经籍、征集遗书、辨明典章,以备顾问应对。贞元中,李渤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至南唐时就遗址建学馆,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宋改称白鹿洞书院,为藏书与讲学之所。宋代书院尤盛。白鹿、石鼓(一说为嵩阳)、睢阳、岳麓号为四大书院。创办者或为私人,或为官府。一般选山林名胜之地为院址。不少有名学者讲学其间,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间亦议论时政,对学术思想发展有一定影响。元代各路、州、府皆设书院。明、清书院仍盛,惟多数成为准备科举的场所。清末废科举,书院改学校。

书院的组成有院董会,它是由有功名的乡贤文人所组成。书院的创办人或负责人称“山长”,“山长”多为府、州、县等地方长官或在京任职的本籍著名人物充任。书院的组织创

办方式是由山长出面延请当地学行有素的举人、进士任教，每年由地方募款或捐资，并置有学田地，以供书院开支。

据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聊城县志》载：聊城城内
在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之前共有
书院六处，即东林书院、光岳书院、龙湾书院、阳平书院、启文
书院、摄西书院。

东林书院，位于聊城城东，由明朝参政耿明创建。

光岳书院位于聊城南门里，清·雍正四年(公元1727年)
由知县张维垣建。

龙湾书院位于聊城龙湾村的运河以西，由太常寺少卿任
溥建。

阳平书院位于聊城府学东的司马街，清·康熙五十八年
(公元1720年)由知府杨文乾建。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
1761年)知府吴承勋以其为万寿宫，别购宅一区，辟为书院。

启文书院位于聊城孙家胡同，其规模最宏大，清·乾隆二
十九年(公元1765年)由知府胡德林售郡人孙启淑旧宅改建，
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3年)知府张官五筹款重修照厅
三间，门房两间，讲堂三间，东西房各三间，正房五间，新建西
厢房三间，文昌阁五间，东西对楼各三间，后平房三间，西院南
书斋三间，北书斋三间，旁列回廊后院书室六间，从房六间，周
墙复壁，棖角焕然。清·光绪十年(公元1885年)知府程绳武
重修。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改为东昌府官立中学堂
(即后来的省立聊城二中)，今为实验小学园之大部。

摄西书院，位于聊城城东北隅(今聊城城内公园)，清·光
绪二十二年(公元1897年)知县凌芬就义学宅舍创建。后根
据清廷谕令：《谕各省府厅州县改书院设学堂诏》遂于光绪三

十年(公元 1904 年)改为聊城县立高等小学(即后来的卫仓小学)。

(三)科 举

科举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因采用考试的办法分科举士,故称科举。

我国的科举制度始自隋朝大业三年(公元 607 年),当时仅进士科;唐朝初期除进士科外,增设秀才、明经、明法、明书、明算诸科,还有一吏、三吏、道科等科,据有关资料记载,我国的第一个状元,产生于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武德五年(公元 622 年)。因该年的干支为壬午,故称壬午科,这个状元叫孙伏伽;武则天时采取殿试,并增设武举;宋朝以后,考试专用儒家经义;明朝,科举制度达到完备和鼎盛。清代,于顺治二年(公元 1645 年)实行科举取士。其制既承明制,又有所发展,使科举制的形式趋于完备。清代的科举制主要分为文科、武科、制科和翻译科。

1、文科考试

文科考试,其内容多沿袭明代的制度,主要以八股文为主。即一般是专取《四书》、《五经》命题,由于题目来源不同,又分别称为《四书》文和《五经》文。其文体,不论内容和形式,都有严格的规定。在内容方面,作者必须代圣人立言,不仅要依据《四书》、《五经》等儒家的经典,而且要遵守一定的注释。《四书》主朱熹集注;《易》主程颐传、朱熹本义;《书》主蔡沈传;《诗》主朱熹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浩集说。后来,《春秋》改用《左传》本事,参用《公羊传》、《谷梁传》。在形式方面,每篇文章均采用八股文体,且全篇的字数也有规定。

顺治二年规定：每篇限五百五十字。康熙二十年，增为六百五十字。乾隆四十三年，又增至每篇七百字，违者不录。《四书》文和《五经》文，虽然同是八股文，但是，在科举考试中，《四书》文比《五经》文更为重要。

文科考试，分为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

童试，为最初级的考试。清代的学校，和明代一样是科举的必由之路。府、州、县学的学生，称为生员。未取得生员资格的读书人，不论年龄大小，都称为儒童或童生。童生要取得生员的资格，必须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总称童试。

县试，即由县官主持的考试。读书人必须先参加在本县举行的县试，被录取后才有府试的资格。

府试，是由知府主持的考试。经县试录取后的读书人可参加府试。府试录取后的考生即取得参加院试的资格。

院试，是由各省学政主持的考试。因学政的官署称提督学院，故称院试。院试进行三场考试，第一场考四书、《文律诗》；第二场考《易经》、《书诗》、《礼记》、《春秋》、《五经文》；第三场考《五问》。院试被录取后称为生员，即秀才。明朝，州、府、县学生，由官府发给廪膳，用以补助生活。故又称这些学生为廪生，也称廪膳生员。以上的三次考试，均为选拔官吏的一种预备考试。在取得秀才的资格以后，才能参加乡试，而秀才不能做官。因此，我国在封建社会中有数不清的秀才，他们都终生以书为伴，又因通不过乡试这一道关卡，而终生贫穷如洗。

乡试，是明清两代在各省的省城举行的科举考试。即三年一科。并沿明制，例于秋八月举行。考试分三场，初九第一场，十二日第二场，十五日第三场。考试内容，虽以《四书》、

《五经》为主,但在清中期以前,并不要求应试者遍治群经,如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论题就曾专用《性理》,后乾隆帝认为考生各治一经,于他经并不旁通博涉,非敦崇实学之道,分经阅卷,又容易产生弊端,决定从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戊申科乡试开始,在五科之内,按《诗》、《书》、《礼记》、《春秋》的顺序轮流命题,考完《五经》,然后将第二场论题裁去,以《五经》各出一题,一并进行考试。此后成为定制。乡试中额,各省多少不一。如顺治二年时多者一百六十八名(顺天),少者四十名(贵州)。后来,各直省的乡试中额,有分有合,有增有减。中额者称为正榜,正榜之外,还有副榜。名列正榜者称举人,正榜第一名称解元。名列副榜者称副贡。副榜要取得举人资格,还必须在以后的乡试中取入正榜。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在京城举行的全国性考试,称为礼闈。举人须经资格审查或复试,才能参加会试。会试每三年,即乡试的次春举行一次。会试的日期,清初定于二月,乾隆十年改为三月,此后成为定例。会试场次、考试内容等和乡试略同。会试总主考官称为总裁,下有同考官,俱由礼部题请皇帝选派,一经宣布,立即前往贡院,不与外界往来,其职责等亦与乡试略同。会试中试,没有定额。最多的一次是雍正庚戌科。录取了四百零六名,最少的一次是乾隆己酉科,仅录取了九十六名。会试中试,称为贡士。前十名名次,由皇帝钦定,第一名称为会元。会试被录取后即取得了参加殿试的资格。并且录取者可以做官,但官职不大。

殿试,是我封建时期科举制度中最高一级的考试。一般是在会试之后举行。清初是四月举行殿试;乾隆二十六年定于四月二十一日,从此成为定制。殿试的内容是经史时务策

一道。每策包括三至五题。出题时严加保密。殿试对策以一日为限,试卷弥封后,收掌官用箱盛储送读卷官评阅。殿试策题,是以皇帝的名义发问,所以评阅试卷的官员称为读卷官。评阅完毕,以前十卷进呈,由皇帝亲定名次。皇帝亲定进呈十卷的甲第名次之后,由填榜官填榜。填榜后一日,皇帝亲临太和殿举行传胪大典,宣布殿试结果。王公百官和全体贡士届时参加。一甲三名,即第一甲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传胪后,新进士还要在保和殿参加朝考。内容是论、疏、诗各一道,试题由皇帝亲命,当日交卷。朝考试卷,由阅卷大臣拟定一、二、三等进呈,前十卷的名次,亦由皇帝亲定。一等第一名称为朝元。按照清代的规定,一甲三人,在殿试揭晓后立即授职,状元授翰林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其他进士,则按复试、殿试、朝考三次所得等第的数字,分别授以庶吉士、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推官、知州、知县。至于在殿试、朝考时文字谬误或犯规的进士,则以知县归班,不予分发。进士是科举的终点,也是仕途的起点。在清代的政治舞台上,许多飞黄腾达的人物,均是进士出身。

2、武科考试

武科考试,亦分为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武童试,三年一次,于学政到任的第一年举行,它和文童试一样,先经县试、府试然后院试。武童考试分三场:头场马射,二场步射,三场原试策论,后改默写《武经》。合格者为武生。武生举优者,准予参加乡试,乡试亦三年一次,于十月举行,中试者称为武举人。次年九月,各小武举人会集北京进行会试,中试者称为武进士。武殿试,于会试后一月举行。先试中试武举人策

题于太和殿，再于西苑（今中南海）试马、步射及弓、刀、石。由皇帝亲定甲第，再行传胪典礼。一甲三名赐武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武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武进士出身；一甲三名，分别称为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传胪后，武进士分别以武职录用。

聊城是东昌府所在地，所有府属各县的读书人，自然都希望从科举这一途经而有所成就，但谈何容易，真正能一举成名的却是寥寥无几。所谓“十年寒窗苦”，正如实地道出了这些读书人的苦衷。

聊城当时的县试，即童生先在衙门的礼房报名。其报名手续一般较为简单，并无须保人，只是由负责人编个号即可。考试时，按照当时的规矩，其学子必须穿靴顶帽。即头戴红帽子，身穿衣套子，脚蹬靴子。所谓“衣套子”，实际是一种对门襟扣、较短、穿在外的套衣。有些家贫的学生，有时做不起衣套子，便只有去宣讲先生处借衣而用。然后才可身穿所借之衣去参加考试，其寒酸之状令人可笑。童生考试一般都在夜间进行，即考试前要大约在夜里十一、二点钟开始鸣炮。鸣炮即分为三次，开始放者为头炮，待过半小时放一次为二炮，再过半小时放一次为三炮。鸣三次炮后已是夜间时间一点左右，这时即开始对考生一个一个地点名，点到者便应声而入考场。

聊城的考场，在城内南门里的“考院街”，当时曾称为“考棚”。学子们若由场外进入考场，需经二道门才能进入考棚。考棚外面的第一道门叫做“头门”，头门左右两侧又各有小门相通，称为“东辕门”、“西辕门”。第二道门，称为“仪门”，一般在考试时多在此对考生进行点名。从仪门向里，左右为东西

文场。文场正对着大堂，大堂上悬挂着黑底金字的横匾，上写“圣谕”和“读书立品”四个大字。过大堂即为二堂，堂内仍悬挂着黑底金字的横匾，上写“春华秋实”四个大字，为状元公邓钟岳所书。东西文场即考棚，各有两栋房子，每栋从中间隔开，分为两厢，合起来共有八厢。每厢房内一般可安置十多排号凳，每排可坐十号人，八厢共可容纳千余人。所谓号凳，一般是用约一尺宽的木枋将两头搭在石头上而做成，其高度大致与现在的桌子相同。坐的凳子，一般也是用约四寸宽的木枋将两头搭在石头上而做成。号凳编号，一般多按《千字文》中“天元地黄、宇宙洪荒”等文字顺序编排。即每个字共编十号，如第一排“天”字，则编“天字第一号”、“天字第二号”……直至“天字第十号”；第二排“地”字，则编“地字第一号”、“地字第二号”……，其他以次类推，按字向下排。

各童生在经过点名入仪门后，首先要经过“承差”的搜身检查，经检查确无夹带文章之书，方可进入考棚。考棚内由承差监考，每厢有十余人，一般待童生入场安静后，就开始“下题”。下题即是由一人举起一个上面用大字写有试题的木牌子，边走边敲锣高喊“请各位先生看题”等语，然后，在东西两个文场转三圈，即为“下题”。下题后，各童生便可按照所下之题即可动笔。动笔后要首先在卷子上写一段“圣谕”，圣谕的本子是康熙手头写的，并规定童生写某一段至某一段，是不能写错的。同时，答卷上不可犯讳，比如康熙皇帝叫玄烨，卷纸上就不能写“玄”字，一般是打个方框，表示此字忌讳。犯了讳，文章再好也必须作废。

县试，一般要连续考五天，即每天考一场一个题。中途吃饭自带干粮（即熟面食），但不能在号板上吃。五场考试结束，

即发榜。榜上有名的，才能进入下场考试。学子上千人，也只剩下五、六十人。最后，考棚还要发一次总榜，也叫“拖长榜”，多挂在考棚对面的大影壁墙上，上按原来的团数（一团约五、六十人）公布考生名单以及考生所参加的考试场数。其中除犯规等被取缔者外，其余考生都有名字，只是有的考中了，有的没考中罢了。长榜公布的第一名考生称“县批”，往往十分引人注目。

继县试之后，接下来即是府试。府试仍然属于童生考试，即考生经过县试之后的第二道予考。府试的报名规矩虽大致和县试相同，但对于幼童，府台大人常往往把他们提到考棚的“三堂里”来进行单独考试。这种做法当时叫做“提堂考”，其目的主要是怕有人当“枪手”，代幼童写文章。由此可见当时的考试方法是十分严密的。府试中能获得第一名的，当时称“府批”。其余考中的考生，便可以再参加“院试”，即去考取“秀才”的功名。

聊城当时的院试，是极其严格的。又因考试是由钦命提学使司的提学使来监考，一般不受地方的制约。院试的报名，要有廪生保举手续，即保单。保单上要注明某人保某人，并且还要由廪生盖章方可有效。做法上一般是两个廪生保一个童生，一个叫“认保”，一个叫“派保”。院试开始时是先点名，由考生回答，但谁是保人，也是要点名的，点到者也要站出来证明，这也叫“唱保”。唱不出保不行，没有保人证明也不行。否则，则不准进入考场。考试开始，各做保的廪生，都要在学院两边等候，一般不能远走。院试结果，考生被录取与否，一般不采取发榜的形式通知，而是挂“水牌”，即用长约三尺、宽约二尺的木牌，用毛笔在上面写上录取考生的号数，挂在头门外

的墙上。木牌多为木头本色，写以黑字，字迹清晰，美观大方。挂了水牌，也就算录取了，但必须再经一次复试挂出水牌，才叫正式录取。一般来说，考上“县批”和“府批”的人，也一定能考取为秀才，据说这是提督学院给县府的面子。只可惜秀才仍不能做官，又加大多都通不过乡试这一道关卡，而只能过着清贫如洗的生活。

但是，在这些饱尝辛苦的秀才中，毕竟还是有一少部分人由已经经过的县试、府试、院试又进而逐步地经过了乡试、会试直至最后的殿试大关，即一步一个台阶地登上科举仕途的最高点，终算金榜题名而戴上了状元的桂冠，获得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美好结局。

聊城自明成祖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疏浚会通河（即今运河）以来，即成为大运河沿河九大商埠之一，漕运不仅促进了经济繁荣，而且也促使文化教育日益昌盛，尤其明清以来，聊城文运大开，书院林立，私塾遍及城乡，鸿儒相卿连翩鹊起，文人骚客脱颖而出，成为鲁西北经济文化重镇。仅据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聊城县志》记载，明清以来，考中举人者三百二十三人（内有武举一百二十九人），考中进士者七十一人（内含武进士十六人），考中状元者三人（内有武状元一人）。颇享盛名的任、邓、朱、傅、耿即是这众多的科举仕人物中的佼佼者。

现将在政治和文化学术上有作为有成就的仕进名人列述如下：

傅以渐，字于磐，号星岩，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聊城人，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丙戌科开科大考，在京都保和殿经皇帝亲自主试，傅以进士一甲第一名夺

魁，成为清朝开国后第一名状元。该科共取进士 373 人（一作 400 人），会元李夬棠。考官：内阁大学士范文程、内阁大学士刚林、内阁大学士宁完我、内阁大学士冯铨。会试试题：“百姓足君”一节、“行而世为”一句、“王道之始”一句。傅以渐重状元后，曾在朝内外轰动一时，后被授宏文院修纂，以后当了康熙的老师。累官至侍读学士、国史院大学士、秘书院大学士，加封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他曾奉旨纂修《明史》、《太宗文皇帝（即皇太极）实录》，并任清太祖、太宗《圣训》总纂，奉命与曹本英合作《周易通注》，还曾奉旨总编《通鉴全书》。著作仅《四书易经制义》尚存。傅以渐在政治、文化上多有建树，深得顺治皇帝器重。后因病辞仕归家，曾主持编撰《聊城县志》。清·康熙四年病故，葬于聊城傅家坟。

邓钟岳，字东长，另悔庐。聊城城南邓楼人。清·康熙四十七（公元 1708 年）中举，康熙六十年（公元 1721 年）辛丑科考试，登进士一甲第一名（状元）。该科共取进士 163 人，会元储大文。考官：吏部尚书张鹏翮、户部尚书田从典、户部侍郎张伯行、副都御史李绂。会试试题：“据于德依”三句、“郊社之礼”四句、“自生民以”三句，邓钟岳取装元后官授翰林院修撰。雍正元年（公元 1723 年）充江南副考官，后任江苏学政、广东学政。雍正十一年（公元 1733 年）迁礼部右侍郎，总编《一统志》。乾隆元年（公元 1736 年）出任浙江学政，后两任江南正考官。严肃考风，所荐官员皆贤良清正之人。邓钟岳操行方正、治学严谨，为人刚直不阿。所论《政治之要在正风俗》深得雍正帝赞赏。学术上，大力倡导切磋之风，深受学术界称颂。乾隆十三年（公元 1748 年），随帝东巡，卒年 74 岁。著作《知非录》一卷，《寒香闻诗集》四卷，《文集》四卷等。

李孟悦，生于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聊城城南四家李村人。自幼习武，精通武艺，20岁中(武科)秀才，23岁中(武科)举人，25岁中武状元。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李孟悦保驾护送朝廷到西安。次年，出任广东参将，后升任两广镇台。辛亥革命时期，因受忠君思想支配，对孙中山劝导参加革命婉言谢绝。袁世凯称帝，不愿依附袁，返回原籍。在地方协同杨兰亭、白凤歧等组织六合团、建立地方治安武装，维持地方秩序。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患偏瘫病，次年病故于乡，葬于朱老庄四甲李村。

杨以增，字益之，一字至堂。清·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中进士，授贵州知县，后升贵阳府知府，政绩颇著，又升为广西左江道道台、甘肃按察使、陕西布政使。在布政使任内，与陕西巡抚林则徐友谊甚笃，林举荐杨以增自代，李遂升为陕西巡抚，最后官至江南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卒于任所。杨以增于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开始收藏宋元珍本秘籍，后来得到同年好友、清代著名文学家梅曾亮、包世臣的协助，于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创建藏书楼“海源阁”，后为我国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详细情况见前名胜古迹中“海源阁”文。)

傅绳勋，字接武，号秋屏。聊城人。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中举，第二年登进士第，入翰林院，后授工部主事，升工部郎中。不久便出任地方官，历任广东琼州知府、四川州知府、广东盐运使，升陕西按察使，江宁、广东、云南布政使，又迁浙江巡抚、江西巡抚、江苏巡抚，后引退归里。咸丰初年，宋景诗率黑旗军在堂邑、聊城一带起义。清廷诏令傅绳勋组织团练镇压，傅称病未出。晚年主讲于泺源、启文书院。

杨绍和：字彦和，号颢卿，杨以增之子。清·咸丰二年（公元 1852 年）中举。曾协助山东团防大臣杜翎在聊城、堂邑一带镇压农民起义军。后登进士第，入翰林院，任编修，侍读。他得以清宗室弘晓“明善堂”的大量藏书充实了“海源阁”。他对文字训诂学有精深研究。（详细情况见前名胜古迹中“海源阁”文。）

任克溥：字海眉。聊城城内人。清·顺治六年（公元 1649 年）进士，历任南阳推官，吏科给事中，通政使、刑部右侍郎、左侍郎等职。上疏建议减载督捕。当时，敢言督捕者罪当流放，康熙认为任克溥敢言强干，确实如此，大为欣赏。后落职回乡，筑“绮园”。康熙帝南巡，路经聊城，为其恢复原职并亲临“绮园”赐“松桂堂”匾，题联“绿水本无忧，因风皱面；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回京后加封刑部尚书衔。任克溥多次上疏，言及国计大政，深受康熙帝器重，家居 20 余年，捐助修建学校多处，卒年 86 岁。

十一 乡风异俗

(一) 节日时令

立 春

立春,俗称“打春”,为夏历的正月节,有时也在腊月,一般是在公历的二月四日这天,或提前错后一两天。传统的算法,大寒后十五天,斗指东北维为立春。这时日行黄径 315° ,气温开始上升,春季即由此开始。

《东昌府志》中记载:凡立春前一日,官府率士民,具春牛、芒神,迎春于东郊。作五辛盐,统称为春盐,饮春酒、簪春花。……立春日,官吏各具彩杖,击土牛者三,谓之鞭春,以示劝农之意焉。鞭春的礼议,清道光年间又有所发展。即在立春日正时,备牲礼果品,各官诣芒神位前行三献礼,至土牛前击鼓者三,击土牛者三。立春前五天检查鞭春的准备工作,称为“演春”,立春的前一天,官府东郊迎土牛、芒神,谓之“迎春”,男女老少随同观看,叫做“观春”,立春日这天击春牛,称作“鞭春”或“打春”。

过去的迎春仪式,是一年伊始不可少的一件大事,并且都要由地方官员主持举行。迎春仪式,多在聊城东郊外的惊蛰堂举行,此堂已在1937年秋被大水冲塌。东关越河圈街东

头，有座迎春桥，当时是往东郊迎春的必由之路。此桥横跨越河之上，为运河东十二连桥之一，是城乡交通要隘。民国初年曾重修，有邑人名书画家齐培栋撰文的石碑，详载当年迎春之事。至今，桥已不存在，并无从寻觅了。

春 节

春节，即每年的正月初一，称之过年。一大早，人们就起床，下饺子，放鞭炮，然后把煮熟的饺子一碗一碗的放在堂屋屋门东侧的香案上，接着便在家长的带领下进行祭拜，祭拜是一拜天地，二拜王母娘娘，三拜灶王爷，四拜财神爷，五拜老祖宗，现在一般只拜老祖宗。祭拜结束后，便是家拜，即一家人中晚辈给长辈拜年（磕头），平辈之间互相拜年。家拜完以后，便进行近拜，也叫村拜，即向街坊邻居挨户拜年贺岁。村拜时一般都是年轻人出拜，长辈在家接待宾客。这一天的街上，男男女女会络绎不绝，相识者途中相遇，不论亲疏，必互致问候。旧时作揖为礼，互道“见面发财”等语。即使平日不睦，有什么嫌隙，经过拜年的接触，也就言归于好，前嫌尽释。债主于欠口相遇，也各自拱手互祝吉祥如意，矢口不提欠债之事。所以，民谚说：“难过的腊月，好过的正月。”

初一是新的一年开始，这一天不仅要只讲吉利语，不说丧门话，而且禁忌很多。如不许动刀剪，认为是凶器，动之不吉；不准用生米、生面、生菜下锅；不准吃稀粥，因稀粥称为糊涂，吃了会一年糊里糊涂；不能扫地，倒土，说会倒掉元宝。忌打破家什，万一孩子摔碎碗，大人马上说“岁岁平安”（谐音）。为防孩子说不吉利的话，还用红纸写上“童言无忌”四字，贴于屋内。厕所为五鬼之地，元旦早晨太阳未出时不准去大小便，恐

亵渎神灵，招灾生病。这些习俗，随着时间的流逝已渐渐消亡。

从初一这天起，聊城东门口人烟闹市，摊贩杂列。玩洋片的、说大鼓、啦评词、打洋琴、摇会的，变戏法的，打拳卖艺的，卖各种吃食的更是应有尽有，各式各样的担子摊点，摆满河涯和城墙根。因春节三天不禁赌，所以化局的趁机摆牌九、骰子、麻将等聚赌，呼么喝六不绝。城边各大路口，都有专招揽妇女进城乘坐的小花车。从东门口还可以坐船去山陕会馆看戏。这种热闹场面直到元宵节过后才冷静下来，各种杂耍玩艺也慢慢离去。

正月初二，是亲朋之间各带礼物相互拜年的日子。尤其是正月初二这一天，女儿女婿一般都要带上孩子去丈人门上拜年，婿到岳家，是贵客，全家人都要嘘寒问暖，热情照应。一般是先沏茶，下水饺，先让女婿吃上一碗垫一垫，尔后在堂屋供祭的祖先神轴前，铺上垫子，必恭必敬地磕头，给岳父母拜年。岳父母站在一旁受礼，随后由内兄弟带领，到本宗本族及街邻家逐一拜年。回来后再上酒菜，筵席十分讲究，新婿不能作假，直到酒足饭饱岳父母才高兴。当日即回，不能住下。并在婿将归时，岳父母家对新婿的带礼物除肉、鸡、鱼留下外，其他一般头三年不留，回礼是十斤至二十斤的大花糕。

初二还是祭财神的日子。城里人这天除在家里财神像前烧香叩拜，有的还携带肴饌酒壶，到山陕会馆内的财神殿或王家园街的财神庙里供祭借宝。大的商号店铺，要卖条活鲤鱼去祭财神。鱼目糊上红纸，放到神案上，斟酒酌祭毕，立即把鱼送到护城河（今胭脂湖）去放生。每年的这天，在沿东城门路上，摆列一只水盆，专卖活鲤鱼。清末民初，聊城“三合堂”

书铺自编自印的唱本，有一种名为《东昌俗曲十二月》，其中一段写道：“正月初二呀祭财神，点上蜡烛把酒斟，一尾尾鲜鲤鱼，活蹦乱跳真喜人，磕罢头，祭罢神，护城河阔水又深，鲤鱼放生呀福来临。鞭炮响后已黄昏，家家吃馄饨。”

初三至初十，老亲戚多在这时间相互拜年。旧时，实际上到初七、八拜年的就很少了，俗语“拜年拜到初七八，又没馍馍又没汤”，说明过去人民生活比较贫困。三十年代，聊城书法家顾绍年，在《聊城纪俗诗》中对拜年做过这样的描述：“拜年来去意兴浓，处处喧闹爆竹声，一壶春醪独酌罢，驼颜又现少年红。”

初四一夕定去留。是说商号店铺中掌柜的（经理）要明确对雇员的留用或辞退。即商号店铺中雇用的职员叫“夥计”，这一天掌柜的要向这些伙计们说话。其方式是：一是全部留用。晚上把大家招集在一起，掌柜的和颜悦色地告诉大家，过去一年都出力不少，全班人马一个不动，希望诸位继续努力，将来生意兴隆，“肉肥汤也肥”。二是全部辞退。掌柜的当众说，本店股东方面重新调整，另外规划，暂请各位都回家休息，实在不得已。今后如能复业，定当优先聘用。这叫“一鞭赶”。再是有留用的，也有辞退的，那就用“个别谈话”方式。掌柜的坐到自己屋里，伙计们都呆在外面等候传呼。每进一个，掌柜都亲自递烟斟茶，相当客气。对想留的人，既称赞长处，同时也把你易犯的毛病规训一番，一一指出一年中的错处，应引以为戒。最后表示你仍可安心供职，绝不亏待等等。如是决意解雇的，进屋后，掌柜更是格外热情，敬烟敬茶，一味夸奖，绝口不提有什么过错。继而话锋一转，说到本店生意清淡，开支过多，只好请你回家住几天。这样几句话就算把你解

雇了。

至于对确有本领，又脾气倔强，事事不服差遣的人，掌柜的往往还有一手“真留假辞”的把戏。逼其听从驱使。这晚，指明叫他“另谋高就”，但又暗中托人出头打圆盘。一面陈述某某精明能干，是柜上得力助手，应取其所长；一面提出他的这些缺点，应慢慢改正才是。尽管如此，也确有个别人性格桀骜不驯，恃才傲岸，一经被面辞，便执意不吃回头饭，抱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想法，拒绝雇用，事情就不能勉强了。但多数人考虑到掌柜大权在握，自己受雇于人，家无恒产，数口嗷嗷。为了养家糊口，只得委曲求全。况又已经有人从中劝说，也就向掌柜认错，这时掌柜则顺水推舟，收回成命，表示允许继续留用。

破 五

正月初五称“破五”。意为在过年的几天中，有很多的禁忌，到了初五，年算是过去了，一切禁忌的事情也就破除了。

据东方朔《占书》：“正月初一为鸡，二日为犬，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羊，八日为谷”所言，人们往往以初五这天的天气阴晴来判断当年大牲畜牛的吉凶情况，说这一天如果晴空万里则耕年兴旺。因为人们对牛十分爱惜，又加一头牛就相当农民的半个家产，故人们都希望正月初五这天是个好晴天，盼望耕牛兴旺。

初五，也叫“五路日”，说财神从除夕回殿，五路财神今日驾临。商号店铺在这一天要再拜一次财神。香烛供品中且不能缺少活鲤鱼，因“鲤”与“利”谐音，称为“元宝鱼”，摆好供品，燃放鞭炮，掌柜率领全店的人，一齐磕头。除夕结帐后，本店

的帐簿和算盘放在财神位前，这时也就启封应用或更换新帐，并把店里的货物及应用器具，收拾干净整理齐备。有的就在初五这天已经作出了批发交易，称为“开红盘”。正月初六凌晨，三街六巷的商业店铺放鞭炮、卸门板、悬招牌，正式开张。

人 日

根据东方朔《占书》记载，正月初七日为人日，唐代称为“人胜节”，民间多习称“人七日”或“人情日”。人们常以此日的天气阴晴来推断本年是否人丁兴旺和身体健康。过去一般还要吃用各种野菜做的小豆腐，据说此风俗来源于南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一书。

民间流传有这样几句话，叫做“猪五、羊六、七谷、八麦……”，意思是说这几天如果天气晴朗，不但主收猪羊而且五谷丰登。

登高日

登高日，即正月初八。这天，家家户户要吃年（花）糕，取“糕”之谐音为“高”。故有“八登高”之说，意在盼望步步登高。传说“登高日”为明朝万历年间民间所定。此俗于今仍十分盛行。

元宵节

元宵节，即正月十五。也叫上元节，灯节，是由于这天家家户户都吃元宵而得名。

元宵节的来历，据司马迁的《史记》说：“汉家以望日祀太一，从昏时到明。”如果是这样，元宵节应当至晚始于西汉。

元宵又叫“汤圆”，带有团圆的寓意和象征，且美味可口，因而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乐于品尝。元宵节前，各家点心铺子，都要制出元宵应市。聊城城关的几家著名食物店，如毓兴和、义源成、恭和祥、兰香斋等，每年元宵的销量数字都是十分惊人的。

每逢元宵佳节，聊城三街六市灯火通明，家家户户红烛高烧。东关五里长街，商号店铺，无不铺面敞开，货物纷到，各式各样的花灯挂在门外，竞奇斗巧，供人观赏。城里以光岳楼为中心，四面的各个十字街口，都扎灯棚。灯棚的造型、制作工艺、彩绘风格各异。城外的山陕会馆，苏州、江西、武林会馆，以及静业禅林、隆兴寺等几处寺院，大殿内外，佛座前，楼阁亭榭处，无不遍悬灯采，香烟萦绕。聊城名秀才李琴轩著《东昌旧话》中，有咏当时元宵绝句：“灯火璀璨耀满城，管弦鼓乐到处同，可喜元宵明月夜，多少儿女逛花灯。”

元宵节看花灯，自然少不了猜灯谜。灯谜是把谜语用字条写出，贴到门外悬挂的灯上，让人来猜。设灯谜的多是店铺商号，有的还专门延请几位老秀才莅临，代为制作，即景生情信手拈来，均成妙语。灯谜内容典雅，包罗万象，诗文词典，花鸟虫雨，无所不有。谁猜中即得奖品，虽不外是毛笔、手绢、香皂和糕点之类，但灯谜千变万化，幽默风趣，颇能引人入胜。

解放后，聊城不仅每年的元宵节仍举办大型元宵灯会，而且由民间自发组成的龙灯、狮子、秧歌、花船等到节日也进入高潮。

舞龙，俗称玩龙灯。宋人吴牧《梦粱录》载：“元宵之夜，草缚成龙，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之状”，即指此而言。龙灯是以竹竿、竹篾、铁丝扎为骨架，外用

纱绢裱糊，漆以油彩。龙头高一米有余，突睛怒目，巨口锐身，双角高耸、浓髯纷垂，体长五丈，可内染百只蜡烛，旋转倾侧，不斜不灭。从前，聊城城内潘家和东关邓家扎制龙灯最为有名，不少邻县镇人春节之前都来找他们定做：整个龙灯需要十多个人持以舞动，要求节奏一致，配合默契，另有一个擎着扎制的明珠引逗，在紧张的锣鼓声中，巨龙叱咤风云，左右翻卷，昂首奋飞，姿态变化万千，而且速度极快，幅度极大，一气呵成，热烈奔放。还有“打折”、“退皮”及“龙打滚”等精采表演。有时数条巨龙汇聚一处演出群龙戏珠，那场面更是火爆热烈，真有翻江倒海雷霆万钧之势。邑秀才王子磐作“聊摄竹枝词”中，有一首赞叹当时盛况说：“艳说龙灯属两胡，龙蟠九节跃云窟，惊涛骇浪锣鼓震，万炬火树抢滚珠。”（两胡，指城大、小胡庄，历年以舞龙灯擅胜。）

元宵节前两天，是城乡各龙灯会请龙取水的日子。在东关前菜市街华佗庙外有一口井，叫做龙泉，每年这时节，敲锣打鼓，鞭炮雷鸣，一条条巨龙扬鬃舞爪而来，到井边绕行一周，把龙头往井里一探一伸，即而昂道呼啸而去。此来彼去，络绎不绝。取水后，还要祭龙，把龙身舒直，在龙头前设下几案，燃烛列供，玩龙灯的人员一一行礼叩拜。这样，巨龙才可腾飞九霄，神力充沛。这一年也一定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舞狮，也叫玩狮子，也是元宵佳节的一种庆典活动。狮子是雄健的力量的象征，人们希望以它威武、勇猛的形象，驱魅震邪，带来和平安静的好日子。

聊城一带的狮子，多为龙湾村一郭姓工匠制作，他有一套世代相传的专门技艺，以此为业。狮子的外貌和真狮相似，头部庞大狰狞，怒目闪眄，猛厉可畏。血盆大口，可张可闭，狮

身披满深绿色或金黄色的氎氎绒毛。项间挂一串铜铃摇摆得响声震耳。舞狮，由两个人披覆狮身，一人执头，一人做尾，后边的人跟着狮头动向，亦步亦趋，节奏协调，行动迅捷。另有一人武士打扮，身穿密纽扣的唐装灯笼裤衫，红绦束腰，青帕裹头足登快靴，手拿绣球，在狮前开拳踢打，诱挑，引得狮子性情急躁，张牙舞爪，随着鼓点的快慢轻重，忽而翘首奔腾，忽而低头回顾，忽而卧地匍伏，忽而摆尾摇头，并作舐毛，擦脚搔头、洗耳、朝拜、翻滚、扑跃等花样，千姿百态，妙趣横生。节目有上楼台，过天桥、跨三山、出洞下山、滚球吐球，配合京鼓、京钹、京锣的拍节，狮子形态逼真，维妙维肖。还有“老狮产小狮”、“大刀劈狮子”等特别节目，动作惊险，惊心动魄，表演者需要有精湛的武功和技艺才行。民国初，聊城出了几位舞狮高手，如东关菜市街的逮永江等人，技艺高超，名噪一时。聊城武林名家王幼宽，年轻时也多次率同习武弟子参加舞狮表演，至今还为人称道。

踩高跷，也是民间传统项目之一。俗叫“拐子”。是用两根长约一米多的方棱形木棍缚在双腿，脚蹬处有踏板，人立其上如履平路，能疾行如飞，也能徐步踟蹰。还可双腿分劈抵地，作八字形，不用人搀扶，倏而立起，这叫“劈杈”，当然，需身段灵活，经过充分练习才成。高跷队要有二、三十人组成，装扮成不同角色，如渔翁、农村姑娘、少年相公、员外、僧道、老太婆、闺秀小姐、戏剧中青蛇白蛇，西游记人物和八仙人物等，均浓装淡抹，衣饰鲜艳。有的还拿着纸扇、雨伞、渔棹、鼓板、宝剑、拂法、蝴蝶之类，踏着快速的节拍，在广场中往返穿花行走，动作滑稽，扮相可笑，不时唱出令人了噱的曲调，在唢呐锣鼓的伴奏下，颇能增添节日狂欢的气氛。

秧歌，是元宵节的一种娱乐活动。全队有二、三十人分别扮做公子、村姑、憨小、绅士、老翁等，绕成一个大圆圈子，一面唱，一面循环走动，不快不慢稳步而行、嬉笑挑逗，各尽其态。曲调有“岳大夫”，“跨四川”，唱词即情即景，临时拈来，轮流领唱，彼此唱和，幽默风趣，活泼生动，以城东土城、刘营等村的秧歌倍受欢迎。

花船，是用木架、竹竿、扎成船形，船有幔帐、绣帘、铺陈华丽，一少妇，粉靥艳装，笑容可掬，盘屈双腿坐于船头，两只金莲纤小如菱。船身飘浮于波涛之上，一船夫扎围裙，戴竹笠，两手持篙作拨水状。舫而顺风而行，即快又稳，忽而风浪大作，船身颠波，左右倾斜，那扮作少妇的人一直静坐船头，唱着船家女俚曲，莺声燕语，歌喉甜润。不要看她流目弄姿，十分写意，其实两腿在下边奔走，一刻不停。

此外，还有“推车”、“抬杠官”、“耍云彩”、“竹马”、“花鼓”、“月明和尚度柳翠”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民间玩艺杂耍，都在元宵节夜晚一起出动，各显神通，引得欢声笑语，万人空巷。过了正月十六，有时或许延长一两天，各路玩艺也就偃旗息鼓，存起器具，以待来年。

走百病

正月十六日，为传统风俗活动“走百病”日，据说，此风俗源于明朝永乐年间，即“正月十六不走动，闺女妇女定得病。”人们一般在正月十六日晨，太阳未出之前，男女老少如有什么毛病，就到村外人迹罕至处游一趟，这一走动，病就会好，叫做“走百病”。

正月十六日，一般嫁出的女要走一趟娘家，也有娘家人来

接闺女的。如果公婆在堂，儿媳当天就回夫家才好，如若路远，或是贪恋爹娘姐弟们不忍遽别，那么，就须住到正月二十再走。俗谚“七不走，八不挪，九走死婆婆。”虽不见得应验，但谁也不愿犯忌讳，而惹公婆不高兴。

正月十六日晚，还有走桥摸钉的风俗。聊城的四座城门上钉有馍馍大小的门钉，黄灿灿亮晶晶，十分威武庄严。天黑后，妇女们约会左邻右舍的姑姨姊妹们，说说笑笑联臂结队地过吊桥到城门，把粗如杵头的巨钉抚摩一下，说是可以“除百病”，一岁平安。这就是俗语所谓的“走桥摸钉，百病不生。”不过，必须到正城门去摸，扭头门是不算数的。另外，在东城门的扭头门外，靠城墙根下，栽着一段石头，高三尺，粗如木柱，形状颇不雅，人们俗称“僚子”。据说，如果妇女不孕，正月十六日夜间，来摸一下僚子，必然得子。因而这一晚，确有不少妇女满怀希望来此抚摩。也不打灯笼，互不交言，羞羞答答而来，摸后，又匆匆而去。直到1932年前后，瓮城拆除，这半截石柱也随之失踪。

正月十六日，也是落灯节。这天早晨，在祖宗神轴前，上供焚香叩拜后，就将神轴、牌位和一切过年陈设的东西，都统统撤掉，算是年已过了。

二月二

二月二，称“中和节”，传说是太阳真君的生辰。这一天的凌晨，待红日露头，人们要焚上香案和供品，向太阳叩头祭拜。虔敬的善男信女，还要到东关外玉皇阁太阳真君神像前烧香膜拜。玉皇阁的道士也修醮诵经，香烛燎绕，钟钹轰鸡。行好的人这日忌腥荤葱蒜，叫做吃太阳斋。到了晚上，燃着上

供点剩下的白蜡烛，用它遍照住宅的墙壁，说是太阳真君的烛光，能够射杀就要惊蛰的毒虫。有“二月二照房梁，蝎子蜈蚣无处藏”的谚语流传于民间。

二月二，兴吃炒“蝎子肚儿”。是把黄豆用盐水渍晾干，放到盛沙土的锅里，炒到微黄不焦后，随用香油或猪板油轻轻地搓一下，吃时香脆可口。这天，差不多家家都炒，不仅大人孩子都喜欢吃，并互相赠送。吃蝎子肚何时兴起，尚不可考，传说黄豆粒象征蝎子的毒尾，在它将要蠢动之前，就把它吞噬消灭，以免受其害。又一说，二月二也是土地爷的生日，炒豆是向他上供的。

二月二，传说是龙抬头的日子，民谣有“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囤流。”有的龙灯会在这天还要整队出发，敲锣打鼓，在街上巡回、舞跃一番。在春暖冰消，农事将忙之际，人们寄托了对龙的信赖，盼望它能及时地腾水降雨，赐于一个丰收的年景。同时，也希望龙抬头能震慑所有与人为害的毒物，使他们畏惧退避不敢肆虐。

这天吃的饭食，还要加上一个龙名，吃水饺叫龙耳，烙饼叫吃龙鳞，下面条叫吃龙须。这并不是对龙的贬意，而是表示和龙结为一体，生活与共。闺女妇女要停止针线，恐伤龙目。

这天，家家还要打囤。是用锅底下的柴草灰，在家内、院中、打谷场上都洒成一个个圆圈，院中和场上的囤中撒上五谷，室内的放上几枚铜钱，象征“钱满囤、谷满仓。”待太阳出来时，放出饲养的鸡，把院内、场上的五啄食掉，叫做“收”了。打囤予兆这一年庄稼丰收年景大有。

清明节

清明节,按照二十四节气计算,冬至后第 105 天即为寒食(因为从前这天禁火,全吃冷食,故称“寒食”)。寒食的第二天即清明节。

寒食,也称“禁(烟)火节”。传说是为了纪念春秋战国时期晋文公的贤臣介子推的。二千六百多年前,介子推为了逃避封赏,躲进山林被火烧死,故晋文公下令修火禁。其实周代就有了仲春禁火的记载;又因介子推是山西人,所以禁火、冷食首先在山西流行。后来三国时期的曹操看到山西人寒食前后断火一个月,人们多生疾病,曾下令废除晋文公的禁火令,只许寒食一天吃冷食。寒食和清明本来是两个日子,但人们大都把这两个日子合为一个,一般叫“清明节”,农村则称“寒食”,但过节的时间都是在清明这天。

春分后十五天为清明,即每年 4 月 5 日前后太阳到达黄经 15° 时开始。《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三月节……物至此时,皆以节齐而清明矣。”《岁时百问》曰:“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关于清明的记载最早见于《淮南子·天文训》:“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为清明。”清明节。时逢阳春三月,风和日丽、春光明媚,草木萌动,桃红柳绿,大地一派勃勃生机。

清明这天,家家都去折柳枝。这时的柳枝已舒苞吐芽,青翠可爱。折来后,插在门上,床上,院子里。妇女们也要掐一小枝插在发际。孩子们更把柳枝编成圆圈,戴在头上,甚至给狗脖子上也套个柳圈儿。俗谚说,清明不带柳,红颜成皓首。据说,民间插柳之俗始于唐代,认为顺阳气,迎吉祥,避邪

崇，又有勸勉人们珍惜光明之意。也有的说，是在为介子推招魂，向他表示崇敬。清明节日，插柳点缀，在农村中，至今仍盛行。

清明节，无论城市和乡村，都有上坟的风俗。人们带着铁锹、烧纸、香烛祭供等，到自己的祖茔林地，先在每座坟上添上茱萸，接着焚纸燃香、叩拜。每座墓顶部压上烧纸，叫压坟头纸，这表示子孙曾来上坟。

清明节，聊城也有踏青的习惯。一般约知友若干，到郊外近处漫步城堤，看看株株杨柳粼粼湖波。郊野麦苗青青，大地锦绣。园林阡陌，绿荫匝地，一片秀野曙光尽收眼底，大有舒畅胸襟之感。学生们也喜欢在清明节作近郊旅行。他们集体出动，到河边、果园等处，在林木深处，席地围坐，共进野餐。游目骋怀，别有风味。

清明节后，聊城人有放风筝的习俗。据说，我国最早的风筝是春秋时代的鲁班发明的。当时他是用木片和竹片制成一种鹊状物，故有“削竹为鹊，成而飞之”之说。《询刍录》称：五代时期的李邕，曾在宫中以线放纸鸢作游戏。因在鸢头上扎上竹管，当纸鸢随风飘荡时，风吹入竹管，发出的的筝声，即“风筝”一名之由来。到了宋、明、清，民间放风筝已相当盛行。古人认为：如在风筝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放上天时剪断牵线，任其随风飘去，可以消除一年中的灾难。尤其在清明上坟扫墓后放风筝，更有托庇祖荫消灾除难的寓意。实际上，放风筝很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宋代《继博物志》中说“春日放鸢，引线而上，令小儿张口而视，可以泄内热”；清代《燕京岁时记》中也称：“儿童放鸢于空中，最能清目。”总之，放风筝不仅可以活动全身的筋脉关节，促进血液循环，而且还能提神醒脑。

清明节,有城隍神出巡之说。在聊城城里有两座城隍庙,即府城隍庙和县城隍庙,尤其府城隍庙规模宏阔,建筑巍峨。府城隍每年有三次出巡,分别在清明节、中元节(七月十五)、和十月初一。

城隍神是一尊木雕神像,穿着刺绣蟒袍,纱帽缎匹,白面长髯,仪表轩昂,令人凛然不敢正视。出巡之日,他端坐在八人晾轿,前呼后拥,人群鼎沸,出东城门,沿东关大街,过运河通济桥折北,到北关玄帝庙抬进大殿。略事休息即由北门进城返回城隍庙。城隍出巡,人们看作是一桩极热闹的盛会。出巡行列前有鼓乐笙箫,唢呐锣鼓吹吹打打,高跷队边唱边舞。金瓜、钺斧、官衙牌、肃静牌、香幡彩亭,全幅仪仗长达半里。神轿前后左右,侍从簇拥,四个垂髫童儿,各执一只长索垂系的香炉,烧着檀木,阵阵馥郁的空气飘荡空际,弥增神秘。人们对这尊“威灵公府城隍之神”有肃然敬畏之感。紧随出巡队伍出动的还有因病酬愿的人,他们扮做神的扈从,饰为鬼卒皂隶,执刀持棍,拥护着轿子。也有项荷木枷充做犯人的,也有孩子脖颈带着纸制的薄枷,由大人抱着,挤挤跄跄随队行走。看热闹的人更是挤满大街小巷。大队行过,人声鼎沸,锣鼓震天,热闹非凡。民国后,年愈消沉,1938年拉倒城隍神,出巡就此停止。

谷雨节

谷雨节。清明后十五天，斗指辰，为谷雨。这时日行黄经30度，天气暖和，麦苗生长和麦耕春种都迫切需要雨水。时雨普降，对作物、树木十分有利，故所谓“谷雨”。谷雨即有“雨利百谷”之意。农村多于此时种麻，有“清明忙耘麦，谷雨种大田”之谚语。

谷雨节，有“谷雨禁蝎”的风俗。这一天，人们或写或画禁一种蝎符，张贴墙壁之上，以驱除蛇蝎之类的毒虫。禁蝎符，过去一般用朱砂于黄表纸上写到：“太上老君如律令，谷雨三月中，蛇蝎永不生。”有的画剪刀或针，图案上剪刀剪着蝎子，钢针扎着蝎子，还有的先在纸上画一蝎子，然后写“神针”二字，针字的一竖，正好写在蝎画的肚子上，状如针刺，书画一体。据说这样可以把蝎子扎（刺）死，显示出人们对蛇蝎等毒虫的恨之入骨心情。

端午节

端午节，即农历五月初五，又叫重午节，端阳节。端午节的由来已久，并说法很多，有的说是晋文公为纪念割股救他的介子绥《琴操》，而《大戴礼》则说“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后汉书·礼仪志》有：“五月五日，朱索五色柳桃印为门户饰，以止恶气。”《风俗通》也有“五月五日，以五采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亦因屈原。”《续齐谐记》则说是为纪念战国时期的伟大诗人屈原而定。

吃粽子，是端午节的风俗之一。《续齐谐记》载，屈原投江后，楚人哀悼他，便于每年端午以竹筒贮米投入水中祭吊。到

汉代建武年间，长沙人欧回有一天见到一人，自称三闾大夫屈原，对欧回说：“你们每年祭我的竹米很好，可惜我吃不到，都被蛟龙吞了。以后可祭品用艾叶塞着筒口，再用五色丝线捆牢。因为蛟龙最怕这两种东西。”此后，人们就用艾叶裹黍米做成角黍，因其尖角像棕榈叶心状，故名粽子（与粽谐音）。

端五节，民间有给儿童在手脖、脚脖和手指上缠上五色线和男孩带用土项链的风俗。五色线，也叫长命锁、拴命线，即从缠上之日起，一直带到节后第一次下雨为止。土项链，一般为麦秸杆做成，并只给七岁以下的男孩配带，也称作“带符”，因为有“端午节不带符，死了变成小牛犊。”之说。

雨 节

雨节，即五月二十三日。传说是黄帝的诞辰，也是关老爷磨刀的日子。据说，这一天关老爷单刀赴会，临行前要磨刀，磨刀就要用水，所以要下雨；空中有雷声，乃是关公的霍霍磨刀声。据史料记载，在五月二十三日这天下雨年份高达90%以上，所以民谣中有“大旱不过五月二十三”之说。

晒龙袍

晒龙袍，即六月初六日，由宋代沿袭至今。这天人们都要把衣服、书籍拿出来晒一晒。据说，这一天晒过的东西整个夏天不生虫。

当年山陕会馆和城隍庙中都有神的鸾驾，这一天也都要把旗锣伞扇金瓜钺斧等仪仗件件摆出，洗拭晾晒，或整旧易新。各处寺院从六月初一起举行“晾经会”，如龙湾静业禅林、城南权觉寺、白马寺、青龙寺，城东的洪福寺、隆兴寺，都由寺

中方丈主持仪式，焚香膜拜，把庙藏佛经宝卷搬出晾晒。

夏 至

夏至，即芒种后的第十五天为夏至。这时日行黄径 60 度，日影长至终极，是一年之中白日最长的一天。

夏至，聊城人则有喝绿豆面豉的习惯，即先把绿豆下锅煮熟，然后再下上面叶，煮熟混合食之。因绿豆有消毒、解热拔凉、提神之功能，故人们爱喝绿豆面叶。以后若干天内，人们多在中午喝绿豆汤。

伏 日

伏日，夏至后第三个庚日为初伏，第四个庚日为中伏，立秋后第一个庚日为末伏，总称伏日。关于伏日的历史，据《史记·秦本纪》所述：在秦德公 2 年（公元前 676 年），因夏季很热，常用狗来禳解热毒，以后便把要解毒热的酷热日子称为“伏日”。之所以要杀狗，即人们多认为取狗血涂在四门可阻止鬼物进入城内，“伏”字为人旁有犬，表示犬能保护主人，即伏之原意。伏日为秦德公所制定，汉代以法令的形式规定伏日为夏节，停止办公。伏日是一年之中最炎热的时候，聊城有吃生黄瓜和煮鸡蛋来治热防暑的习俗。入伏这天的中午，多数人家喝凉面条。并民间还有给耕牛改善饮食的习惯，即煮些绿豆麦仁汤给牛喝。入伏后是种秋菜的季节，有“头伏萝卜二伏芥，三伏种白菜”的谚语。

立 秋

立秋，即大暑后第十五天，斗指西南维为立秋。此时日行

黄经 135 度。立秋标志着秋天的开始,据说届时必有若干片秋叶凋落,以报秋至。

立秋后尚在末伏,天气虽然仍十分炎热,但民间则禁忌再到河里或坑塘里洗澡,以免拉肚子;妇女们从立秋之日起也不再回到河里或坑塘里去洗衣服,说是立秋后的河水不下泥。衣物洗不干净。立秋后也不再让孩子吃甜瓜,说是立秋后的甜瓜心里凉,吃了易拉肚子。

七 夕

七夕,即农历的七月初七之夜。是传说中天上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汉代《淮南子》一书中有“鸟鹊填河渡织女”的记载,《风俗通》一书中也有“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之说。

七月七日,也是下雨的日子。相传牛郎织女相会时,总免不了抱头痛哭一场,各诉苦衷。于是,便有“天上双星哭,地下飘泼雨”之说,老百姓多称此雨为“相思泪”或“相思雨”。农民根据多年的观察,发现每年七月七日雨后,天空就出现彩虹,他们便把这种彩虹称作鹊桥。

鉴于织女婚姻上的不幸遭遇,为了保护女儿女婿的幸福生活,七夕这天习俗,父母对新出嫁的闺女,都要接回娘家。

妇女在这天穿针引线,称“乞巧”。乞巧就是向织女求智巧。古时,每逢七夕,妇女们乞巧活动,大致分为两种:“一是‘卜巧’,即卜问自己将来是笨是巧,能巧到什么程度。据《开元天宝遗事》讲,唐玄宗与妃子每逢七夕在清华宫夜宴时,宫女各将小蜘蛛放在盒中,看第二天是否结网,以结网疏密与圆正来卜得巧。若结网密或圆正,是得巧。另一种是泡巧,在农

历六月，就用井水浸豌豆或绿豆闭之不见天日，几天换一次水。到七夕。苗高近尺，亭亭可爱，就用红纸条束苗腰和清盆水一同放在庭院里。礼拜双星后，妇女各用手拗苗端数分抛浮水面，经过轻寒夜露，水面结成薄膜，第二天日出前，如水底反映的苗影细长，形如针，就是织女已把智慧赐予了，粗短就没有得巧。

七夕，大城市戏院都要上演戏剧“天河配”。民国初，聊城没有剧院，七夕之夜，常见老翁盲女持三弦携大鼓，串街游巷随地做场，弹唱牛郎织女银河欢聚，以点缀节日。

中元节

中元节，即农历七月十五日，也称“盂兰盆节”，俗称“鬼节”。这一天，是上坟祭扫的日子。有的人家还用纸剪成衣服和冥镪之类，焚在坟前，说是为亡人送寒衣。

中元节，兴放荷灯，用色纸制作成荷花瓣形，中心置灯，夜间放入河中，越多越好看。它随波荡漾，灯光水影，别有一番风趣。这是佛教中的超度幽冥，与诵经斋醮同一意义。

一年的中元节，府城隍庙僧道用竹木和各彩纸，扎制了一只长三丈的法船，上边佛像神祇墙桅蓬帆具全。由一只真船载着，锣鼓齐奏，和尚道士高声诵经，并向河中焚化冥镪，说是超度水里的孤魂。在护城河中巡行一周，划至北城外焚化。

龙湾“静业禅寺”是邑中古刹之一。中元节晚上，在寺外高扎治台放焰口。由八个和尚，各披袈裟执乐器，吹弹歌唱，宣扬佛号，直唱诵到夜静人散才休，这就叫“盂兰盆会”。也是为超度幽冥亡魂的。寺里僧人集体放焰口外，还扎制了不少“莲花灯”，贮油点燃，放入运河顺流而去。

中秋节

中秋节，即农历八月十五，亦称“仲秋节”。古人以仲春二月十五日为“花朝”，为与之相对应，称仲秋八月十五为“月夕”。中秋赏月始于唐代，到宋代太祖年间始称为中秋节，以观月宴饮为盛事。明清时，节日内容大增，陈瓜果、设月饼，布宴中庭以祭月，亲龙馈赠必有月饼。又因一般家庭都希望在这个节日里人月同圆，所以也称“团圆节”。此日晚，皓月当空，碧天如洗，处处宾朋宴饮，家家老幼欢呼，岁岁赏月，年年不停。至今，中秋仍是人们普遍欢度的重大节日，堪称“中秋佳节”。

重阳节

重阳节，即农历九月九日。重阳之称，早于战国时期，屈原《远游》中就有“集重阳入帝宫兮”之说。魏文帝在《九日与钟繇书》中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故称为重阳，又称为重九。汉代九月九日有饮菊花酒的习惯，历代相沿袭，故也称此日为“菊花节”。

重阳节也称“女儿节”，嫁出的女儿要从婆家接回来团聚一日，来去两亲家互赠花糕。

九月不兴糊窗户，恐怕触犯“九女星”，而连生九个女孩。

九月九日，聊城多有庙会。东关华佗庙有香火会两天。传说这天是华佗老爷的生辰，虽不唱戏，却热闹异常。四邻八乡的妇女，在头一天就来到了，有的住亲戚家，有的就住华佗庙大殿，大家挤挤挨挨席地而坐，一夜中诵经号佛喧嚣通宵。这些妇女以老嫗为多，皆来自农村，有的远至七八十里路程，

结伴而行，是来进香行好，还愿祈福。庙会人群拥挤，搭棚设摊纷然杂陈，各行买卖俱全。

寒衣节

寒衣节，即农历十月初一。民间俗语叫做“开鬼门”。阴曹地府的鬼魂这天各到自己的坟堂去收取亲人送的寒衣和钱财。东昌府城隍为了察看民间善恶和镇邪魔怪道，也要出巡一次。有首竹枝词写道：“十月城隍又出巡，旌旗蔽日少风尘，可怜多少如花女，爱作披枷带锁人。”

十月初一，聊城“红卺字会”和慈善性质组织“公仁堂”，每年自此日开始，即进行施舍棉衣和开粥场放饭。红卺字会设在城内北水口西路北，和“道院”同处一院。公仁堂在城内西南隅。施舍的棉衣是予先从外地集镇零摊或当铺里以贱价购买的，多些旧棉袄棉裤。施舍机关先在城关各街巷做调查，对生活困苦无助的穷人，记下姓名，逐一发放。棉衣上印有“施舍棉衣不准当卖”的字样。

粥场是在一个固定而宽敞的地方，搭上凉棚，支两口大锅，每天早晨熬上一锅小米稀饭，去打饭的人，都予先领取“飞子”，凭飞子挨号打饭，每人一大勺，叫做放饭。前来领饭的人，乞丐占多数，生活贫苦的鳏寡孤独者也不少。

施舍棉衣和放饭的经济来源，是由慈善机关向各界劝募捐款，集腋成裘，承办者多为地方上绅缙之流。抗日战争爆发后，此类机关停止活动。

民国初年，在聊城经商的山陕字号茶庄德生庆，对里巷中死无棺殓的穷人或乞丐施舍薄。

冬至

冬至，即大雪后第十五天，斗指子，谓之冬至。此时日行黄经 270 度，北半球的白天最短，夜最长。此后，白昼日渐长，直到来年的夏至。过了冬至，已是数九寒天。数九是从冬至这一天算起，每九天为一“九”直到来年惊蛰后的第六天，共九“九”八十一天，正是阳历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到次年的三月十二日。

古代对冬至节很重视，有庆贺的习惯。《汉书》说：“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这一天，家家都要吃扁食（水饺）。据说吃了扁食可以不冻耳朵。

腊八节

腊八节，即农历十二月初八。晋代以后，把夏历的十二月，定为腊月。为何称“腊月”，据《说文解字》注：“腊，合也，合祭诸神者。”《玉炖宝典》说：“腊者祭先祖，腊者报百神，同日异祭也。”可见腊是古代人们祭祀百神及祖先的一种活动。十二月为腊月。故十二月八日称为腊八。传说佛祖释迦牟尼于这天得道成佛。故各寺院僧众，在每年腊月八日的前一天都取清新谷果，涤净器皿，天明即熬成熟粥，以供佛祖并诵经喧法，并一起喝腊八粥。后来民间也都做腊八粥，据说不仅喝了腊八粥能增福，而且也含有喜庆丰收和予祝来年五谷丰登之意。

聊城煮腊八粥，一般只用小米、黄米、赤小豆、大红枣等。熬成不稀不稠的粘粥，于凌晨佛晓，一家老幼一人一碗，这叫过腊八。腊八粥中必有赤小豆。赤小豆也简称赤豆，有消毒

消炎功能,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₁、磷、钙、铁和蛋白质等,多吃可防治脚气病,并对产妇有催乳、通乳作用。

施舍腊八粥在聊城十分流行。各寺院,如城关的静业禅林、铁塔寺;东乡和南乡的王官寺、青龙寺、白马寺、洪福寺;西乡和北乡的阎觉寺、高佛寺、弥陀寺等,都大锅熬粥,凌晨放在庙门外,另备碗筷,过路行人都可以喝。清晨,寒风凛冽,喝碗又热又甜的腊八粥,顿感遍体生暖。熬腊八粥寺外以饷路人,已形成惯例,年年必办。日伪时代各寺多被毁坏,僧众都饿跑了,从此,腊八粥也就没人施舍了。

祀灶日

祀灶日,即腊月二十三日。这天的主要活动是入夜祀灶,送灶神上天言事,也称“送灶”、“发灶”、“辞灶”。民间传说,灶王爷是玉皇大帝派到人间监视善恶的神,人们将其尊称为“灶君”、“灶王”或“灶王爷”。他于每年这天,便上天向玉皇大帝回报一次。为此,家家为它设祭饯行,谓之祀灶。祭祀时,先摆上糖果和一碗水饺,然后烧一柱香再叩头,把旧灶神连同两边那幅“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的对联一同揭下烧掉,就算是送灶王爷上天了。在烧灶王的旧像时,一家中的老年人还念念有词:“灶王灶王,你上天堂,多说好,少说歹,五谷杂粮全带来。”在烧灶王像时,同时还要烧一些谷草和杂粮,意思是给灶王喂马。过去,其他地方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说法,聊城则与之相反,祭灶多数是老年妇女。即腊月二十三日晚将旧灶王像送走,待到除夕晚上再贴新灶王像,两边的对联多写“二十三日上天去,正月初一下界来。”表示灶神已回到家中同过新年。

除 夕

除夕，即一年的最后一天，又称年三十。这天，家家户户房舍庭院都要打扫的干干净净，贴上春联、门神和年画，悬挂起祖先神轴牌位。傍晚，在供奉的神座前一一摆上供品，点起香烛。尤其“天地桌”前，祭供品更要丰盛。富裕之家，供上猪头三牲。一家人打着灯笼，向村外祖茔方向的路口焚香烧纸，口中含诵：请祖宗回家过年了。返回路上也念诵不断，直到大门口。请来老祖宗后，阖家向祖先叩头拜岁。晚上，一家老少欢聚一起喝辞岁酒，笑语喧腾，彻夜不眠，谓之守岁。农村除夕之夜在庭院竖杉槁，挂上灯笼，叫做“天灯”。有的还从院子到大门，遍撒芝麻秸，人行其上谓之“踩岁”。三更以后，锣鼓喧阗，全村人到庙里焚香叩拜。

到了子夜时分，就可宣告旧岁已去，新的一年开始了，气氛进入高潮。零点钟声一响，霎时鞭炮齐鸣，灯火辉煌。随即烧纸焚香、祭神祭祖，下扁食首先上供，全家向神位和祖先磕头。吃罢扁食，晚辈再给尊长磕头拜年，长辈给孩子们压岁钱。

城里商号店铺，子夜时都把门板敞开，张灯结彩，谓之“亮门”。十几分钟后又都关闭，停业至正月初六开市。外籍商客在本店拜过财神后，经理们齐集会馆行团拜礼，同乡欢聚一堂，祭神宴会。这晚，山陕会馆中，巨烛高烧，宫灯通明。天不亮戏台上锣鼓就响了，从初一起，连唱三天大戏。

(二)婚 嫁

议 婚

议婚，即由媒人来往于男女双方家长之间，商量缔结婚姻关系。旧时代男女婚配，承袭我国古代的封建礼教，世代相沿要讨媳妇，先要由媒人说合，经双方家长同意，方可定亲。这就是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是没有自主权的，双方既不能会面，也不能探询，只可听天由命。“嫁鸡随鸡飞，嫁狗随狗走。一旦定亲，就再也不能悔婚退婚。

旧时，女子不宜抛头露面，轻出闺门。她的性情才貌，也就难以知晓。因而，腿勤嘴巧消息灵通的媒婆，便牵线搭桥，为男女两家提亲。事成之后，媒人会得到丰厚的酬谢。为了促成婚事，媒婆往往鼓动舌簧锦上添花，各向男女双方夸耀郎才女貌，如何相配，甚至有意隐瞒缺陷，以致酿成家庭悲剧。当然，充任媒人的也有双方的亲友，从中说合以联系两家之好。也有双方家长沾亲带故，是所谓“爱好作亲”，但必须另从亲友中请出两位担任媒红，以便协商安排各种事宜。成婚时，双方都将媒人尊为上宾，待之以隆重礼遇。

两姓结亲，讲究门当户对，即俗语所说：“官配官，员配员，篱笆门子配稿荐”。门不当，户不对，贫富悬殊是难以成婚的。就门第来讲，双方又稍有区别。男方较注重女方品貌，女方则依据男方门第高低、财产多少，彩礼厚薄来选定。至于人品、年龄、学识、技能都在其次。清代和民国年间，早婚较为普遍，男子十二、三岁即娶，大者十五、六岁。女方一般大出七八

岁,甚至十几岁。旧时代的婚姻,除包办外还有买卖的性质,并有童养媳、娃娃亲、指腹为婚的现象存在。贫穷人家定亲,年龄常偏大,因为家境贫寒不容易娶个媳妇,有的年到三十还是光棍。在贫困落后的村庄,有的一家男女与另一家互换成婚,甚至三家、四家轮换成婚。

合 婚

议婚之后,便进行合婚。合婚是把男女的生辰、属相根据所谓的生克之法,来配合一下,看婚缘是不是相配。在《合婚便览》一书中写道:“从来白马怕青牛、羊鼠相合不到头,狡兔难逃苍龙配,鸡狗牵强结冤仇……。”在属相中的马和牛、羊和鼠、兔和龙、鸡和狗、蛇和虎、猪和猴等在地支上称为相害,故而是不能相配成婚的。害即有所伤害。羊和鼠相害即子未相害,主要是与子未各自的冲合有关,如子属水,午属火,子在北,午在南,本为相冲,可是未却去合午,这样,子未自然就互相损害了。另外,还说人有金、木、水、火、土五种不同的命,按五行有相生相克的说法,引伸到人的婚姻上,凡相克的,也在禁忌之数。至于贫家穷户,能说上媳妇就谢天谢地,自然就顾不得这些了。

订 婚

订婚,民间一般称作传柬,传贴。又有传小柬和传大柬之说。过去这种传柬、贴的形式,是双方初步落实婚姻的一种必须形式。

传小柬,一般比较简单,即由男方用梅红纸写好四幅柬,上书几句吉祥语,以“敬求金诺”、“恭候金诺”一类言词表示求

亲,由家长署款自称“求婚人”,并带点简微礼品送往女方。女方收到后,即回允贴,写明“谨遵台命”或“仰遵玉言”等,表示同意结亲,回柬称“允媒人”。这样互换小柬就算定亲了。

传大柬,即在传小柬之后进行。大柬贴为木版镌刻印制,有洒金的龙凤图案和双喜字,也称龙凤贴,大幅四折,外加装潢美观的封套。男方随同大柬(龙贴),还有馈送女方的八色厚礼和金银首饰、双葱(意为双方聪慧)双艾(夫妻恩爱)。女方留下柬贴,再书写同式大柬(凤贴),并回敬男方文房四宝和书籍(多为一部诗经或词源之类)。传大柬比较隆重,写书大柬的词句也比较繁琐。传了大柬就算正式缔婚,为社会所公认。传大柬这天,男方要预备丰盛的酒宴,款待双方的传柬人。

继传小柬、大柬之后,即双方缔结了婚约。接着男方便向女方“索要生辰”,以便根据女方的生辰八字及属相来选择嫁娶吉期,确定梳妆,上轿的方向、禁忌等。然后,写好生辰贴,送与女方商定,称做“请期”。结婚日期男方在生辰贴中都已写明,女方一般很少更动。至于结婚的月份,因嫁女属相而有所不同。如属鸡和兔的占正、七月,属虎和猴的占二、八月等等。结婚须看好日子,日子分黄道、黑道。黄道日子可以结婚,黑道日则不可。结婚这天,凡属相相忌的人,不宜与新娘接触,以避凶趋吉。

娶 亲

娶亲的头一天,男家向女家送食楂。女家收下后,便接着往男家送嫁妆(除衣服、被褥、帐帘、化妆品外,包括木制家具等)。食楂和嫁妆送到后,男家和女家要招待酒宴,并封赏喜

钱。

待到娶亲之日，男方新郎在女家迎娶之前，要向父母、长辈一一磕头，着新装，斜披红绸，由父亲给他插到礼帽上两支金花，插时须跪向祖先座前，意为禀告祖先，这个孩子从此成家娶妻了。这一切仪节完毕，新郎才上轿前往女家迎娶。

成婚当日，新娘在上轿之前，要依从男方送来的“年命贴”指定方向来梳妆。由熟练手巧的妹妹给新娘绞脸，用细柔绒线绞去面额间汗毛。拆开发髻挽成髻。由母亲给女儿“带笛笛”。笛笛是红黑两块圆形布片贴叠一体，竹批作柄。插在髻上，就承认女儿已是人家的人了。从此生活行动，父母也就管不着了。

迎娶之时，要备轿子两乘，去时新郎坐花轿，陪娶人做官轿，都是四人抬轿。花轿也叫喜轿，装饰美丽。在红绿绸段的轿围上，绣有吉祥图案，如百鸟朝凤、富贵花开、丹凤朝阳、百子图等。讲究的再绣上金丝银丝，镶缀钻石，更显得光彩夺目。随轿前导的有伞扇旗牌，灯笼火把，鼓乐唢呐，一路吹吹打打，鞭炮齐鸣。随新郎前去的除陪娶人，有“架毡人”，挟着红毡，照应新郎到女家的种种礼节。另有两名儿童，一抱“喜鸡”，一红色公鸡。一抱“麻姑瓶”，内装少许五谷，红布扎口。到后女家再配母鸡一只，连公鸡一起抱回。麻姑瓶称“宝瓶”，应由新娘在拜堂前以媳妇身份献宝于公婆。此俗多年已废。

到女家所住的村子（或街巷）外，燃放鞭炮。到女家门外，邻舍的孩子们故意紧闭大门，向新郎讨喜钱，由架毡人塞入封好的红钱包。开门后，女家陪新亲人，把新郎让入正房内予先摆好的八仙桌居中座位上，陪亲人和陪娶人分从两边。女家备酒席、挂面、点心招待新郎。双方的陪亲互至寒暄，新郎正

襟端做，更不插言，以示庄重礼貌。门外鼓乐迭奏，意为催妆。两次奏乐催妆之后，新娘冠带整齐，于是新郎告辞，架毡人把新郎斜披红绸由单变双，交叉胸前。新郎离席在女家堂前磕头“谢亲”。新娘坐在椅上，由她的兄弟两人架着椅子送上花轿，这时鼓乐齐鸣，仪仗火把引导接回。有两女僮伴送新娘，还有新娘的弟兄也随轿同至男家，叫做送亲。

花轿归来，沿路有井、有庙、甚至有块石头，架毡人都必须用红毡掩遮，意为避免邪崇侵犯。花轿到家先放鞭炮，并拿火把绕行花轿三遭。有两个女孩掀开新娘轿帘，给新娘点胭脂，挽扶新娘下轿。进大门时酒浇烈火，意为驱逐凶煞。进院后由女僮相搀扶新娘姗姗而行，头一步先跨鞍子，表示平安，又一步“趟糕”，表示步步登高。新郎在前新娘在后，踩着紧接紧换的红麻袋前行，表示传宗接代。这时鼓乐唢呐齐奏，两行火把排列燃烧，由新郎的父亲烧元宝，一对新人到天地桌前拜堂，又称拜天地，行三叩礼成亲。拜堂后同入洞房。新娘端做床上叫做“坐帐”，新郎亲手掀去新娘的蒙头红，这叫“初会”，可以说，从提媒、合婚、传柬、迎娶到这一刻，两人才算见到一面。此时的第一次相识，双方已结为夫妻。然后一对新人并坐床边喝交心酒，即互相传杯换盏的合盏之礼。喝交杯酒后的新郎离开谓之撒帐，这时新郎的平辈或晚辈小伙子开始闹房，对新娘戏谑和捉弄，跟随新娘的伴娘婉言劝阻，闹房一直到夜晚不休。据说，越闹的很，以后人烟越旺。新婚之夜，又兴听房，听新娘新郎作何言语。如没人听，反认为不好，用一把扫帚放在窗下，代表有人听房啦。

结婚喜日，男家悬灯挂彩，大门内外遍贴红联。红联多为“洞房花烛三星照，金榜题名万世昌”以及“良辰巧逢三合日，

典礼正迁吉庆时”等语。宅内搭棚，垒灶，大摆宴席款待亲友。新郎由架毡人引至宴会前“上拜”，铺下红毡，向全体来宾磕头致谢。贺喜的亲友有的送喜帐、暖瓶、枕巾、面盆等，也有现金“贺仪”。喜帐多为红色，上多用四块红方纸写有“天作之合”、“福禄鸳鸯”、“钟鼓乐之”等祝贺用语，悬挂于新房内。贺礼随登记入帐，以日后看帐还礼。另外还有“添箱”，一般视关系深厚和经济条件而定，其物品或现金不等。添箱虽也登帐，但不一定要还，为了照顾是否还得起，有些不成文的规定。当天，女向男家送熟饭，为十大碗，几十张小饼，另外一尾鱼。交厨房师傅加热后，在新房中摆开方桌，杯箸大碗列齐，送饭的请新姑爷用饭。那尾鱼代表媳妇孝敬婆婆。新郎把饼一张张拿起，都咬一口便抛向屋外，挤在门口的孩子们抢回家去，给爷爷奶奶吃了不腰疼的。

回 门

回门，一般是婚后的第三天，也有当日回门的，叫“小三天”，故称为三天回门，俗称接三天。女家下贴接闺女请女婿。新娘新郎双双前往。女家设宴款待，并约亲友相陪。酒宴间每上一样好菜，厨师就向新郎讨厨子礼，由跟来的架毡人赏与红钱包一个。一席终了，红包要付给好几次。新婿端正中，仪态矜持稳重，不可大吃大喝高谈阔论。否则会受到讥笑。以后回门改为结婚的第二天，如今更爽快，当天就完成了。接三天回来，新娘先拜祖先，再拜公婆，然后下厨房做饭做活。婚后的一个月中，逢九天回一次娘家，叫单九双九，须当天转来。满月之后，女家备轿接新娘回去，住一个月再回夫家，叫做住对月。

童养媳

童养媳，俗称团圆媳妇。贫穷人家的成年男子，讨不上老婆，化几个钱买一个穷苦人家的幼女，领到男家生活，待女成年后，举行结婚，叫做圆房。在未行婚礼之前，在男家侍奉公婆，勤苦操劳，往往得不到怜惜。一不顺心，便被打骂侮辱，而且和男人年龄悬殊很大。这是妇女的一种最不幸的遭遇。旧时代这种风气聊城城乡多有存在。

冲喜

冲喜，即已经定了婚的青年男子，结婚前忽患重病，医疗不见功效，缠淹床第病势垂危。商得女方同意，以简单仪式，把媳妇迎娶过门。过门后，在丈夫身边护理。认为经过这喜事一冲，病灾就会被冲跑，病人就会痊愈。其实，这种风俗贻害很大，往往青年女子娶过门不久，男人就死了。更甚者，定亲后男子突然病死，双方家长受封建礼教束缚，认为好马不配双鞍鞵，好女不嫁二夫男，硬逼女儿到夫家，抱她未婚夫的灵牌拜天地。以后，待在夫家孤守空帐，当一辈子寡媳。使年轻少女含辛茹苦，抱恨终生。

服亲

服亲，即遭遇父母之丧，在穿戴丧衣期间成亲。有的地方叫耗亲或荒亲。服亲又简称“服”，多是由于婆婆病故，其父母家里主持中馈无人，且结婚日子已近，一切准备就序，就协议女方服亲。服亲仪式从简，草草成礼而已。拜堂之后就披麻带孝嚎啕哭丧。

清·光绪三十四年，孝钦皇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崩逝，一年之内禁止民间婚嫁。但那时仍然有婚嫁的，不过尽量不铺张，也不能鼓乐，称为大服亲。

抢 亲

抢亲，是双方已经定约，而男方又无力迎娶，不得已采取的举动。男方家中请好一两个妇女，预备新娘抢入门后，搀扶进屋，好言劝慰。再请几个帮忙的健壮男子，准备轿子一乘，在新娘家附近静僻处等候。新娘如单独在家，或是偶然露面时，新郎就跑过去抱起新娘就走，强把她按到轿子里，飞奔回家。到家后搀扶出轿，劝慰一番，给她开脸后和新郎交拜成婚。抢亲时，女方如有人追赶或喊骂，就有男方几个帮忙人出面劝解，道歉，平息争端，说是新郎改日必登门磕头补礼。好在人已经走了，亲家是错不了，女家也只有罢休。至于被抢的姑娘，一般的会认为人生只有一次终身大事，不坐花轿不光彩，但也能体谅婆家手底不宽的甘苦，应为俭省过日子着想，也只有哭诉一番了事。

另有抢寡妇的风俗，于前者不同的是双方事先并没有婚约，但男方知道寡妇有意改嫁，就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抢寡妇多在黑夜进行，并要严加防范，担心半路上再被别人抢夺过去。

招赘婿

招赘婿，过去称为“倒插门”，或“招养老女婿”，是一种男到女家从妻定居的婚姻形式。一个家庭如果没有儿妇，便要想方设法招赘女婿入门，以继承家产，传延子孙，养老送终。

招赘婿的婚礼与一般婚礼基本相同，只是一切都在女家举办。旧时，赘婿是要受到歧视的，不仅在家庭和社会上地位低下，而且要从妻改换姓氏，直到三代之后才能复姓归宗。结婚前，赘婿本人还要当着岳家和其村庄上管事的人面亲自立下“小子无能，改名换姓，从妻生栖，永不反悔”的字据。如自己不会写字，就要摆酒席请人代写，但自己必须划押（即盖手印）。因此，入赘者多为穷苦多子而又无力娶妻人家的儿子，也有迫于财势不得不入赘的人。

寡妇改嫁

婚后的妇女不幸丧夫，实在难以过下去，有的便改嫁。

寡妇改嫁，也须有媒妁撮合，但免去其他琐碎礼节。双方事先都不声张，时间一般都在深夜，不放鞭炮，也不用锣鼓音乐。以防他人打听出日期，人多势众，硬抢去成亲。按照约定的时间，女方娘家备车辆送亲，男方也备车辆迎娶，或规定地点，两车同时到达，搀扶新人换车坐好后，急奔男家。至门外下车，有姑嫂领新人搂三搂椿树，为鲜去“克夫”之毒。进家后，烧元宝拜天地成礼。入洞房之前，要先到厨房切面，切几刀就由别人接去。切面意为予祝子孙连绵长久。

姘居

姘居，也叫“搭伙”。姘居者，男方多数住在女家，互相不以夫妻相称，只是到晚上二人过夫妻生活。女方的子女称男方为伯或叔叔，男方子女称女方为婶子或姨。女方一般是死了丈夫而又有子女的寡妇，也有的是有夫之夫，丈夫在外久居不归，遂招姘夫以养其家和享受人伦之乐，因此多带有卖淫的

性质。姘居没有婚约的约束,虽有相对的稳固性,但极易导致分离;有时一个女人可有几个男姘头,她们以此来养生糊口。虽说这样做不道德,但由于寡妇被人看不起,生活无出路,又为防止本村或邻村的浪荡男儿的胡来,就干脆找姘夫同居,以此来保护自己和儿女。现在,随着社会的变迁,伦理道德观念的改变,公开姘居者几乎绝迹;至于暗中通奸、姘居者虽还有所闻,但为数极少,也属非法,一旦报露,就会受到道德舆论的指责。

冥 婚

冥婚,即为死去的儿女结亲,俗称娶坟头,也称为“结鬼婚”或“阴亲”;撮合冥婚者称为“鬼婚人”,是一种为死人缔结婚事的婚嫁形式。如有人儿子幼年夭折了,如果活到现在,已到成婚年龄了,就托媒人寻访。同样也有人家的女儿从小死去,埋在祖茔内称做孤女坟。只要年龄相当,也就很易说合。成亲后,有同宗子侄过继,延续香烟,不能再看为孤男。

阴婚是将两口棺材合葬在一起,程序一如正式迎娶,有鼓手唢呐吹吹打打,由男方姊妹或侄弟代替新婿,抱公鸡举行象征性婚礼。男方在林地搭棚结彩,并设宴款待戚友。阴婚后,男女双方成了亲家,彼此往来走动不绝。

(三)丧 葬

初 丧

聊城民间旧俗,极讲究寿终正寝,即凡正常死亡的老人,尽量避免在病床上咽最后一口气。当病人生命垂危时,一般

都要为其沐浴更衣(叫做穿装老衣),然后再移至正屋明间的灵床上,在亲属的守护下,度过最后时刻,农村一般叫做“挺丧”。传说,老人咽气前如没有穿上装老衣,就是光着腚走了,到阎王爷那里要挨鞭子打。所以,老人临咽气前穿衣裳,在人们心目中看的特别重要。这种形式,如死者为男性,通常由儿子和女儿和来料理;死者若是女性,则由女儿和儿媳来料理。除穿装老衣外,还要给老人擦洗脸面、手脚、梳头、剪指甲,女性老人还要插戴,这件事也有不少人家是请人来做的。老人死了,人们忌说“死”字,通称“老了”、“过去了”,或称“去世”、“逝世”,故死人穿的衣服称为“寿衣”、“装老衣”。衣服全是棉的,普遍要求三新(即新表、新里、新棉花)。男寿衣一般为蓝色,忌穿黑色;据说谁要穿了黑色装老衣,下世就要蜕成驴。女性寿衣一般都是红棉袄,下身为蓝棉裤,也有一身红的。旧时,一般人年过五十岁就开始准备寿衣的布料,年过七十就预备做寿衣,凡七十岁以前亡故的,寿衣大都是临时赶做的。做寿衣时不能啼哭流泪,据说泪水要滴到寿衣上,死者穿去会经常想念儿女,心情会不安宁;二是缝寿衣时的针线末了不能系疙瘩,据说要是系了疙瘩,死者到阴曹地计里就要与其他人结怨仇。

病人咽气后,用一块类似床单的红布料盖尸。用火纸盖上脸,还要给死者口内衔一小制钱(即生黄铜钱)。有的还要在制钱孔里拴上五色线,谓之“紧口线”,死者的头枕是一个三角式枕头,叫作“鸡鸣枕”。死者头枕之于上如不稳定,可在头两边垫之以纸,如垫有文字的纸,曾有后世出文化人的说法。灵床下面多放一盏豆油灯或一捆谷草,以予防狗猫进来在尸板下坐卧。据说,如果狗要坐卧在灵床下面,死者就会“诈

尸”，即尸体直立起来并下灵床去追赶活人，直至活人转弯而行，尸体便才倒下。灵床前还要放一碗生米饭，上面盖一张饼，放一双筷子，称为“倒头饭”。

和汤的地点是土地庙。旧时传说阎王爷爷主管人的生死，土地爷爷是其手下的地方官，鬼魂在去见阎王之前，先要在土地庙羁押三天，因此，家人在亲人死后的当天，就得给鬼魂去和汤，也叫“送汤”。一般是用面粉做的宽面条，用开水煮好后稀稠一起装进罐子里，然后放上铁勺或铜勺，罐子的提信都是用青麻临时辫好的麻辫子，由死者长子提着，其他家属和院中子弟、族人按照男女长幼次序排列成行，送到土地庙。

“和汤”完毕之后，接着是“送盘缠”，也称“送山”，即给上西天的鬼魂送路费。送山一般是在人死后第三天的晚上，地点是在村庄的十字路口。这天要烧很多纸钱，还特地扎制一纸轿、纸人同时烧掉，意思是叫死去的老人坐轿上西天。送山时，死者的子女们除烧轿、烧纸外，还要带上些花生、红枣和其他食物等一同烧掉。穿孝人都跪在纸轿和纸人前，据说，死去的人当坐上纸轿就要走了，才看到儿女们跪地而哭，他也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死去。一直等到纸轿、纸人全部烧完，家人这才节哀返回。

人殓与成服

入殓，即死者入棺。入殓的时间不统一，有在当天或第二天的，也有第三天的。聊城一带为死者准备的棺材，过去都用上等的柏木或杨木。东昌府的大红板（指上好的柏木棺材），旧时在山东乃至整个中原地带都是很出名的。木板一般是前头厚，后头稍薄一些，前头厚度为六至八寸，后头四至六寸。

人们一般问：“喜棺头脸大小？”，即多指棺之前头厚薄而言。过去做棺材还有些讲究，一般认为独板或三头九顶的为上等棺，三头九顶是指棺材的左右墙和帽（盖）都是三块木板做成。一般人认为，棺材是死者的房子，所以做的质量都比较好。富人家死了老者，所用棺材一般都是双棺，即大棺里头套小棺。小棺的木质有的特别讲究，那就是用枸杞木做成，说是用这种木头做成的棺尸首永久不腐烂；棺材的油漆也相当讲究，有的连油多遍，乌黑铮亮。聊城人还有一个习惯，即称棺为“喜棺”、“棺财”。有的人为了图个吉利，往往很早（有的提前十多年）就给自己准备好了棺材，把它看作是吉祥物；普通人家大都是在老人即将去世时赶做的，或者由棺材铺买来的。棺材头正中的挡山上，大都是刻好的“福”字或“寿”字，字的四周呈圆形，刻上“寿”字边或“万”字边，中间的“福”字或“寿”字全部用金粉漆成，圆形花边有用红漆的，也有用红漆的，看上去十分庄重。

入殓前，死者的儿女按长幼顺序排列成行，为死者净面。净面之后，亲属们瞻仰遗容，向遗体告别。如果死者是女的，入殓时，一定要求娘家人在场，得不到老舅的允许是不能入殓的；如果老舅已经下世，这个差事就由老舅的长子代替或者是老娘门上的近友舅代替。尸体装进棺材后，在死者枕下和身旁还要做一些纸钱（农村叫烧纸或火纸），然后盖棺定钉，定钉时，孝子和晚辈要连喊“躲钉”，意为呼唤魂灵避开钉锋。定钉一般是用七根大铁钉。露出棺外的钉头，系有五彩丝线。棺盖撒五谷杂粮。

成服，亦称“戴孝”、“穿孝”，即穿戴孝衣、孝帽。古代孝服种类很多。明朝以来，据《东昌府志》记载，孝服均用白布做

成,子女都穿白衣白鞋,儿子不但要带白孝帽,并且还要戴一顶用麻做成的圆圈,腰扎麻绳,手持哀杖,也叫“哭丧棒”,儿媳妇和女儿们要头扎孝带,干儿子和亲生儿子同样对待。从前,孝子百日内不脱孝服,三年内脚穿白鞋,而现在已有所改变,一般穿一、两双后即可随便。

落纸与开吊

入殓后,首先要布置灵堂,灵前放一张桌子,悬挂白桌衣,桌上摆供品、香炉、蜡台和长明灯等;棺材下面放一只升,升里装上小米、玉米、谷子、高粱等五种粮食,插上一杆秤,放上一盏碗灯。院内还要搭一灵棚,死者的亲属有的在灵旁,有的在灵棚两边,大部分是男的在灵棚,女的在灵边。

入殓后,棺材在家停放称为“停灵”。停灵的时间不一,寒素人家一至三天,富户五至七天。有钱的财主豪绅之家,有停四十九天才出殡的。这期间,一般为吊孝日。吊孝日期间,死者亲属衣着全白,子女要日夜守灵。孝子披麻带孝,头戴麻绳所捆亮冠,手持丧棒,匍匐灵棚,跪在草苫,不能轻易起坐。

吊孝时,吊孝人一进大门(或二门),先击鼓(即男者来时击三下,女者击两个),意思是告之里面孝子,已有人来吊孝了,孝子或亲属等人闻到鼓声,便伏地痛哭。至吊孝人入门来到灵堂,将所带烧纸、锡箔放入灵棚(有的早被文执迎接)或灵前即放声痛哭。待有礼仪人员高喊“谢到”,方才停止。这时孝子便对吊孝人屈右腿下跪作谢。吊孝人退出灵棚,然后至柜台交付办理送挽联、挽帐、金钱礼之事。亲友送三牲祭席要供于桌上,孝子的岳家送蓝布,由孝子斜披在身上称为“搭孝”。

出 殡

出殡日，家中所有大小行走之门要张贴白纸黑字的丧联，联多为“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以及“日落西山还能见；白马素车客来临”等语。每扇门上，都要贴上一个用方纸写的“哀”字。富有的人家，还要在大门上挂上白布，上写“当大事”等词。

出殡日，吹鼓手们要一大早就到。接着，便由吹鼓手奏着乐同死者的长子一起去林地点穴打坑，打坑者均是村上的人。少者五、六人，多者十几人，把坑挖好后，便扛锹回家。主家设酒招待。

上午，一般多等亲友到来，来后的吊孝仪式与前相同。

时值午时，所有亲友便在唢呐声中同时举行家祭，亦叫“行奠”。家祭在灵棚进行。女儿与女亲友均在堂内守灵旁，儿孙等在堂外跪伏在灵棚，奏乐始，内外哭成一片，执者按顺序高喊：某某亲友，“行奠”。众亲友皆按其所喊，逐个在灵棚磕头，有的磕三个，也有磕九个和十二个的，磕头完毕，即伏地而哭，直至执者高喊谢字，方才被别人拉起，退出灵棚。亲友多者，家祭的时长越长，一小时、二小时不等，家祭结束，众亲友便在临时所设的大棚内分男女就餐，接受酒席招待，就餐时，孝子要到男棚内磕头，儿媳要到女棚内磕头，以对亲友表示感谢。

午餐后，院外的吹鼓手们已酒足饭饱，在饭后的一段时间便会使出全部气力，变着法的吹奏一番。此时，听众很多，常围的风雨不透，高声贺彩者常有之。唢呐声声，笙管、鼓乐声声，再加上哭泣声声，真是悲中有乐，乐中含悲。人们认为，人

死了，一切都超度了，应该说这是可喜的事；但又免不了儿女情长，尤其一想到与父母的永别，又怎能不让人悲痛欲绝呢。悲喜相互衬托，越发使悲感到更悲，使喜感到更喜。

启灵，多在出殡日的下午进行。由僧道至灵前念经，然后拆掉灵棚，孝子用刀砸碎一只碗，杠夫即将棺柩从灵堂抬起走出大门，孝子执灵幡在棺前号啕痛哭，晚辈子侄相随，女眷跟在棺后。杠夫将棺停下，把大小杠绑扎齐整，外护棺罩，棺木放置后，又有一次街上的祭奠。祭奠毕起棺，孝子捧老盆。前有鼓乐唢呐吹奏，笙管铙钹齐鸣，幡伞仪仗，纸扎库楼牛马，童男童女，金山银山、阴宅等，富家有方毕方相的神像，雕刻工致的宝库崇楼迤邐前导，亲友各执雪花柳，纸扎的雪花纷缀的柳枝随行送殡。沿路有摆好的路祭，路祭有三牲供馐、香烛、并列方桌置于路心。棺柩至此，近亲行三跑九叩礼祭奠，孝子跪伏陪祭。路祭多至几处，十几处甚至几十处。因此出殡行列迟缓，杠夫轮班替换，无论路途远近，不能搁置地下。行走时，讲究四平八稳，步伐统一。杠夫多六十四名，少则十六名。规模较大的发丧，耗费之巨，铺张之盛，都极尽奢华，力求壮观。灵柩出村，远亲各自回家，近亲，特别是女儿女婿外甥等则要伴随前往墓地。

下 葬

灵柩到达林地之后，由死者长子围穴坑四角倒面条汤，下葬之后再由死者子女每人围坑穴四周每边抓三把土先扔在棺材上，然后才能埋坟。筑起的坟头一般呈圆锥形或圆形，坟底直径1—2米左右，高1米多。富有人家坟前多立有石碑，设有石桌，石香炉等。下葬完毕，死者亲属首先向坟墓磕头，然

后由长子将灵幡插在坟顶上，全体亲属一边哭一边倒行九步，每倒行三步向坟墓磕头一次，称作辞灵。至此，死者便算入土为安。

祭 祀

殓后三日，孝子上坟烧纸祭奠，叫做复三。每逢一七、三七、五七、百日在家上供祭祀，并到坟上烧纸，父母殁后的百日內，孝子不剃头，穿重孝三年，并连续做一、二、三年三个周年，请僧道念经，超度亡魂，设宴招待送礼亲友。还有做十周年的。每年春节、清明、七月十五、十月一，都要上坟烧纸，以示纪念。

童 丧

童丧，即婴儿生下后至二十岁以内未婚男女的死亡。童丧又分几个层次。婴儿一生下来或不满周岁就夭亡的，一般不埋葬，用谷草卷住尸体，由其父辈或在村上找人仍到野外或乱葬岗子上，稍大一点的幼儿夭亡，一般也是用谷草或小苦子卷起来找个地方埋掉了事，不留坟头；三至七岁的幼童，在上半月夭亡的，一般埋在村庄的西南方向。下半月夭折的则要埋在村庄的东南方向，这些幼童死后一般用苇席和秫秸箔裹上埋掉，尸体上还要压上一根桑枝或生铁，据说是为了镇住幼童的灵魂，不让它再回家中；八至十五岁的儿童死后，多习惯用匣子盛殓，埋在地头上，坟头很小，一般呈椭圆形；十五到二十岁的未婚青少年死后，一般也用小匣子盛殓，也有用棺材盛殓的，一般埋在地头或者祖坟后面的指定地点，堆一个小坟头，孩子的母亲在家中或到坟上哭一场是常见的。童丧不举

行任何仪式，葬后也没有任何祭祀。

客 死

人死在外乡叫做“客死”。一般是亲属得到客死的消息后，要马上供奉死者牌位，穿带孝服，痛哭祭祀；亲友要前去吊孝，仪式同正常死亡一样。富人家要设法把死者灵柩运回故乡安葬，称为“拉生灵”；官宦人家还要派大批护卫和亲属运回，隆重安葬。有的还要立碑文、建牌坊等；贫穷人家则等若干年再把死者的枯骨带回故乡埋葬，这叫做“背骨殖”；城镇居民不经允许，是不准把客死者的灵柩或枯骨运进城里的，并且也不准进家门，只能在城外举行葬礼，然后再埋进祖坟。如清·乾隆十九年秋末东昌府东关街一家姓刘的商人去江南做生意，不幸被盗贼杀死。同伙逃回家中告知刘家，刘家由于没有权势，又知其城规，只能在城东杨庙附近买了一亩七分地，设置了帐蓬，举行葬礼，然后埋葬。至于那些无力“拉生灵”，也不能“背骨殖”的人家，只好把客死者的牌位埋葬，做个假坟，并在逢年过节日仍加以祭拜。

（四）其他习俗

栓娃娃

旧时代，妇女婚后久不生育，除了延医服药，求神问卜，还要向庙中神佛菩萨许愿，恳赐儿女。专司生育的一是送子观音，二是送生娘娘。这两尊神并不在一起，但常附属于其他诸多神像之间，为泥塑女性神像，冠服靓妆，相貌慈祥，常常怀抱

婴儿，笑容可掬。她膝下足边有泥塑儿女嬉笑玩耍，形态逼真。求子的妇女焚香祷告后，便用一根红绒线套在看中的那个泥娃娃颈间，口中喃喃念道：“孩子，跟娘回家啦。”拉过几下红线，低唤几声后，再把泥娃娃胯下的小鸡儿掐掉，带回家冲水喝下。此后妇女是否生育自然与此无关，而被掐去的小鸡儿，庙中主持也会随时补上。

过去，聊城城关可以拴娃娃的地方有好几处，如城内的白衣堂、子孙堂，东关的白莲庵、碧霞宫、七圣堂等，那神殿上常有这样的楹联：“我本是片婆心送这个孩儿给你；尔须行百般善事留此阴鹭与他。为好事文人杜撰。

剃头和起名

婴儿满月，有的就在宴请亲友吃满月酒的那天，还特地请剃头师傅给婴儿剃头。剃头师傅一进大门就要边走边念：“一进门来步步宽，脚下踩着紫金砖，紫金砖上生莲子，莲子上面落凤凰，凤凰不落无宝地，状元一定出在你府上！”剃头时，由婴儿祖父或祖母抱着，坐在堂屋正中，足下踩着红绸（红布或红纸），剃头仪式显得隆重而严肃。剃下的胎发收集起来，搓成桂圆般大小的圆球，用彩色丝线拴好，挂在婴儿床上，说这能使孩子增长胆量。女婴的胎发，是由母亲动手用红布包扎，缀上彩色的一绺丝线，挂在家中的织布机上，意为孩子将来善机杼，巧女红，寄托着父母美好的愿望，也有的把胎发留作医病的偏方。

给婴儿剃头，不是全都剃光，而是要留下头心前端一块桃形头发。这部位叫囟门。说是孩子的命门，有保健和避凶作用。递完头，除了拿红纸封银元权作为酬谢，还要留递头师傅

吃酒。

婴儿满月之内，要给孩子起小名，也叫乳名、奶名，往往在名子前面加一“小”字，以表示亲昵。有的按属相起名，如小龙、小虎等，有的是按兄弟姊妹排行起的，如小二、小三等。有的迷信怕男孩娇贵而夭折，便以姐姐的排行命名，如三妮、四妮等。也有的希望孩子长大结实，起名叫铁蛋、石头等。

女孩子的名字，多以金银珠翠、花草植物为主。民国初年至北伐之前，聊城城乡风俗，女孩名字多带一个“信”字，如喜信、桂信等。也有的加个小字，如小菊、小梅、小兰等。

换童子

孩子生了病，爹娘疑惑他触犯了什么神灵，在请医诊治的同时，也常去找巫婆查查病因。巫婆总说：这孩子是菩萨跟前的一个童子，私自来投胎，如不找一个童子去顶替，被菩萨唤回去就不会再回来了。办法是拿出钱来，请巫婆备置香烛，并扎一个纸的童儿在菩萨神像前焚化，就算以纸童把孩子换回来，从此可以消灾了。这种愚昧风俗，近年已基本消除。

供张仙

旧时，家庭中除供奉菩萨、灶王之外，还多供奉张仙。一般是用素纸彩绘一个白面美髯的男子，挟弓引箭向天而射，上空一只狗嗥叫而逃。这狗即天狗星，专爱跑入人家咬伤幼童。张仙专为保护婴儿安全，看见天狗必立即驱除，没有孩子的人家，据说虔供张仙也可早生麟儿。

传说张仙名叫张远霄，眉山人，五代时游青城山得道，又一说蜀主孟昶。至挟弹射狗，求子灵验，都为后人编造。

唤 魂

唤魂，也称叫魂。即孩子生病或高烧昏迷不醒，爹娘惊慌失措，认为这孩子丢掉了灵魂，夜晚就上房去唤魂。唤魂需两个人去办，一个人拿着孩子的衣服，站在房顶上喊孩子的乳名“阿宝回来了吗？”一个人在屋里答“回来啦！”这样拉连喊十多声，再在灶王像前烧香祝祷，求他领孩子回家。

唤魂的风习在偏僻的农村至今犹存。

认干娘

认干娘的原因有两种，一是婴儿降生后，经阴阳先生算命，如果就这个孩子命相不好，长大克父母，就多用认干娘的办法来转移命相；二是婴儿娇贵，怕不好养，或者以前有子夭亡，怕自己命中无子，故借认干娘来保住孩子。认干娘后，孩子要随干娘的子女排名次，认为这样就算是该户中的一员了。干娘也要给孩子取名子。以后每逢年节，要送礼走动，儿女长大成婚，先请干娘去吃喜酒，按家长之礼相待。此外，还有认打麦场中的石滚为“干娘”的。认石滚为“干娘”时，一般都由家长带着孩子，先把石滚立起来，拴上红头绳或盖上一块红布，叫孩子给石滚磕三个头，如孩子过小，就由婴儿的母亲抱着孩子磕头。之后，每年除夕晚上，孩子都要去给石滚干娘烧纸、磕头，上供（一般是端一碗水饺），以感谢“干娘”的保佑。

寄 僧

为了使孩子得到佛祖保护，大人从小把孩子领到庙中，拜

老方丈为师。行拜师礼前，方丈给徒儿穿戴上家里予先送来的小僧衣僧帽，摆上供馐、香烛，叩拜行礼后，由师父起个法名。有钱的人家还要摆几席素斋款待众僧，并写上一笔布施。从此，这孩子算是庙里的寄名和尚。虽不跟老和尚念经打坐，仍旧回家生活，却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安慰，认为已遁入空门，有菩萨诸佛庇佑，什么妖魔鬼祟，也不敢侵犯了。

待孩子长大，结婚之前，还要举行还俗仪式。一般是寄僧和尚到庙后，有意从老方丈屋中拿一样东西揣入怀中，如毛笔、筷子之类，并拿把笤帚在院子里扫地做做样子。

这时，老方丈喝问：“你偷我的东西了吗？”说着，就在他怀里掏出物件，不由分说，夺过他手里的笤帚，劈腕打一下，喝道：“你犯了佛规不配再当和尚，从此赶出庙门，滚回俗家吧。”然后，寄僧和尚撒腿便跑，一直跑回家中，算是已经还俗，由此便可结婚娶妻了。

庆 寿

庆寿，也叫做生日。即一般多从六十岁开始，并做寿场地布置的豪华阔绰，极尽奢侈，有的上供玉母寿星，摆列素宴，高烧红烛，遍挂为庆寿而送的大红轴及寿幛寿屏，令人满目生辉。有的还送“堂会”，在宴席广列中间，由剧团扮装演戏，以示庆贺。庆寿，富有人家要遍下请帖邀客，受帖的亲友必送礼品，缙绅人家的晚辈或已出嫁儿女，还讲究为寿翁送经，请和尚道士诵经拜忏，以表示孝思，祝其父母尊亲长寿康宁。

迁 居

迁居，俗称搬家。搬迁新居为“乔迁之喜”，门上对联常写

“移来新舍寓，还是旧邻居”。即表示新邻与旧邻一样亲密。迁居时，一般邻居都主动帮忙，适居停当，主人设酒饭招待四邻，称作“喝邻酒”。迁入新居后，亲友送祝贺，多是购买室内器用陈设相送。俗谓“暖锅”或“温锅”，并主人设以酒宴酬谢。

十二 故事传说

二龙山

从前，峨嵋幽谷之中，有两条成精的蟒蛇。这年秋天，两蛇偷喝了瑶池仙液，变成了两条真龙。王母十分震怒，一顿龙棒打出瑶池。两龙忍痛逃窜，钻入黄河深处，又被天兵追踪打来，又流窜到黑烟山，使黄河决口，大水泛滥，把博州王城淹没旋陷，造成空前浩劫。玉皇大帝下令将这两条孽龙处以极刑，给一方黎民报冤，后经百官劝解，只是抽了龙筋，打入下方永远囚禁，这便成了聊城东关外的二龙山。二龙山的北面有街，名猪市街，猪珠谐音，不料竟引起两龙的垂涎，使这条街上的人时常闹病生灾，后来人们便在二龙山北，猪市街南建了一座魏征庙。传说魏征可以斩龙伏魔，这样把龙镇住，周围百姓方得安宁。

龙山晓市

现在聊城闸口南，有条龙路，过去这地方是有名的“二龙山”。这二龙山并不是石头山，是因南北两座土丘蜿蜒起伏，好像两条苍龙一般而起的名。

二龙山北头是过去的刑场，杀过很多人，离此不远的一条大路，就是过去的晓市。也叫鬼市。这晓市是指拂晓开市，卖什么的都有，卖者用围巾蒙着脸，买者提着灯，只准看东西，不

准看人，更不准打听人认人。另外，凡卖东西的摊点子旁边，都放了一支水盆，卖的钱如不下沉，则是所谓的“鬼钱”，一到天亮能辨出人模样的时候，市散了。如今上了年纪的聊城人，差不多都知道或赶过这晓市呢。

凤凰城的传说

传说，聊城一带原是一片梧桐林，住着一对凤凰，统率着林中百鸟，过着幸福的生活。

有一年发大水，东海一条恶龙来到此地，驱走了凤凰，使这一带变成一片汪洋，人们叫它东州湖。地方官见湖波荡漾，周围林茂花繁、景色优美，便想在湖边建城，但工匠们感到工程艰难，均不敢承担。这时，来了两个人，一个叫王东，一个叫王昌，他们自报奋勇，愿意承建。原来这两人就是被恶龙赶走的那对凤凰所生的儿子。王东王昌建城，凤凰率百鸟送来木石用料，不长时间，一座雄伟的湖城建成了。人们为了纪念凤凰在聊城中的功绩，便将该城起名为凤凰城。后来东海恶龙又兴风作浪，企图摧毁新城，王东、王昌力战恶龙，恶龙跳往东海，扒出一条水道，引海水来灌城。为救凤凰城的百姓，王东、王昌兄弟二人钻入水下，用身子堵住了水道口。人们为感谢二王兄弟献身保城救众人的高尚品德，便将凤凰城又改名叫东昌城。

光岳楼的传说

明·洪武七年，统一守东昌府的官员陈镛，想利用筑城剩余木料在城中心建一楼阁，以观敌阵，设鼓报时。要求是基座要有十字通道，上部为四层全木结构，外加围廊，不准用一

寸铁钉,限期一年完工。能工巧匠集中起来各显神,不几日起建起了青砖底座,可全木型楼体总拿不出可心的图样,施工无法进行。正当大家焦愁之际,废料堆旁坐下了一位木工老头,身边做着—个用杂木条搭成的精巧的楼阁模型,这正是想建楼阁的雏形。人们正聚全神地看那模型时,老头已杳无踪影。施工中,发现1根1楼多粗、3丈多长的木柱中有严重糠洞,不能使用。这么大的料没有余数,一时又找不到料源,大家又长呈短叹起来。那老头又出现在工地上,说道:“此非难事,你们备下踞末5车,芦席20领,水胶20斤,明日不误你们用就是了。”果然第二天一早,1根又粗又长的木柱出现在工地上,用尺子—量,粗细长短恰好。40根木柱就这样竖起来了。工程完工后,人们拆除了脚手架,又发现在楼的最高层西北角正檐下,露着半柞长的一根椽头。上去锯,得重搭脚手架,不锯又十分碍眼,大家左右为难之际,那位神秘老头又出现了,只见他从腰后抽出利斧,往那椽子头上一扔,只听“噍”的一声,便把那长出的椽子头砍齐了。在众人的一片欢呼声中,老头又不见了。人们传说这老头就是鲁班祖师。为了纪念其人,特在1楼北墙修了一座鲁班祠。

铁塔的传说

东昌府护国隆兴寺要铸一座10米高的铁塔,当铸到第六层时却无法再铸了。因为融化了的铁水到不了上面就凉了。主持造塔的方丈急得团团转,工匠更是一筹莫展。这时,寺里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方丈见他仪表不俗,忙施礼请教,老人笑道:“我已土屯脖子了,还中用?”话音刚落,早已不见了人影。方丈惊异了一阵,恍然大悟:“感谢上仙指点!”根据老人

指点，采取用土逐层屯积，在上面化铁铸浇的办法，13层塔体很快铸成了。据说那白胡子老头是天上神仙太上老君。

羊使君街的传说

后晋·开运二年，聊城时称博州，县城在今聊城城东旧州洼，州衙门外有一对高9尺的石狮。这一年，城内外流传着一句童谣：“狮子红眼陷旧州”，一时人心惶惶，莫测凶吉。一个捣乱的屠夫偷偷地用猪血将石狮双目涂红，人们更是如临大祸，乱作一团。州官羊使君晓喻百姓，不要轻信谣言，自相惊扰；再有暗中捣鬼者，严惩不贷。民心稍安。不料这年秋天，黄河溃决，洪水汹涌而至。羊使君夜以继日地督率全城兵役竭力与洪水搏斗。无奈大水泛滥，无边无际，眼看城垣塌陷，百姓哭叫连天。羊使君痛呼：黎民何罪，遭此浩劫？我情愿一死殉难，求苍天救这一方百姓！说罢，羊使君跳水而死。人们把他葬在运河东岸，并立祠宇奉祀。历年地方有司，春秋致祭。祠后高冢就是羊公墓，俗称“羊君冢堆”。后来祠堂倒塌，又将羊使君神牌移到阁上供奉。阁下东西长街是羊子巷，也叫“羊使君街”。

邓钟岳批文解家仇

清康熙年间，江西蒙南有沈氏弟兄二人，同朝为官，兄沈仲仁任翰林院学士，弟沈仲义任户部给事中。双双告老还乡后却因家产纠葛打起了官司。两位都是大官，他们到县衙打官司，使县官很为难，怎么断？一筹莫展。这天，新科状元邓钟岳巡察到此，见到官愁容满面，问其所以，说道：“小小家务之事，何须为忧，待人批书数言可矣。”遂挥笔写就批文：

“鸛鵒呼雛，烏鴉反哺，仁也；鹿得草而鳴其群，蜂見花而聚其衆，義也；羊羔跪乳，馬不欺母，禮也；蜘蛛網羅以爲食，螻蛄塞穴以避水，智也；雞非曉而不鳴，燕非社而不至，信也。禽獸尚有五常，人爲萬物之靈，豈無一得乎！以祖宗遺產之小爭，而傷弟兄骨肉之大情。兄通萬卷應具教弟之才，弟掌六科豈有傷兄之理？沈仲仁，仁而不仁，沈仲義，義而不義！有過必改，再思可矣！兄弟同胞一母生，祖宗遺產何須爭？一番相見一番老，能得幾時爲弟兄？”

兄弟二人看過批文，悔愧交加，積恨頓解，此案也未斷而結。

朱延禧寫對聯

明朝年間，禮部尚書朱延禧爲奸黨禪刻回聊城，隱棲故樓，養花種竹，陶冶性情。一天，他出城游玩，走到東關姚園村頭，見路西一戶人家，滿院菊花爭奇鬥妍，斷定主人是個知音，便走入院內。主人斟茶相敬，說道：“我一生別無所好，只是愛菊，與菊花爲友，簡直把菊花當作自己的性命了。”得知客人便是朱閣老，便要閣老給寫幅對聯，以光耀蓬筵。朱閣老洒脱成性，便濡筆写出了“唯有菊花當性命。”七個字，當作上聯。寫後却又爲了難。怎麼對下句呢？躊躇之間，問主人尊姓，答姓趙，他觸動了靈感，即揮筆寫道：“原來松雪是神仙”。主人大喜，連稱真是神來之筆也。

狀元騎驢

傅以漸高中狀元，做了京官之後，上朝或隨皇帝外出狩獵時，總騎一頭小驢。傅狀元長得方面大耳，腰粗腹肥，騎驢常

控制不了，开始上时尤费劲，尽管有仆人揽着辔头并护在身边，他还是恐怕摔下来。这天，顺治皇帝从楼上望见他骑驴时的可笑样子，遂抽笔画一幅“状元骑驴图”，并题了“状元归去驴如飞”的诗句赠给他。

傅以渐曾教过康熙念书，那时康熙还是太子，常跟傅在一块，顺治帝又画了一幅状元骑着驴，太子执鞭跟随行的画像赠之。这两件“御笔亲绘”的作品，被傅状元及后代视为“传家之宝”，傅家妥善保存了300多年，在“文革”浩劫中被毁。

奇才奇遇

清乾隆年间，东昌府有位叫何仲立的才子进京赶考，不料身染重病，卧床难起，误过考期。待病痊愈，带的银两已经花尽，只好在街上出售诗画。他的诗词绝妙，画也精美，书法更是楷草隶篆样样皆佳。乾隆帝微服出游，访知此人才华出众，便差人召见他。何仲立手提唯一的财物竹篮子来到金殿跪倒在地。乾隆问道：“下跪何人？”何仲立奏：“平民何仲立。”“既在河中立，为何衣不湿？”“面前天子照，背后太阳照，故而衣不湿。”“身带何物？”“竹篮子。”“带它何用？”“装东西。”“为何只说装东西，不说装南北？”“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竹篮子盛木盛金，却难盛水火。故而只能装东西，不能装南北。”乾隆和群臣无不叹服，遂留之朝中，委以重任。

柳园巧对

明朝时候，东昌府东关有一赵姓绅士，大儿媳生一男孩，名华贵，二儿媳生一女孩，名柳媛。一家人望子成龙心切，视

华贵如掌上明珠，特聘一私塾先生教华贵读书，柳媛也跟着读书。哪知华贵鲁笨无比，教过即忘；柳媛却伶俐过人，过目成诵。这年中秋之夜，一家人围坐一起，敬天赏月。老绅士兴致勃发，忽生一计道：“以中秋佳节为题，我先出一联，谁先对出下联，谁就先吃西瓜和月饼。”遂出上联曰：“八月中秋八月中，八月饼圆月。”人们苦思良久，皆对不上。老绅士不时看看华贵，希望孩子能一鸣惊人，可惜华贵眉头紧锁，不见动静。一会儿，西边更楼上传来三更鼓响，柳媛嫣然一笑：“有了，三更半夜三更半，三更鼓报更。”举座皆惊。老绅士叹道：“真是有心栽花（华）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今后后花园就叫柳园吧。”

闹龙街

这年，康熙帝下江南路过东昌府，住在任克溥家。一天，康熙帝微服私坊，步出东门，过了水桥，走到米市街，进了路西一家“八仙居”字号的饭馆。南面一张桌子上坐着两个年逾花甲的一胖一瘦两个老头，正喝酒解闷，便拿能否遇康熙帝说话来进行赌酒；瘦老头走过来，在康熙帝肩膀上拍了两下，康熙帝一惊：“你这人为何这般无礼？”瘦老头嘻皮笑脸地说：“我认错人了，你打我两拳吧。”康熙帝非常恼火，回来要任克溥搬出城去，并说回京后要血洗东昌府。任克溥忙向康熙帝道喜，并说：“那就是闹龙街。东昌府虽是弹丸之地，却是鲁西的一块宝地，是神仙云集的地方。鼓楼下三天不过神仙就会腥血烂臭”。东昌府常有天下能人来往。今天万岁犯地名了，闹龙街有人打扰，这说明龙仙相遇，乃大吉大利之兆，万岁爷定能江山千载稳如泰山。”康熙帝转怒为喜。从此“闹龙街”叫

得更响了。

躬身“父母官”

傅状元在聊城家里养病期间，从不外出，也很少和人喝酒闲聊，基本上是每天静坐书房，写字读书。过去的县官们出外都是坐轿，有士兵前呼后拥，鸣锣开道。聊城的县官也是如此。傅状元每次听到锣声，都是立即离座，躬身肃立。仆人对这不解，他解释道：“对本县‘父母官’应当尊敬。”当时傅以渐身为一品宰相，对小小的地方县令如此恭敬，实是难得。但他这番举动县官等人并不知晓。有一天，县太爷的轿子又经过相府门外时，一个丫环暗把此事告诉了县官。县官吓得第二天亲来相府请罪道歉，从那以后县官不敢再敲锣开道。其实，傅状元不知其中缘由。

胭脂石

明末清初，东昌知府酷爱收藏各种颜色和形状的奇异怪石。这知府和当时的山东抚台是儿女亲家，因此不少人来钻门子，钻门子的人都知知府大人喜砍石头，纷纷投其所好。

一位扬州的纨绔子弟，因候补知县呆在东昌府，为早日补缺，分用 8000 两银子从洞庭湖买了块罕见的大彩石送与知府，此石乃天然珍品，长够 6 尺，高有 3 尺，名曰胭脂石。知府见后大喜过望，答应为他尽力保荐。后来，知府猝角病故，其家人归乡时无法带这块几千斤重的大石头，便把它捐赠给闸口南河涯的白衣堂尼姑庵，不料，运石头的船走到来春桥坏了，结果胭脂石就近卸到了元宝心老槐树下。《聊斋》上说的那个叶牛医的女儿叫胭脂，就是住在元宝心，因胭脂石而起

名。到了光绪末年，有外国人来聊城旅游，看到胭脂石，竞相出高价收买，被地方人士峻拒。后来该石忽在一夜之间失踪。据说还是那个外国人，用重赏偷雇壮工，连夜把胭脂石窃走了。如今，这块珍宝究竟在何处还是个谜。

蝎子尾

每年二月初二，乡里乡间，家家户户都要炒豆子吃。豆粒炒熟了，又黄又酥，我们这里叫“蝎子尾”。可你知道“蝎子尾”的来历吗？

相传，从前这地方有座山，山上有蝎子精，一到天黑，蝎子精就下山到乡里来，见人就蜇死，然后吃掉，不知害了多少人，因此，每天天不黑人们就关门闭户，生怕被蝎子精吃了。

这天傍晚，有个名叫张青的年轻人，打这儿路过，这小伙子生的浓眉大眼，膀宽腰圆，脊梁上背着一把系着红绸子的大刀。这小伙子拳脚棍棒，刀枪剑戟，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他想在庄里找个地方住下歇歇脚，明天再赶路。可进庄一看，太阳还有一竿子高，家家户户早关门闭户了，张青很纳闷，便到一家喊门。出来开门的是一位白胡子老汉。张青问老人为啥这样早就关门闭户，老人把蝎子精下山吃人的事告诉了张青，张青听了老人的话，说：“老伯伯，甭发愁，我给大家除这一害。”老人满心欢喜，打发张青吃了晚饭，张青提着大刀向山上走去，正碰见那蝎子精下山。蝎子精见了张青身子一晃，霎时由小变大，眼象灯笼，嘴似簸箕，尾巴翘起长过丈，毒针就有尺把长。要是小胆的见了，吓也得吓死。那张青可真算是一条好汉，见了这么大个怪物心不慌，眼不眨，举起刀就向蝎子精头上砍去，蝎子精打个旋摆着尾巴直向张青刺来，张青机灵

地闪过，蝎子精又用爪子往张青脸上抓来。张青跨步一跳，又让蝎子精扑了空。张青举起大刀，往蝎子精头上砍去。就这样，一直战到黎明，张青累死了，蝎子精身负重伤，也奄奄一息了。庄里的人们一早跨来，看到山脚下漫洼地里，扑腾得净是脚印，张青手握大刀，累死在洼地上，唯独不见那蝎子精。后来，那位白胡子老人发现地头一棵头年秋里割剩的豆棵上，有四五个豆荚，在豆荚上趴着一个小蝎子，仔细一瞧，蝎子身上还有刀伤，它一动不动，快要死了，老人自言自语的说：“原来你跑到这里来啦！”他一脚把这个小蝎子蹙了个稀巴烂。从此，蝎子精这一害被除掉了。这天正是二月二，后人为了纪念为民除害的张青，每年二月二炒“蝎子_尼”吃。还说“吃了蝎子_尼，一年不挨蝎子蜇”。

王泓阳坐轿

明朝万历年间，东昌府王楼村的王泓阳十几岁即中了进士。当京里派员带着官轿来接王泓阳去大名府元城县接任知县时，王泓阳还光着屁股正在村头的水坑里游玩。当时一队衙役来到村头便冲王泓阳问道：“小孩，王泓阳大人是在这个村吗？”王泓阳一听，这不是找我吗？原来是接我赴任的。但我还光着屁股，多不象话呀！于是灵机一动，连忙说道：“王泓阳就在这个村，请您们稍等一下，我去把他叫来。”说完，即光着屁股，跑回家中。待他在家把衣服穿好，便才迈着方步走出，对衙役说道：“我就是王泓阳”。衙役一听，都纷纷摇头，不肯相信。王泓阳只好将考中的报单交其观之。衙役看了报单，不敢不信，都一齐跪地叩头道：请大人勿怪，快请上轿赴任吧。”此时，王泓阳便拜别了二老，然后乘轿离开了家门。

在途中，不料衙役和轿夫们却欺他年幼，即故意使劲把轿上下颤动，有意戏弄起他来。王泓阳在轿中一闪一摇，心中不禁暗暗想到：这些眼皮子薄的小人，今天竟胆敢对我这么放肆，对平民百姓岂不更敢胡作非为？既然这样，我也定叫你们尝尝我的厉害。想到这里，正好来到一个村头，见一个场院里放着很多土坯，他立刻说到：“停轿”。等轿子落稳，他走出轿来，说道：“本官在家中睡惯了土炕，我想任所绝无土坯炕。现在有现成的土坯，快给我装上四六二十四块，以备到县衙垒炕之用。”衙役、轿夫们不敢怠慢，只好搬了二十四块土坯，放在轿的四个角里。这土坯一块约重三十斤，走不多远，就压得轿夫们呼哧呼哧的喘开了粗气。轿夫知道这是王泓阳在有意惩罚他们，走了一段路，实在累的支持不住了，便停轿向王泓阳叩头说：“请大人饶恕，奴才再也不敢放肆了。”王泓阳听了，暗自一笑，说：“好吧，就先卸下四块。”又走了一程，轿夫们却仍然累得气喘吁吁，因实在难以支持，便又停轿叩头请罪。王泓阳也便又让卸下四块土坯。一直到了大名府元城县，才把二十四块土坯全部卸完。自此以后，衙役、轿夫们都知道了王泓阳的厉害，再也不敢放肆妄为了。

附参考书目

- 《东昌府志》(明·万历二十八年 王命爵、王汝训修纂)
《东昌府志》(清·嘉庆十三年版本)
《东昌府志》(清·乾隆四十二年胡德琳、周永年修纂)
《聊城县志》(清·康熙二年) 何一杰修纂)
《聊城县志》(清·宣统二年版本)
《聊城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四年向植编)
《重修东昌记略》(明·嘉靖四年李延桐撰)
《东昌旧话》(李琴轩著)
《论语·微子》
《战国策》
《水经注》
《书·禹贡》
《行水金鉴》(清·傅泽洪著)
《山东省志·东昌府河川》
《山东水利专刊》(民国二十五年)
《齐河县志》
《续山东考古录》(清·叶圭绶著)
《寰宇记》
《山东通志》
《元和志》
《九域志》

《金史地理志》
《堂邑县志》
《一统志》
《占书》
《续齐谐记》
《风俗通》
《开元天宝遗事》
《汉书》(班固撰 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山东水利史》
《黄河变迁史》
《临清县志》
《博平县志》
《阳谷县志》
《茌平县志》
《临邑县志》
《山东清代水旱灾情》
《清实录》
《永乐志》
《明史》
《明实录》
《左传》
《宋史》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岁时百问》
《淮南子》
《询刍录》

《继博物志》

《山东省志·东昌河川》

《合婚便览》

《燕京岁时记》

《说文解字》

《玉炖宝典》

《尔雅》

《历年黄河决口各地概况表》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年版

《聊城古今知识大全》(傅哲清 王振华主编

聊城地区新闻出版局 1992年版)

《文博论集》(陈昆麟 竞放编著,山东省出版总社聊城分
社 1989年版)。

《聊城名胜》(中共聊城地市委宣传部编 山东友谊书社
1990年版)

《东昌古今备览》(齐保柱编著 山东友谊书社 1990年
版)

《聊城风物》(聊城地区史志办公室编 山东友谊书社
1989年版)

《略论历史文化名城——聊城》(魏聊著 1994年版)

《聊城名胜古迹大观》(陈清义主编 聊城地区新闻出版
局 1995年版)

《聊城文史资料》第三辑(政协聊城市文史资料研究会编
1987年版)

《聊城文史资料》第四辑(政协聊城市文史资料研究会编

1987 年版)

《聊城文史资料》第六辑(政协聊城市文史资料研究会编
1991 年版)

《聊城史志资料·水利》(聊城市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85 年编印)

《聊城史志资料·教育》(聊城市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84 年编印)

《聊城史志资料·风俗篇》(聊城市史志编纂委员会办
公室 1990 年编印)

后 记

为适应改革开放和旅游事业发展的需要,也为使更多的人了解聊城,认识聊城,宣传聊城,为振兴聊城作出贡献,我们组织编辑出版了《地方史志资料丛书·聊城》一书。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民盟山东省委的关怀和支持。中共聊城市委统战部等单位 and 部门,以及聊城市史志办的顾光耀先生和聊城地区科协的范兴山先生曾给予了热情帮助。尤其是聊城市史志办的顾光耀先生,曾为本书提供了珍贵的史志资料,其中《聊城史志资料·风俗篇》,不仅掺杂着他的辛勤劳动,而且还凝结着吴运涛老先生数年的心血。据说先生当年为了搜集、整理、撰写此稿,曾是带病数十次往返聊城师院查阅史书,其精神之可贵,无不令人肃然起敬。这些资料,我们在编写本书时多收入在“乡风异俗”篇中。此外,应该说明的是,书中的“主要河流”一篇,多是采用《聊城史志资料·水利》一书的“地形与水系”一章所编成。另外,还应该说明的是,本书在编辑过程中,曾从梁金中、杜建民、杨道田等先生的论文中广泛吸收了研究成果。对此,谨向以上诸位先生致以深切的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资料不足,书中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6年6月